建設

学術性月刊

2

1956

-02
52

新建設　一九五六年　二月号（总第89期）

"中國農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毛澤东（1）

知識分子在社会主义高潮中的光荣任务（社論）……（3）

从深入生活中提高自己……吳景超（6）

知識分子怎样循着自己專業的途徑走向社会主义？……賀　麟（8）

迎接文化高潮……馮友蘭（10）

吳家木桥農業生產合作社經济調查……李百冠　朱开謨（11）

"資本論"第一卷書評……恩格斯（20）

为什么要学習政治經济学？……千家駒（28）

太平天国有关土地制度的公据……荣孟源（35）

"西遊記"試論……沈仁康（41）

明代治黃專家潘季馴……何仲珉（48）

中國陶磁的制作和發展……傅振倫（53）

形式邏輯与辯証法……周谷城（58）

动　态

目前我國地理学界有关經济地理学基本問題的討論……（63）

國际地理学座談会在印度阿里加回教徒大学举行……（65）

編輯者：新建設雜誌編輯委員会　北京东華門南夾道12号

出版者：光明日報社　北京石駙馬大街甲90号

总發行处：邮电部北京邮局

代訂代售处：全國各地邮局　全國各地新華書店

印刷者：光明日報印刷厂

預定价目

全年十二期　4.20元
半年六期　2.10元
三个月三期　1.05元

定費一律預收

本期印数：（京）33,640

“中國農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

(1955年12月27日)

毛 澤 东

这是一本材料書，供在農村工作的人們看的。本來在9月間就給这本書寫好了一篇序言。到現在，过了三个月，那篇序言已經过时了，只好重新寫一篇。

事情是这样的。这本書編輯了兩次：一次在9月，一次在12月。在第一次編輯的时候，收集了121篇材料。这些材料所反映的情况，大多数是1955年上半年的，少数是1954年下半年的。当时，曾經將这些材料印成样本，發給参加1955年10月4日至11日中國共產党第七屆中央委員会第六次全体会議（擴大）的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和地委的負責同志閱看，請他們提出意見。他們認为需要补充一些材料。会后，大多数省、市和自治区送來了补充材料。在这些材料中間，有許多反映了1955年下半年的情况。这就需要重新編一次。我們从原有的121篇材料中删去了30篇，留下91篇，从新收材料中选出了85篇，共計176篇，約有90万字，成了現在这个本子。收在这本書里的所有的材料，都經負責編輯的几个同志在文字方面作了一些修改；对於一些不易看懂的名詞，作了一些註解；又按問題的性質作了一个分类索引。除此以外，为了批判某些錯誤思想和建議某些东西，我們还在一部分材料上寫了一点按語。为了区别於在有些材料上原來刊物的編者所寫的按語，我們寫的按語，用了“本書編者”的名义。这些按語因为是在9月和12月兩次寫的，故在語調上也就有了一些差别。

問題还不是簡單地在材料方面。問題是在1955年的下半年，中國的情况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中國的一億一千万農戶中，到現在——1955年12月下旬——已有60%以上的農戶，即七千多万戶，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加入了半社会主义的農業生產合作社。我在1955年7月31日所作关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报告中，提到加入合作社的農戶数字是1,690万戶，几个月时間，就有五千几百万農戶加入了合作社。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件事告訴我們，只需要1956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農業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1959年，或者1960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轉变。这件事告訴我們，中國的手工業和資本主义工商業的社会主义改造，

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適应農業發展的需要。这件事告訴我們，中國的工業化的規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衛生等項事業的發展的規模和速度，已經不能完全按照原來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適当地擴大和加快。

農業合作化的進度这样快，是不是在一种健康的狀态中進行的呢？完全是的。一切地方的党組織都全面地領導了这个运动。農民是那样热情而又很有秩序地加入这个运动。他們的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最廣大的群众第一次清楚地看見了自己的將來。在三个五年計划完成的时候，即到1967年，粮食和許多其他農作物的產量，比較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的最高年產量，可能增加100%到200%。文盲可以在較短的时間內（例如七年至八年）加以扫除。許多危害人民最嚴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等等，过去人們認为沒有办法对付的，現在也有办法对付了。总之，群众已經看見了自己的偉大的前途。

現在提到全党和全國人民面前的問題，已經不是批判在農業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傾保守思想的問題，这个問題已經解决了。也不是在資本主义工商業按行業实行全面公私合营的速度方面的問題，这个問題也已經解决了。手工業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問題，在1956年上半年应当談一談，这个問題也会容易解决的。現在的問題，不是在这些方面，而是在其他方面。这里有農業的生產，工業（包括國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营）和手工業的生產，工業和交通运輸的基本建設的規模和速度，商業同其他經济部門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衛生等項工作同各种經济事業的配合等等方面。在这些方面，都是存在着对於情况估計不足的缺点的，都应当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適应整个情况的發展。人們的思想必須適应已經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無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許可的条件去計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現在的問題，还是右傾保守思想在許多方面作怪，使許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適应客观情况的發展。現在的問題是經过努力本來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認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这本書是給在農村工作的同志們看的。城市里的人是不是也可以看看呢？不但可以看，而且应当看。这是新事情。如同城市里每日每时都在發生社会主义事業的新事情一样，鄉村里也在每日每时地發生着。農民在做些什么呢？農民所做的，同工人階級、知識分子和一切爱國人士所做的有什么关系呢？为了要了解这些，看一看農村方面的材料是有好处的。

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現在農村的情况，我們准备从176篇材料中抽出44篇，約有27万字，印一个節本，使那些不可能閱讀全書的人也能够接触这个問題。

（轉載"学習"雜誌1956年1月号）

社 論

知識分子在社会主义高潮中的光荣任务

我們祖國正处在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我們的社会主义事業正在突飛猛進地向前發展。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大約再有三年的时間，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國范圍內基本上完成。我們知識分子，和全國人民一道，热烈地欢慶我們國家在建設社会主义事業中的偉大勝利，同时也深切地感到社会主义建設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向我們提出了艰巨的光荣的任务。我們必須勇敢地担当起來，坚决地加以实現。

毛主席的"关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报告發表以后，農業合作化的高潮已經在全國范圍內到來。截至去年年底为止，全國農戶已有60%左右加入了農業生產合作社，若干地区並且已經实現了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化。我國農村的社会主义高潮，鞭策一切，推动一切。資本主义工商業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緊接着湧來，全行業公私合营的新措施使得这个工作以想像不到的速度迅速前進，各大城市的資本主义工商業已經全部合营，中小城市資本主义工商業的公私合营正在大規模开展。手工業的合作化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廣大地区發展着。生產关系的改变正在促進着生產力的巨大發展，農業、公私合营企業、合作化的手工業都正在社会主义改造勝利的基礎上，开展着發展生產的高潮。这一切都要求工業、商業、运輸業，我們的科学、文化、教育、衛生工作做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这些使我們完全有信心預期过渡时期的任务將提早实現，使我們完全看清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燦爛雄偉的面貌。

毛主席早就指示过我們，"随着經济建設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个文化建設的高潮。"这个預言不久就要实現。同时我們自己也已經体会到，經济建設高潮正在迫切地要求科学文化、教育、衛生事業突飛猛進，來配合我們國家發展的巨人式的步伐。迅速發展着生產事業要求更多更好的科学文化力量，科学文化事業在經济建設中的作用將日益突出。毛主席指出，为了要在几十年內改变我國在經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狀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進水平，"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幹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術專家……"。可以看出，經济建設向科学文化提出了巨大的要求，同时，我們的科学文化还面臨着在第三个五年計划期末，使我國最急需的科学部門接近世界先進水平的任务。

在这个艰巨的任务面前，我們的科学文化力量感到十分不够，旧中國留給我們的科学文化力量是少得可憐的，經过解放以后的大量培养，高級知識分子現在还不超过十万人。在一个六億人口而又处在社会主义建設高潮的國家，这个数字是完全不相称的。因此，我們还面臨着大量培养青年知識分子的任务。在培养新生力量方面，我們現有的高級知識分子担負着义不容辞的任务，青年知識分子的提高有賴於他們的帮助。

这就是社会主义高潮向知識分子，特别是高級知識分子，所提出的光荣任务。正如毛主席所教導我們的，"我們正在做我們的前人从來沒有做过的極其光荣偉大的事業"。社会主义建設將实現我國人民千百年來的願望，將为我們子孙万代打下幸福生活的基礎。我們能够以自己的力量参与这一偉大的工作，是我們的光荣，是我們的驕傲，我們要把我們的一切智慧和力量都貢献出來，响应祖國的号召，完成知識分子的任务。

可以看出，这些任务是須要知識分子發揮高度的積極性，充分發揮潛力的。我們相信，一切具有社会主义覚悟的知識分子，都將欢欣鼓舞地以創造性的工作來完成时代的任务。經过了解放以后各方面的教育，高級知識分子中間已經有一批人提高到了这样的高度。我們也相信，一切爱國家、爱人民、爱科学文化的高級知識分子，也必定積極地响应祖

國和人民的号召。因为眞正爱祖國爱人民的就不会不發現，全体人民和他个人所期望已久的建設繁荣富强的中國、大大提高人民生活的願望，現在正在加速的实現着；眞正爱科学文化的就不会不發現，中國科学文化的昌盛正是指日可待，科学文化为人民服务的机会正在無限地开展。这就不能不大大地激發他的積極性，以全副力量投入到工作中去。在積極的工作之中，他們还必然進一步看到，國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提高，科学文化的昌盛，都是和社会主义分不开的，都是和共產党、毛主席分不开的，因而更加激發他們对於党和毛主席的热爱，对於馬克思列寧主义的信仰，从而把自己的命运和社会主义溶为不可分离的一体，並以創造性的工作为社会主义事業服务。

我們也深切不疑地相信，高級知識分子也必然能够完滿地实現自己的光荣任务。在这一方面，我們已經具备了一切必要的条件。首先，我們所依靠的是党的正确的領導。党对於知識分子是有正确的充分的估計的。毛主席早就指示过："革命力量的組織与革命事業的建設，离开革命知識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刘少奇委員長在"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报告"中說："我國的知識分子，在过去的革命运动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今后建設社会主义的事業中將起更加重要的作用。……除开極少数坚持反动立場並進行反对中華人民共和國活动的知識分子以外，我們的國家必須注意团結一切知識分子，帮助他們進行思想改造，發揮他們的能力，使他們为社会主义的建設事業服务。"根据着团結教育知識分子的正确方針，党在知識分子中間進行巨大有效的工作。現在高級知識分子中，除了極少数的以外，都是为祖國的建設而欢欣鼓舞並且願意貢献自己的力量的。这是党的政策的正确性的明証。我們知道，党在今后要根据这一正确的政策進行更为廣泛深入的工作，为高級知識分子的工作創造更有利的条件，保証高級知識分子有足够的时間用於自己的專門業务，以充分發揮高級知識分子的潛力。我們相信，这些工作必然会使知識分子進一步緊密地团結在党的周圍，更加激發知識分子的積極性。

其次，我們必須看到，在今后突飛猛進的社会主义建設中，知識分子將有更快更大的進步。經过了解放以后几年來的教育，絕大多数知識分子都是拥护共產党，拥护社会主义，並为社会主义而努力工作的。因之，他們已經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較之解放以前，知識分子的面貌已經有了根本的改变。这种進步，是在旧中國生長起來的爱祖國、爱人民、爱科学的知識分子，在共產党的領導下的必然的正确的道路。我們还必須看到他們繼續進步的巨大可能性。社会主义建設的一切成就，都將加强社会主义力量对於知識分子的領導，社会主义改造的每一勝利，都將削弱非社会主义力量对於知識分子的影响。在这样优越的条件下，知識分子的進步和提高是会更加迅速的。

上述这一切使我們相信，知識分子能够完成时代所提出的任务。但是，知識分子也必須做出巨大的努力，在政治上和科学上大大地提高自己，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的馬克思列寧主义的知識分子，才能順利实現自己的任务。

这里最根本的一点是不断提高自己的社会主义覚悟，不断發揚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積極性。就絕大多数情况來講，应該說知識分子已經很好地过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关。到了今天，在反对三大敌人，热爱祖國和人民，接受党的領導等方面，都已有了坚定的立場和足够的認識。但是，我們的國家現在却已經由新民主主义革命進入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了。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階段中，知識分子的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社会主义事業服务，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知識分子。从为社会主义勝利而奋斗的任务來判断，知識分子中有一批人已經有了足够的認識和相应的行动。但也还有一些人在思想和行动上差着一段距离，因此他們对於社会主义事業，还不是那么欢欣鼓舞，还不是那么自覚主动，有的甚至在國家光芒万丈之中，自己却有黃昏之感。这种社会主义热情和覚悟不高的情况，障碍着他們充分發揮積極性。必須指出，在今天的中國，社会主义積極性是一切積極性的基礎，只要缺少了这一基礎，不論客观条件怎样好，積極性还是發揮不起來。这种思想覚悟上的弱点，必須加以克服，把自己的前途和國家的前途統一起來，把自己的工作和社会主义事業結合起來，建立並不断提高自己的社会主义覚悟，作为一切積極性的源泉。經驗証明，接触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國家建設的实际，是提高知識分子思想覚悟的有效途徑之一。有关方面今后將更为廣泛地組織这些活动，使廣大的知識分子都能經常地具有这种机会。我們相信，这对於知識分子思想覚悟的提高，將要發生廣泛的直接的作用。已經具有社会主义覚悟的，也应該不断地加以提高，使之成为推动自己的工作精益求精的动力。

系統地学習並把馬克思列寧主义貫穿到自己的

專門業务里面，是高級知識分子所面臨的一項長期的任务，也是一項迫不及待的任务。这項工作是必須有長期的細致的努力才能做好的，但又是必須立即着手迅速進行的。这是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重要途徑，只有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义，思想改造的成就才能总結起來，巩固下去。这也是知識分子把学術推進到新的高峰的必要条件。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义的立場、观点和方法，就能为自己的科学工作开辟新的天地，指導自己的科学工作达到新的高度。苏联科学在各方面的驚人成就，就是馬克思列寧主义对於科学文化的偉大的指導作用的明証。我們必須認識到，馬克思列寧主义是自然、社会、思想一切發展成果的总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眞理，对於一切学術部門都具有指導意义。那种認为馬克思列寧主义对於自己所从事的学術部門沒有关系，不学也可以照样工作和研究的观点是錯誤的。錯誤的立場、观点和方法，能使我們的工作和研究徒劳無功，正确的立場、观点和方法則可保証我們遵循着正确的道路取得科学上的新的成就。現在能給予科学文化以这种保証的，正是馬克思列寧主义。高級知識分子必須自覚地学習並掌握这个銳利的武器，扫除学術上的唯心主义，使自己在科学上成为完全的馬克思列寧主义者。

为了迅速把我國科学文化提高到國际先進水平，我們高級知識分子还必須發揮科学工作上的頑强性，付出坚忍不拔的努力。科学工作上是沒有捷徑可走的，只有刻苦的持久的努力，才有希望达到优異的成就。淺尝輒止的办法是不可能獲得重大的成就的。馬克思說："在科学上面是沒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嶇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有希望到达光輝的頂点。"我們应該以馬克思的指示作为自己的鼓励和鞭策，不惜工本，不避艰險，披荆斬棘，精益求精。我們的科学文化虽然在一些方面已經取得了引起國际重視的成就，但一般說來，我們在科学文化上的成就与我們國家在國际上的重要地位还不能相称。以頑强的努力，迅速接受科学文化上的最新成就，赶上世界先進水平，是高級知識分子的义不容辞的責任。在科学工作上，我們必須坚持理論联系实际的原則，使我們的科学工作圍繞着國家的建設；但也絕不可以忽視理論的研究。在坚持理論联系实际的原則的同时，我們必須重視理論研究（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使科学应用具有正确的雄厚的理論基礎，獲得根本革新的可能。我們相信，在科学工作上發揮了頑强性的人，不但可以在自己的学術部門中取得新的創獲，並且还可以遵循着列寧的指示，迅速地通过本門学術去接受共產主义。

保証上述一切的关鍵是党对於知識分子和科学文化的領導。解放以來的事实証明，党是能够並善於領導科学的。几年來科学文化的發展，知識分子在各方面所起的作用，离开了党的領導是根本不可能的。知識分子和科学文化在旧中國的悲慘狀况，从反面确切地說明了这一点。在偉大的社会主义建設中，知識分子要充分發揮作用，科学文化要大大提高，离开了党的領導更是不可想像的。离开了党的領導，科学工作就不能有正确的方向，就無法得到各方面有力的配合，就無法發揮应有的作用。只有党的領導才能保証科学文化和人民的当前的和長远的利益相結合，才能適当地規划科学工作的分工和配合，組織成为有机的整体，發揮出巨大的力量。知識分子的任务就是更緊密地团結在党的領導之下，正确地進行我們的科学文化工作。

我們祖國正处在社会主义高潮，我們的科学文化正处在高潮的前夕。我們知識分子要以自己的工作协助完成建設社会主义的偉大事業並把自己煅煉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的馬克思列寧主义的知識分子。在党的正确領導下，我們必能勝利完成我們的任务。

从深入生活中提高自己

吳景超

自从解放以來，中國共產党对於知識分子实行了正确的团結教育改造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現在中國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数是願意在党的領導下，为实現过渡时期总路綫总任务而奋斗的。只要把这种情况与解放前知識分子的思想动态比較一下，就不能不承認我們的党在这一战綫上的偉大勝利。

党对於改造知識分子，是採取了多种多样方式的，其中有很重要的一种方式，就是給知識分子以各种机会与实际生活接触，从接触中使知識分子改造自己。拿我个人來說，1950年我曾参加过湖南錫礦山的劳动保护調查，1951—1952年，我曾在西安及南寧兩处参观及参加土地改革运动。1955年我曾花了一个月的工夫，在山西視察工厂生產及農村的合作化运动。在每一次的实际工作中，我都解决了若干思想上的問題，在感情上由逐漸与劳动群众接近一直到近來便有打成一片之感。这对於我的帮助是很大的。远的不必提了，只談最近一次的視察的几点收穫。

在山西榆次縣的一个紡織工厂中，我們曾同厂里的許多工人談話，其中有一位青年女工，年齡还不到十七歲，但她在短短不到一年半的时間內，便把看錠子的能力，从150枚增加到1200枚。全厂中的工人，能看紗錠1200枚的只有七人，而她便是七人中的一个。为什么她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間內达到这样高的成績呢？原因就是由於她能够虛心地、誠恳地学習。她每天在厂內要花上十几个鐘头，除了上班的时間以外，其他的时間，她就利用來向厂內所有先進工作者学習。这样，她就採集了別人的專長，消化成为自己的优点。这种学習的精神，特別是那种不滿足於自己的成績，經常向群众請教的优良品質，是我們許多知識分子所应当学習的。

在山西的農村中，我碰到許多劳动模范，其中包括全國聞名的李順达、申紀蘭、郭玉恩、武侯梨等同志。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們都为自己制定了一个远大的計划，並把自己整个的生命，都放在为实現这一計划的劳动上去。因此，他們便与一些所謂庸俗的人不同，沒有一点为个人的利益打算的气息。因此，他們是乐观的、愉快的，对於自己的事業、自己的國家是充滿了信心和热爱的人。从这些劳动模范的言行中，我得到一点啓發，就是生活在这个大时代中，一定要有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要为实現这一理想而努力工作。只有如此，才会像这些劳动模范一样，对於生活，是越过越高兴，越幹越起勁。

当我們离开太原的时候，裴丽生同志提醒我們說："到了璩寨農業生產合作社，一定要找苟佩芳同志談談，他是一位農村心理学專家"。在璩寨，苟佩芳同志給我們作了兩个多鐘头的报告，的确是很出色。他領導農民办合作社有一特点，就是凡遇到困难的时候，总要先研究一下这个困难問題所以發生的思想根源，把思想問題解决了，困难也就比較順利地解决了。他的报告，有扼要的叙述，也有深刻的分析。有好几次，当我听到他的报告引起了心中一个問題，正要把这个問題提出的时候，他已經在回答我心中所想到的那个問題了。他的报告之所以成功，一方面是因为他熟悉他所要講的內容，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掌握了听报告人的要求。他所講的，正是你所想知道的；他所解釋的，正是你想詢問的。我們在学校教書的人，应向苟佩芳同志的工作方法和講演技術学習。

我們到平順縣西溝去参观李順达申紀蘭所領導的金星農業生產合作社时，在村口欢迎我們的人群中，我忽然發現三个佩帶了山西机器厂徽章的人。山西机器厂，我們在太原是参观过的，在一个車間的外面，我們看到擺着几百部正在裝配中的双輪双鏵犁，給我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当时我深刻的感到，这就是工農联盟的具体表現。但我想不到会

在离开太原几百公里的平順縣鄉村中，又碰到山西机器厂的工人。后來与他們談話，才知道他們在山西各鄉村中旅行，抱有兩个目的，第一是要听听農民对於山西机器厂出品的反映意見，第二是要指導農民如何修理双輪双鏵犂。这次談話，使我更深刻地認識到社会主义工業化与資本主义工業化的一个本質上的差别。資本主义工業化，为了追逐最大利潤，也可能制造双輪双鏵犂，但資本家只要把產品推銷出去，利潤已經到手，其余的事他就不問了。社会主义工業化，目的不是为了利潤，而是为了滿足人民的需要，所以貨物推銷出去，事情並未完結。繼着还要追問，这一貨物是否眞正的滿足了需要，是否还有一些地方需要改良，以便把人民的需要滿足得更好。这个抽象的理論，由於我在鄉下碰到山西机器厂的工人，在我的思想中便形象化，深刻化了。

以上这些零碎的經驗，对於我都是一些生动的教育。我要感謝党，使我有受到这种教育的机会。

从山西鄉下回到太原，我們得到一次机会与山西日报的总編輯談話。山西日报的編輯部有150余人，大部分同志是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因此也有改造知識分子的問題。他們从多年的工作中，已經摸出一些經驗，其中有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强調下厂下鄉。山西日报已經定出一个制度，每人每年必須有一个月的时間，下厂下鄉与群众接触。事实証明，这样做，是使知識分子在思想感情上与工農群众一致起來的有效办法。我認为山西日报这一条經驗，在高等教育机关中，也是值得推行的。

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会上的講話"中教導我們要"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个变化，來一番改造。沒有这个变化，沒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有一个时期，我对於如何变化思想感情与改造思想感情这一点，是体会不深的。現在我相信，知識分子的思想感情，必須变化，必須改造，而变化、改造的一个方法，就是經常与工農群众接触，从接触中得到感染，以工農群众那种正确的思想感情，來排挤、替換自己那些不正确的思想感情。譬如有这样一种知識分子，他終日計算他的工資分，他以为自己应得一百元而实际只得九十九元而懊惱。这种知識分子，假如得到机会去与工農群众接触，看看我們的劳动人民想的是什么問題，做的是什么事，他的眼界，是否会擴大一点呢？我想是可以的。因此，讓知識分子經常下厂下鄉，是改变他們的思想感情的一条重要途徑。

現在的高級知識分子，有許多是在高等学校中从事教学工作的。特别我們这些搞社会科学的人，每天在講台上所講的，应当是客观存在的正确反映。但是处在我們今日的时代，客观世界的变动是迅速的，因而我們的思想經常落后於实际。譬如第一个五年計划上面說，到1957年，参加現有的初級形式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農戶將佔全國農戶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但是我們在1955年，農村中就出現了農業合作化的高潮，参加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農戶，已佔全國農戶总数60%以上。假如不下鄉去看看，我們如何能够說明这一高潮呢。不但在这一个問題上我們的思想脫离实际，就在其他許多問題上，我从最近这一次旅行中，也發現許多我們在講稿中所寫的，与实际的情况不甚相符，有的还相差很远。譬如我們講工資制度，总是提到計件工資的优点，但現在还有許多工厂，沒有推行这种制度。此中的困难何在，我們还不能原原本本的說出來。又如講物資技術供应計划，我們談的是苏联的办法，其中有許多細節，在我們今天还用不上。因此，为了提高教学的質量，使高等学校中的教育工作者能够把工作做好，关起門來教書，已經行不通了。教育工作者必須經常有接触实际的机会，才能作出正确的反映。

接触实际生活的作用还不只此。目前各校都在提倡科学研究，要使我們的科学水准，在最短的时期內，赶上先進的國家。党和政府，也号召作研究工作的人，要从实际中發現問題、研究問題，並以研究的所得，來解决实际問題。但是各校的研究題目，眞能对於解决实际問題起作用的，还不多見。原因是我們所选的題目，就有許多不是从实际中來的。我們的大学，应經常与一些工厂、農場、行政机关保持联系，並不断地派遣教員到現場去發現問題、研究問題。譬如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按劳付酬問題，有些合作社解决得很好，有些合作社还解决得不大好。我們的研究工作者就应当親自到農村去訪問若干合作社，把这一問題有系統地研究一下，总結一些先進的經驗，这对於推动合作化的工作是有益处的。又如我們的工厂，对於完成產量与產值指标，比較是成功的，但对於完成質量指标，如成本，劳动生產率等等，則还有問題。这些問題，就应当由我們去研究解决。苏联"哲学問題"雜誌有一篇社論說："正是这种对共產主义建設，对千百万人的活生生的創造活动的直接研究，才能丰富科学，並为創造性的研究工作提供材料。也只有以研究生活为

根据的科学工作才是科学創造性發展的可靠基礎。"（"辯証唯物主义論文集"，第90—91頁）只要我們把研究工作与实际生活密切結合起來，我們的科学水准才可逐漸提高，同时我們教材的內容，也得到逐漸改善的保証。

这还是問題的一方面。問題的另一方面，就是从事研究工作的人，因为研究的問題，是从生活中提出來的，而研究的結果，又有可能把我國的社会主义建設推進一步，就使这些做研究工作的知識分子，馬上会感到自己的工作，直接与社会主义建設打成一片，因而提高自己主人翁的感覚，發揮自己的創造性与積極性。从这种研究工作中，知識分子会認識到工人農民的事業，就是自己的事業，而自己的事業，也就是工人農民的事業。旧知識分子的思想感情將在这种活动中逐漸死亡，而劳动知識分子的思想感情，則將在这种活动中得到誕生与發展。

知識分子怎样循着自己專業的途徑走向社会主义？

賀　麟

关於团結和改造知識分子使走向社会主义、共產主义，列寧曾有过偉大而英明的指示，这个指示符合於团結、改造知識分子的客观發展規律，而且在苏联、在解放后的新中國都已經收到非常宏大的成效。列寧的指示說："工程师承認共產主义思想所經歷的途徑並不像从前那些在秘密条件下工作的宣傳員和著作家所經歷的一样，而是經过他在自己那一門科学方面所达到的实际成果，例如農藝学家是循着自己的途徑來承認共產主义思想的。"①这里用來作例子的工程师、農藝学家当然也可以廣泛地指一般学者、專家和有專門学問基礎的高級知識分子。

当此全國農業合作化已达到了高潮，工商業的社会主义改造也進入了新階段，而知識分子的社会主义改造，亦即对知識分子進一步的团結和改造以適应突飛猛進的社会主义建設的新局势和新需要的問題，正是大家所集中注意的时候，我願意單就列寧对团結和改造知識分子的这一偉大指示，說出我个人的一些体会。

列寧所說的工程师、科学專家"循着自己的途徑來承認共產主义"，一方面是指專家、学者在新的条件下应力求自己專業的提高与發展，把自己發展和改革本專業業务的理想与計划实現出來，把自己深入鑽研本專業和擴大其效用的積極性和潛在力發揮出來。另一方面这話也意味着把自己的專業与政治实踐、人民大众的需要相結合，更意味着学者、專家要在專業方面，通过批評与自我批評，改造本專業內的旧的資產階級思想，承認並接受馬克思列寧主义和共產主义思想。讓各專家、学者"循着自己的途徑"，这是照顧到他們專業方面的特殊性；要求他們共同"承認共產主义思想"，也就是要求他們接受馬克思列寧主义的普遍眞理。因此列寧这个指示中还包含着普遍与特殊相結合的辯証法原則。各个專家、学者都循着自己的途徑向前發展和提高，那就是百花齐放，各得其所；他們都共同一致承認共產主义思想，那就是殊途同归，道一同風。

列寧指出旧的專家、学者承認共產主义的路徑与在秘密条件下工作的宣傳員和著作家所經歷的不同，也有極其重要的意义。因为曾經有过这样的旧知識分子，他覚得他不配参加社会主义的革命建設工作，他不像党里面的老幹部那样出死入生地作过地下革命工作或对國民党反动政权参加过政治的或軍事的斗爭，在他看來，这个人民政权是共產党打出來的天下，与旧知識分子無关。他只能处於雇傭和作客的地位，靠他的專門技術或学問維持一定的生活水平罢了。抱着这样的态度，積極性如何能發揮出來呢？現在列寧为这样的旧知識分子指出一条"循着自己的途徑承認共產主义思想"的光明大道，使他們欢欣鼓舞地認識到他們可以得到党的帮助，可以向老幹部学習，同老幹部一道，对社会主义的革命建設工作，憑他們的專門知識尽自己一份的力

① 列寧："論統一經济計划"。

量。他們会感到莫大的安慰和光荣。一般講來，有了这样的覚悟，克服掉雇傭、作客思想的知識分子就算是初步發动起來了，他們的積極性和潛在力就算找到發揮的途徑了。

学術脫离政治是知識分子、特别是旧知識分子的一个主要特征。但这也有其一定的客观原因，而並不是基於他們的本性的。第一，他們的專門学問不为反动統治階級所重視，他們研究学術的願望和理想不惟得不到支持，有时反而受到阻难；在这种情况下，他們何不乐得自鳴清高，为什么要向反动政权靠攏呢？第二，也有一些政客、官僚表面上裝作"尊重学術"的样子，实际上乃是想利用一些学者、專家作他个人升官發財的政治資本並为反动政权撑持門面。当然有不少的高級知識分子曾經上了他們的当，走上反人民的道路。但是也有許多学者、專家是为了避免卑鄙的官僚政客的糾纏，因而走上学術脫离政治的道路的，甚至养成害怕与任何政治接近的心理。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諒解的。但是共產党和毛主席所領導的人民政府，做了数不清的驚天动地的偉大事業，有着無限的威信，为全國人民所衷心爱戴，所有知識分子、專家、学者們大都兴奋感激，拥护歌頌之不暇，更沒有人願意脫离政治，自外於人民、自外於社会主义的革命建設。所以現在的問題已不是脫离政治的問題，而是知識分子在他的專業基礎上如何依靠党，得到党的帮助和指導的問題。他們唯一的要求只在於希望党和政府給予他們以种种便利和帮助，讓他們可以更積極地鑽研專業，充分發揮其效能。所以列寧的指示实在打动了每一个專家、学者的心，替他們指出了唯一正确的出路。

列寧这一指示还可以糾正兩种偏向：一种偏向是：学者、專家僅僅知道"循自己的途徑"，抱殘守缺，故步自封，不尋求馬克思列寧主义观点和方法的指導，不爭取党的領導与帮助。另一偏向为有一些專家、学者为了要求進步或为了工作的需要，丢掉了他們多年來从事研究的專業，等於改了行，投身於政治工作，全部时間用在行政事务方面。現在我們听見有"專家归隊"的呼声，也听見有專家、学者自己嘲笑自己"不务正業"的談話，我們認为这是適时的。因为人民要求於学者、專家的是循自己的途徑走進社会主义，並不是放棄自己的專業空着手走進社会主义。

不單是工程师、農藝学家、自然科学家应該循着自己專業的途徑走進社会主义，就是社会科学或文藝理論方面过去專搞資產階級唯心主义那一套的人，也应該"循着自己的途徑來承認共產主义思想"。这意思是說，他有义务，——人民也期待他——把他过去所研究、傳播的那一套唯心論的旧东西，从新的立場、观点、方法予以徹底的批判，从批判自己專業范圍內的唯心主义观点以走進社会主义。因为誰都知道，从唯心主义的堡壘中內部起义，較之从外面去攻打，是更易於夺下堡壘的。这就是过去搞資產階級唯心主义的社会科学和文藝理論的人循着自己專業的途徑，承認共產主义思想的意义。

学者、專家一般都是热爱他們的專業的。現在党对於他們所热爱的專業表示重視和鼓励，人民、祖國对於他們所热爱的專業感到迫切的需要，他們必然会以万分兴奋和感激的心情，把他們的專門知識貢献給党、祖國和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現在我國已經培养出大量的新型知識分子，以忘我的劳动，献身給人民的科学研究事業和各項建設事業，这正表示了党团結、改造知識分子的正确政策之勝利的执行和偉大的成功。

再說具体一点吧，譬如，一个学者在旧社会感到無人理会，沒有積極性完成的著作，在新社会因为人民的需要而提早完成了。在旧社会被限制不能出版的著作，在新社会里得以很好的紙張，很精的印刷出版了。在旧社会出版了書很少人讀，而在新社会里著作出版后發行动輒达到万册以上。在旧的大学里，学生人数少，教出几个学生，畢業后也沒有出路，而在新社会中班上学生多了若干倍，畢業后总是供不应求，不煩教員寫介紹信为学生謀职業。类似这样的新鮮的事实处处都足以鼓舞起每一个專家、学者对於他的專業的热爱，和研究的積極性。同时也使他具体而親切地感覚到他的專門研究工作是与党、与祖國、与全体人民共命运同呼吸的。这样他不惟不会脫离政治，而他的政治積極性和覚悟水平正是推动他深入鑽研業务、提高質量、積極貢献給人民的偉大动力。

由此可見，列寧的指示，要求知識分子一方面加强鑽研專業知識，一方面加强学習馬克思列寧主义，这就是說，要求業务与政治相結合，科学研究与革命实踐相結合。这是党团結、改造知識分子的途徑，也是知識分子自我改造、眞正为人民服务的途徑。

迎接文化高潮

馮友蘭

北京和其他不少的大城市，都已經進入社会主义社会。一兩月以前看着还好像是远景的东西，現在已成为擺在眼前的現实了。農業合作化、資本主义工商業改造、手工業合作化，三个高潮，一个接着一个。眼看再要湧來的就是文化高潮。

形势發展的非常之快，知識分子必須更快地改造自己，迎接文化高潮，在文化高潮中，充分發揮自己的力量。形势的發展，必然为發揮知識分子的潛力准备好一切最有利的条件。但是客观的条件，还需加上主观的努力，才能發生作用。知識分子必須努力克服自己的缺点，尤其是还沒有改造好的旧知識分子，必須克服自己的旧習慣旧作風，才能跟社会主义社会的其他方面的工作配合得上。

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作都有高度的計划性。整个的社会，都按照一定的計划前進，其中每一部分，每一个工作者，也都要按照一定的計划進行自己的工作，不然就要脫節，不但不能帮助社会的整个工作，反而成了它前進的阻碍。

这对於自由散漫慣了的知識分子就好像野馬上籠头一样很不習慣。在这一方面，知識分子不但比工人差得太远，就是比農民也落后很多。一个月以前，我参观过郊区的几个農業生產合作社。每个社都有他們自己的生產計划。有一个社拿出1955年的計划，共有三大厚本，而且还是小字寫的。一本是社在1955年的总計划，一本是各生產隊的計划，一本是各項工作的規格和定工分的标准。每項規定都非常的細致具体。这些計划的本身固然是重要，更重要的是作为这些計划的体現者的思想的進步。農民本來是个体小生產者，現在組織得这样的嚴密，这是一个很大的組織过程，也是一个很大的思想改造过程。

必須承認，知識分子在这一方面，跟以前比較起來，也还是有進步的。就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國哲学史这門功課說吧，40年前，我在北大上学的时候，我們的先生講了半年，才講到周公。后來有的教授一学期只講一个"庄子天下篇"。可是現在講一門功課，学年終結，必須得講完，还得按一定的進度，不許前松后緊。这是对於一个教师的起碼的要求，可是以前就不是这样。教师們先是覺得很别扭，后來也習慣了。这就是進步。可是進步的速度还远赶不上客观形势的發展。

有人說現在知識分子有妄自菲薄和妄自尊大兩种缺点。其实就我所接触到的，还是妄自尊大的多。有些人說些妄自菲薄的話，其实他是在發牢騷。他的妄自菲薄正是妄自尊大的另一表現方式。一般的知識分子，对於自己总是有不正确的估計，一般地是把自己估計过高。别人認为他能作这一种事，他偏認为他能作那一种事。叫他作这种事，他認为瞧不起他，他不作。叫他作那种事，他实在是力量不够，作不了。这样他就与社会的整体計划配合不上，他自己的潛力，也就發揮不出來。

爱面子、擺架子的坏思想，在知識分子中，特别是沒有改造好的旧知識分子中，还是很佔优势。因此批評与自我批評这个武器，还不能充分發揮作用。就我所参加工作的这些單位看起來，批評与自我批評，都只是在一个"运动"中，才可以展开，"运动"一过似乎就停止了。我們能在一个"运动"中進行批評与自我批評，能在一个群众的会上進行批評与自我批評。可是在兩人对面正可以談心的时候，反而不能進行批評与自我批評了。我个人覺得是如此，我猜想有些人也是这样。因此在我們中間，还須要說話的藝術。往往考慮怎样說比考慮說什么还要費时間。这眞是时間精力的浪費。在这些情况之下，我深切感覺到旧思想是社会進步的絆脚石。

在社会主义的高潮面前，我个人的初步感覺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我們的祖國这样快地進入社会主义，懼的是在即將到來的文化高潮中，党和人民对於知識分子的期望極高，任务重大，現有的知識分子，未必能够勝任。但是國家的進步，在各方面都是一日千里。文化高潮，必然到來。迎接文化高潮的任务，現有的知識分子，能勝任也得勝任，不能勝任也得勝任。在党和毛主席的領導和教育下，我相信全國的絕大多数知識分子，一定能克服他們的缺点，發揮他們的潛力，完成國家給他們的任务。

吳家木桥農業生產合作社經济調查

李百冠　朱开謨

浙江省嘉兴縣曹庄鄉吳家木桥農業生產合作社是1954年秋季建立起來的。它在1955年秋收以前只有30戶，秋后擴大到38戶。它的經济特点，是一个建立不久的、依賴農民工具生產的、小型的半社会主义合作社。这样的合作社，不僅在杭嘉湖平原現有的合作社中有相当大的代表性，而且在全國來說，目前也是最大量地存在的。本文就它在1955年、就是办社第一年当中生產力与生產关系所發生的变化以及兩者間的相互关系，來分析研究这种合作社在經济上的优越性有多少大，是靠什么得來的，怎样繼續發展農業生產力，及其提高为大型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質的合作社的条件和途徑。

一　办社以前小農經济怎样束縛了農業生產力的發展

吳家木桥合作社30戶農民在1954年个体經营的时候，共佔有耕地418畝(內水田356畝、旱地62畝)，共有120人，每人平均3.48畝；男女全劳动力32人，半劳动力31人，合計63人；耕牛11头，農船1只，水車、犂耙、稻桶等主要農具90件。总的看來，劳动力和生產工具都是够用的。当地河渠交錯，排水、灌溉的自然条件良好。它屬於平原稻產区，歷年來在每年農業总產值中，水稻產值佔93%，春花（麥子、蚕豆和油菜）及大豆僅佔7%；副業生產只有蚕繭和猪羊等，每年產值只佔農副業总產值5%左右。

自1950年冬季实行了土地改革以后，随着互助合作运动的發展及其他各項農業政策的逐步貫徹执行，他們的農作物產量逐年提高，家庭經济逐年發展。水稻單位面積產量：1949年为每畝380斤，1951年提高到400斤，1952年达到470斤，1953年虽遭遇了数十年來未有的大旱，仍提高到480斤，突破本村歷來最高水平，1954年則因雨水过多和虫害嚴重而降低为420斤。各階層農民經济發展情况：30戶当中，土地改革以前的成分为：佃農4戶、貧農16戶、中農8戶、其他劳动者2戶；1954年为貧農9戶、新下中農10戶、新上中農3戶、老下中農3戶、老上中農5戶，其中貧農和下中農佔73.3%。

現在我們把吳家木桥（自然村）这30戶農民經济發展的歷史过程分三个时期來加以考察：

（一）土地改革以前，生產力極其薄弱，農作物產量很低。那个时候，80%以上的土地为地主所佔有，租佃土地每畝要向地主繳納租谷140斤；有19戶農民每年要借大量高利貸，再加上解放前國民党反动政府的苛捐雜稅，剝削得農民窮苦不堪。尤其是貧農，年年"礱罢無米"，無力維持簡單的再生產，農家每年总收入中用作生產費用的只佔10%左右，不少人出賣和抵押土地，有五个人拋棄土地流入城市，出現了土地与農戶分离的貧困破產現象。由於農業生產力極度薄弱，加上農民缺乏經营兴趣，造成耕作非常粗放，突出地表現在种不起晚稻，全部都种早稻和中稻，原因是种早、中稻省本省力，比晚稻少施一遍肥，少耘一遍田；而且收穫季節比晚稻早兩三个月，可以提早接济口粮。但是早、中稻產量每畝要比晚稻低一百多斤，解放前好年景平均只收三百七、八十斤，而貧農的產量竟低到二百五十斤上下。農民称早、中稻为"苦命稻"。

（二）土地改革以后，1951年和1952年，是農業生產迅速恢复和發展时期。到1952年，每畝產量提高到470斤，比1949年的380斤增加了23.7%，農民的再生產能力和經济生活也随之比較穩定了。这主要是依靠了農民在土地改革以后所發揚起來的个体生產積極性和互助合作積極性。在当地党組織的領導之下，他們在1951年就組織了兩个臨时性互助組，1952年提高为常年互助組。由於集体劳动，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分散經营的弱点，解决了翻身農民缺乏耕牛、農具的困难，开始改進耕作技術（深耕細作、培育壯秧、小株密植、合理灌溉、选用良

种等等），增施各种肥料（多罱河泥、多种綠肥、施用化学肥料），合伙添置耕牛、農具，初步改变了过去耕作粗放、技術落后的面貌，增大了農業經营的集約性。

（三）1953年和1954年，正是我國進入社会主义建設时期、实行發展國民經济的第一个五年計划的开头兩年，吳家木桥的農業增產率却反而降低了。1953年每畝產量480斤，只比1952年增加2.1%，1954年降低到420斤，比1953年減產12.5%。同时商品粮食也随之減少了，1953年共售粮七万斤，1954年只售六万五千斤。这說明了什么問題呢？这說明了小農經济，在遭遇了数十年來未有的大旱和大澇災害襲击的情况之下，虽然大大压縮了受災面積和受災程度，但終究还不能够完全战勝，同时也沒有条件在大面積上实現改变土地耕种制度等新的增產技術措施（下面要詳加分析）。但是就在1954年，本鄉第一年試办的百花村、南毛浜、石灰桥、水达桥四个合作社依靠了集体經营的力量，不但战勝了澇災，而且改种了晚稻，獲得了每畝平均530斤的空前大丰收，比它們1953年互助組每畝449斤增產18.2%，其中產量最高的百花村合作社每畝达到585斤，創造了本鄉水稻大面積丰產的最高紀錄。1954年全鄉96个互助組的平均產量也是420斤（其中部分貧農和下中農的產量不到300斤），全鄉30戶富農的平均產量为473斤。就是說，合作社的產量比互助組高20%，比富農高10.8%。合作社不但產量高，由於提高劳动效率，降低生產成本，社員的实际純收入增加得更多，四个合作社共有54戶，1954年的純收入折合稻谷二十八万六千斤，比1953年的二十二万四千斤增加了27%。鉄一般的事实証明：1953年和1954年吳家木桥農民的增產率降低以至減產，决不应当單純归咎於遭遇了自然災害，而是典型地提出了小農經济限制和束縛了農業生產力的發展这样一个帶有根本性質的問題。

那末，小農經济为什么和怎样束縛了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呢？

首先，我們來看一看各階層佔有生產資料的情况：

	戶数	%	水田（畝）	%	旱地（畝）	%	耕牛（头）	%	大農具（件）	%
合計	30	100	355.7	100	62.19	100	11	100	76.5	100
貧農	9	30	58.2	16.4	9.75	15.68	0.6	5.45	3.5	4.59
新下中農	10	33.3	111.4	31.3	13.04	20.97	1.4	12.74	16	20.89
新上中農	3	10	48.6	13.7	11.53	18.54	3	27.27	11	14.39
老下中農	3	10	48.5	13.6	12.49	20.08	2	18.18	13	17
老上中農	5	16.7	89	25	15.38	24.73	4	36.36	33	43.13

由此可見：总的說來是經营分散，規模狹小，而各階層農戶佔有土地和生產工具的数量極不平衡，並且不相適应。就各階層說來，貧農佔有土地的数量較少、質量較坏，耕牛、農具远远不敷应用；新、老下中農佔有土地的数量和質量一般，老下中農耕牛、農具勉强够用，新下中農尙不齐备；新、老上中農佔有土地数量多、質量好，耕牛、農具不但够用，而且还有多余。

其次，各階層農戶佔有的生產資料数量和質量不平衡，生產費用支出和生活費用支出的比例也頗不平衡。我們調查了貧農、下中農、上中農当中的典型戶在1954年全年支出中生活費用和生產費用的比例如下：

	張金木（貧農）	陶阿四（新下中農）	金玉田（老上中農）
（一）生產費用支出（單位元）			
种籽	8	15.76	19.86
肥料	18	32.8	64
農具折旧	4.72	18.4	18.4
飼料	7.2	27.6	48.9
合計	37.92	94.56	151.16
（二）生活費用支出（單位元）			

口粮	112	200	233.44
衣着	8	25	50
日用（包括教育医藥費用）	48	36	72
工資（在互助組內找出）	0	24.4	16
合計	168	285.4	371.44
（三）生產、生活費用合計（單位元）	205.92	379.96	506.6
生產費用佔%	18.5	24.9	30
生活費用佔%	81.5	75.1	70

由此可見：总的說來，生產費用支出所佔的比例比土地改革以前是顯著提高了，但是生活支出还是很大，而生產支出較小，这說明了農業生產力的落后。依靠互助組的集体劳动，只是实現了以土地加工为主的技術改進，而生產工具尙未發生什么根本的变化，農民依然憑借旧式的、不足的手工農具進行農作。同时以上情况还表明：小農經济不能够迅速地積累資金，缺乏擴大再生產的能力。就各階層說來，典型上中農的生活費用佔70%，生產費用佔30%，其中農具佔3.6%，稍有擴大再生產的能力；下中農生活費用佔75.1%，生產費用佔24.9%，其中農具佔4.9%，勉强能够維持簡單的再生產；貧農的生活費用佔81.5%，生產費用佔18.5%，其中農具僅佔2.3%，他們的生活比較解放前是好多了，但是仍然感到困难，簡單再生產的能力都还很不穩定，每年要依靠國家的農業貸款扶持來解决生活上和生產上的困难。

我們且看小農經济在实际生產中所顯露出來的对於生產力的限制和束縛作用：（一）小塊土地的分散經营，使得劳动力耗費得極端不合理，劳动利用率極低。每个男全劳动力平均每年只幹活一百五十天左右，妇女和男半劳动力做工更少。因此每当農忙季節，就感到劳动力不足，幹活爭先恐后，不但耕作粗放，而且往往耽悞農事季節，造成損失；而一到農忙过去，却又無活可做，產生季節性劳动力剩余。例如冬季本來可以罱河泥，但因为人、船不能結合而自己不能罱，富裕農民僱外地人罱，貧農和下中農只得少罱或不罱。（二）在分散經营的条件下，每畝水田必須使用較多的耕牛，而耕牛的無計划使用，却減低了耕牛的利用率，每头牛一年只使用五十天左右。其余的时間白白浪費了飼料。但是無牛戶和少牛戶（部分貧農和下中農）仍然不能够適时耕作。大型農具使用不合理的情况也和耕牛相似。（三）由於以上兩个原因，加上分散經营不能集中連片种植，就阻碍了改变耕种制度及其它各項科学的栽培技術的实行。因此高產量田难以繼續提高產量，低產量田無法赶上高產量水平，田塊之間產量高低懸殊。共有最低產量田70畝（大部是貧農的、少数是下中農的），每畝常年產量只有三百斤左右。这些田塊的土質及自然条件与高產量田相仿，差別就在於因歷來施肥極少而致土壤的肥力很差。但是增產的潛在力量很大。

总之，这已經到了急需找到出路的时候了，而唯一的出路就是農業合作化。貧農和下中農对於这一点体会得最为深刻，他們对"四大統一"（土地、劳力、工具、肥料）感到極大的兴趣，对按劳取酬的原則由衷地热烈拥护。他們說："互助組不能够徹底翻身，只有靠合作化才能徹底翻身，大家富裕。"又說："毛主席眞比爺娘还親，土地改革使我們成家立業，合作化讓我們越过越富，社会主义大路越走越亮。"又由於本鄉的重点社的產量已經大大超过了富農，因此富裕農民也親眼看到合作化的好处和前途。所以，在党的正确領導之下，在1954年秋季本鄉掀起的合作化运动高潮当中，吳家木桥的農民欢欣鼓舞地建立起合作社來，乃是發展農業經济的必然趋势，任何人为的力量也不能拉它向后退。

二　办社第一年内生產力的提高

（一）办社第一年在經济上所顯示的优越性：

第一，我們从收穫量來看，集体經营較之分散經营，各种農作物的產量都有了大量的增加，突破了本村歷史上的最高丰產紀錄。1955年粮食总產量为二十六万七千斤，比1954年的十八万七千斤增加42.5%。水稻每畝平均產量达到520斤，單位面積產量比1954年的420斤增加23.8%，比歷來最高產量、1953年的480斤增產8.3%，比同年全鄉互助組和單

幹農民的每畝平均產量高16%。春花（麥子、蚕豆、油菜）总產量比1954年增加70%。副業生產也略有發展，蚕繭增產40%、养魚增產400%。

第二，農副業生產成本降低，社員的純收入大大增加。現在把兩年的農業產值和農業成本对比如下：

	1955年	1954年
農業產值（元）	22,602	16,929
農業成本	4,415	3,600
農業成本佔產值的%	19.54	21.3
農業純收入	18,187	13,329

1955年全社農副業純收入总額为19,645元，比1954年的13,933元增加41%。由於分配合理，使全社30戶家家增加收入（在下一節"生產关系及分配方式的变化"中还要詳細分析）。

第三，提高了粮食的商品率，支援了國家的社会主义工業建設。1955年吳家木桥合作社賣給國家的余粮，不僅絕对数字增加，而且佔粮食总產量的比率也提高了：

	1955年	1954年
粮食总產量（斤）	267,000	187,300
售粮数	106,723	65 000
售粮数佔总產量的%	40	35

同时，由於实產量超过了粮食"三定"的定產量，社員自留的口粮、种子和飼料也增加了。1954年共留口粮和飼料72,400斤，每人平均603斤，1955年單是口粮就有81,260斤，每人平均652斤（部分戶吃不了，还要自动把多余部分賣給國家），种子8,248斤，飼料3,080斤。

第四，社員普遍地進一步改善了經济生活，对於輕工業品生活資料的需要有了增加，間接地为國家積累了資金。單就購買棉布一項來說，1954年秋收以后（基本上就是全年的情况）共買布150丈，質量上大部是工農藍布；1955年秋收后共買了288丈，其中很多是卡嘰布。另外还買了衛生衫、棉毛衫42件，袜子160双，套鞋12双，織了4件絨綫衫，青年人差不多都買了球鞋。貧農的生活困难大大減輕。除了留足全年口粮以外，衣著也有增添。例如阮良木一直是一条破黃絮过冬，1955年冬季做了一条新棉被；張金水往年是拆了棉襖当夾襖，單布衫都換替不过來，1955年冬季買了一件衛生衫，做了兩件新布衫。社員們在改善物質生活的基礎上，对提高文化生活的要求也更加迫切了。除了要办好民校以外，决定用公益金裝置一个有綫廣播器。还要修桥鋪路，植樹造林，改善生活环境。

第五，穩定和开始擴大了再生產的能力。为了說明这个問題，我們可以把1955年秋收以后全社純收入的各項用途和1954年的作一对比：

	1955年	1954年
全年純收入（元）	19.645	13,933
來年生活費用	9,816	7,279
交納農業稅	3,528	3,528
归还貸款和債务	1,333	1,486
購買爱國公債	110	0
公積金	576	0
公益金	115	0
擴大再生產投資	2,046	590
發展家庭副業資金	621	550
儲蓄	1,500	500

从以上可以看出：准备投入1956年擴大再生產的資金共3,243元，佔1955年純收入的16.5%，比1954年秋后投入1955年的擴大再生產資金增加184%。用於購置耕牛3头、打稻架4架、双輪双鏵犁1部、噴霧器1架，建造糞窖2只、倉房3間，以及增施家畜肥料和化学肥料等等，这就为1956年進一步增加農作物產量和發展農業經济打下了一部分的物質基礎。

（二）生產力究竟起了什么变化？

1955年，吳家木桥合作社还只是一个建立不久的小型的初級形式的合作社，基本上仍然使用着原來的工具生產，用錢購買的生產資料增加不多，就是說，農業經营的有机構成沒有什么大的提高，还是处在小生產的階段。但是，由於人与人的生產关系变化了，人們劳动的本身开始獲得了廣濶的活动場所，因而使劳动的積極性和劳动生產率日益高漲起來。这是目前生產力提高的基本方面。

下面我們就來具体分析吳家木桥合作社1955年的生產力較之1954年所起的变化：

第一，提高耕作技術，是增加農作物產量的中心环節，也是生產力提高的重要因素。耕种一定面積的土地，要增加劳动和資金的投放，都必須以技術的改進或改革为前提。吳家木桥合作社1955年在

党和人民政府的組織領導和技術指導之下，实行了下列几个方面的技術改進：

（1）改变耕种制度，增加复种面積。1954年共种水田368畝，其中种單季早、中稻167.6畝、單季晚稻194.4畝、双季間作稻6畝；1955年共种水田434畝，其中單季早、中稻压縮到37.6畝，單季晚稻擴大到313.9畝，双季間作稻擴大到82.5畝。就是說，有130畝早、中稻改种了晚稻和双季稻。1955年种植春花的面積也比1954年擴大了100畝。單季晚稻每畝550斤，比早、中稻每畝400斤增產150斤；双季稻每畝650斤，又比單季晚稻增產100斤。僅此一項，即增產粮食三万六千斤。

（2）改進耕作方法，深耕細作，小株密植等等。全社水田普遍比1954年耕深二分，多耘一遍田，密植程度也有提高，旱地多鋤一遍草。

（3）同旱災和病虫害作斗爭。1955年遭遇了連續90天的大旱，病虫害發病时間早、种类多、面積廣，都被一一战勝，大大減輕了災害損失。

（4）选用良种，因地种植，並且繼續採用鹽水选种、落谷稀等培育壯秧的先進技術。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各項技術改進工作，都是在適时耕作、不悞農事季節的前提下面進行的。在農業生產中，时間因素極为重要，关系到对於气候冷暖、天气晴雨等自然条件的控制和利用。例如群众对於水稻种植說是"小暑落秧，只可納粮"（收成少）；对於种蚕豆說是"小雪不見叶，到老不生莢"；对於小麥撬溝培土說是："立冬金溝，冬后銀溝，开春草溝"，都强調了爭取季節的重要。过去許多貧農和下中農因耕牛、農具和劳动力不足而深受不能適时耕作之苦。

要在保証適时耕作的前提下实行大面積的耕作技術改進，而生產工具又並無質的改变，数量也很少增加，这就意味着只有依靠大量的手工加工，特别是在農忙季節，必須增加更多的劳动量。

第二，从增加生產資料的情况來看：

（1）土地：1955年擴大了耕种面積18%，使用公有水田66畝、旱地10畝，使这些土地从以往半荒廢狀态下解放出來。

（2）肥料：主要是人工增積自然肥料，河泥由1954年的每畝60担（僱外地人罱的）增加到80担（自己罱的），成本反而節約400元；其次是更多地施用化学肥料，肥田粉由1954年的3,646斤、价格450元增加到6,460斤、价格1,305元，即增加855元。另外，買進畜肥144元。

（3）農具：置备1.5匹馬力的小型抽水机一台，添置農船3只，共費654元。

（4）設备：造倉房3間、筑壩一条，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共費200元。

此外，由於耕牛利用率提高，又有了抽水机代替部分牛力从事灌溉工作，耕牛反而由1954年的十一头減少为七头半（賣去五头老牛、弱牛，買進一头牛壯牛），总共价格減少了600元。

以上生產工具、設备和商品肥料增加部分共为1,853元，節省和減少部分为1,000元，增減相抵，实际只增加固定財產和生產費用共为853元。由於耕地面積擴大，如按單位面積計算，几乎沒有什么增加，又由於產量增加，成本反而略为降低。因此，在这里，增加生產資料，也主要地是靠劳动力去創造和換取的，其次是对於生產資料的有計划的合理的使用，提高了利用率，以多余的換取缺乏的，最后才是化錢添置。当然，这並不是說增加生產資料不必要或不重要，恰恰相反，正是从現有經济的可能条件出發，既做到增加生產，又要節省成本，積累資金，为將來技術改革时期大量地使用机器、化学肥料及增添其它生產資料准备物資条件。

第三，基於以上分析，目前技術的改進与經营集約性的增大，主要是依靠提高劳动利用率，增加劳动量，以及提高現有生產工具和設备的利用率。因此，首要的問題，是坚持自願、互利原則，高度發揚社員群众社会主义的劳动積極性，依靠群众的热情和智慧和坚强的領導核心，來改善經营管理（生產計划、生產管理、劳动組織等），充分利用集体經营的优越条件，以达到以上的要求。吳家木桥合作社在1955年所达到的成就如下：

（1）劳动效率和劳动利用率的提高：

吳家木桥合作社1955年与1954年人数相同，但是投放在農副業生產和基本建設上的劳动量都大大增加了。1954年度共做工数为5,420个，每畝耕地平均只用12个工，63个男女全半劳动力折合成40个标准劳动力（中等男全劳动力），每个劳动力平均只做135.5个工，如以63人平均計算，每人只做80.7个工。1955年度全社共做了8,612个工，在耕地面積擴大18%的情况下，每畝耕地平均用工数量增加到15.2个，每个标准劳动力平均做215.3个工，63人每人平均做了136.6个工，就是說，劳动利用率提高了58.9%。同时，由於土地集中連片經营，大大減少了路途往返和耕作上的浪費劳动力現象，1955年比1954年節省了一千个工，投入有效的生產

劳动。再加上集体經营較之互助組在更大的程度上利用劳动分工和計划生產，同等劳动量的效率也大大提高了。

劳动利用率是怎样提高的呢？首先，最根本的原因，是合作社貫徹执行了以按劳計酬为主、兼顧土地报酬的分配原則；而在劳动报酬部分，又实行了劳动定額管理，按件計工，社員按照其劳动数量和質量獲取报酬，因此社員就很关心去給全社提供更多更好的劳动力，个人的利益和全社的集体利益是完全結合在一起的，再加上劳动力的有計划的合理組織和使用，打破了过去分散經营中小塊土地的限制，減少了劳动力的季節性剩余和技術性剩余，所以大大提高了劳动利用率。全社1955年比1954年多做的3,192个工，其來源分析如下：1.社員普遍起早貪黑地幹活，从"二头紅"（迟出早归）变成"兩头黑"（早出晚归），在夏收夏种、秋收冬种等農忙季節，大多数男全劳动力每天要做一个半定額，个别做到兩个以上定額，由此提供了增加的劳动工数約为1,550工，佔50％；2.全社过去从不参加田間劳动的11人（老年4人、青年妇女3人、少年4人），由於合作社分配給適宜的、輕便的農活，因此做了650个工，約佔全社增加工数的20％；3.入社前因家庭劳动力过剩而幹活很少的妇女13人，入社后紛紛从厨房里和孩子的牽累中解放出來，由附帶劳动变成主要劳动，多做了650个工，約佔20％；4.病弱的主要劳动力7人，由於在分工上得到照顧，多做了三百多个工，約佔全社增加工数的10％。

1955年比1954年增加的3,192个工和節省的1,000个工，合計4,192个工，其投放情况如下：1.用於增積自然肥料，共1,258个工，佔30％；2.用於耕种擴大部分的耕地，共757个工，佔18％；3.用於增加复种面積，共742个工，佔17.7％；4.用於深耕細作，522个工，佔12.6％；5.用以組織人力推水車抗旱，449个工，佔10.7％；6.用於長期性建設的，237个工，佔5.6％；7.用於社务的，227个工，佔5.4％。

由此可見：由於劳动效率和劳动利用率的提高，使得合作社提高耕作技術的可能性变为現实，保証了農作物產量的增加。

（2）生產工具利用率的提高：

吳家木桥合作社的事实証明，集体經营在每一單位面積上需要較少的耕牛和農具。由於耕牛、農具的節省和較充分的利用，加上个别新式農具的購置，就使得合作社的生產力加强了。

1954年全社30戶合計有耕牛11头，每头牛平均負担32.7畝水田的耕作，但是由於在分散經营的条件下，牛力的使用和耗費極不合理，因此还是感到不够应用，特别是無牛、少牛的農戶（貧農和下中農）因需借牛或"包耕包水"（把水田以一定代价包給有牛戶負責耕作和灌溉）而往往脫悞農事季節，耕作也很粗糙。1955年全社只使用七头半牛，而且面積擴大了，每头牛平均負担60畝田的耕作，倒耕得較为細致和適时。如果除去其中包括着的不合理地过度使用的部分，以每头牛至少能耕作46畝田計算，耕牛的利用率也要比办社以前提高24％。

耕牛利用率是怎样提高的呢？首先，由於周密計划，合理調剂，延長了耕牛的使用天数。1954年每头牛平均只使用五十天左右（当地只用牛來耕田和灌溉，旱地不用牛耕，也無使用牛力的副業，从霜降到清明整整五个月，耕牛是完全空閒着的），1955年每头牛平均使用了170天。同年当地互助組平均使用120天。其次，土地連片經营，減少了零星的排水灌溉溝渠，1954年共有車水埠头18处，1955年減少为12处，而且各生產隊都可就近耕作，因此大大減少了耕牛路途往返的浪費。再次，由於办社后老牛、弱牛調換了壯牛，社里喂养得好些，加上由最長於使牛的社員來駕馭耕作，眞所謂"兵强馬壯"，因此提高了耕作能力。

統一經营，使得農具的利用率也同样提高了。1954年共使用大型農具90件，1955年耕种面積擴大了，却只使用76件。其中整套牛具——水車、犂、耙是随着耕牛利用率的提高而節省的，稻桶、谷風車等則是随着劳动效率的提高而節省的。

（3）資金的集中和合理使用：

吳家木桥合作社由於有計划地合理使用資金，使有限的資金用到最当用的地方去，再加上國家農業貸款和貧農合作基金的大力扶植，信用合作社的存放款週轉，就不僅增加了資金的数量，而且大大提高了資金的效用和週轉率。

首先，从資金的來源來看，1954年30戶農副業生產使用貨幣資金总数为1,066元，其中各農戶本身積累的是476元，國家農業貸款390元，自由借貸200元；1955年全社使用貨幣資金总数为2,749元，其中社員投資1,987元，國家銀行和信用社的生產貸款450元，貧農合作基金貸款312元。以上情况說明了：一方面，國家对合作社的經济扶持是進一步加强了，这对解决貧困農民的投資困难，發揮富裕農

民向社投資的積極性，支持合作社發展農業生產的作用很大。另一方面，社員群众中積压的零星的資金是在自願、互利原則下集中和运用起來了。

其次，从資金的用途來看，1954年用於購買肥田粉的450元，用於支付僱人罱河泥的工資400元，用於農具修理的216元，而沒有添置農具的項目；1955年用於購買肥田粉的1,305元，用於向社外購買畜肥的144元，用於添置抽水机、農船的650元，用於買抽水机燃料的100元，用於農具修理的409元，用於其它（治虫藥械、建造倉房及零星开支）137元。以上情況說明：合作社能够办到个体經营不易办到的事情，破天荒地在一年当中就較多地添置了生產工具和增施了化学肥料，相反地減少了可以人工代替的、不必要的生產費用，从而增加了社里的固定財產，使農業生產开始有了擴大的趋势。虽然这种增加目前还是很微小的，但却是提高農業經营、發展集体經济的可喜的萌芽。

总之，集体劳动，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統一經营和調配，就可以更好地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从而能够大量增產。

吳家木桥合作社僅僅是在办社第一年，就以無可爭辯的事实，証明了合作社这种先進的生產关系对於生產力的重大推進作用，提供了發展農業生產的优越条件和無限廣濶的前途；它不僅宣告了在農業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傾保守思想的徹底破產（例如有一种人說：我們現在沒有拖拉机，合作化要慢慢來），而且批判了某些人們在合作社已經办起來以后，在發展農業生產的速度和規模上所存在着的右傾保守思想。这种右傾保守思想，对於合作化蘊藏着巨大的生產力估計不足，特別是看不到一个剛剛建立起來的初級形式合作社究竟依靠什么去增加農作物的產量，不自覺地用小農經济时期那种陈旧观点去看待已經变化了的客观情况和新生的事物，使自己的思想远远落在实际的后面。在今天農村的社会主义高潮面前，我們更有十分的必要使自己的思想適应新的情况，把合作社所具有的發展農業生產的优越条件高度运用起來。

三　生產关系及分配方式的变化

吳家木桥合作社在办社第一年內生產力就有了顯著的提高，其根源是与目前生產力相適应的半社会主义性質的生產关系起着主要的推進作用，並且具有决定性的力量。

（一）生產資料所有制及其獲取报酬的形式：

吳家木桥合作社在目前还是一种过渡形式的半社会主义經济，社內的生產工具已經基本上公有化了，但是对於社員交來統一使用的土地及少数别的生產資料，目前还保留社員的所有权，並且給社員以適当的报酬。在处理社內一切經济关系問題的时候，遵守着兩条根本原則：一条是貧農与中農互利的原則；另一条是公私兼顧的原則，把國家的利益、全社的利益和社員个人的利益正确地結合起來。它的各項主要的經济关系問題的处理情况如下：

（1）土地：全社入社的耕地418畝（水田356畝、旱地62畝），由合作社統一使用，按照社員入社土地的数量和質量，評定社員入社土地的產量（評產时一方面根据土地的質量，另一方面根据土地的实际產量），在其中扣除常年所需的生產成本以后，按照土地报酬佔45%，劳动报酬佔55%的比例，計算出土地报酬的固定数量。水田的报酬：一等田180斤（稻谷）、二等田171斤、三等田162斤、四等田153斤。旱地与水田同样計算出固定数量报酬；对於地上种植的桑樹，由於养蚕也是統一經营的，因此作为社員多年來的劳动成果，按照桑樹的常年產叶量、照顧其發展前途，另外評定报酬。農業稅由社員負担。这样处理社員的入社土地，主要是根据了1954年社員的覚悟程度和生產發展水平，在遵守土地报酬必須低於劳动报酬的原則之下，經过社員民主議定的。这种土地报酬，並不是剝削关系，而是土地轉为公有化的过渡形式。1955年由於社內增加生產和增加实际收入，土地报酬佔土、劳分配总数的实际比例只有35.3%，劳动报酬佔64.7%，每个劳动日分到1.54元。因此，既大大鼓舞了社員的劳动積極性，又保証了無論劳动力較多而土地較少、或土地較多而劳动力較少的社員戶戶都能增加收入。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全体社員的"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覚悟，开始削弱了土地私有的观念。

另外，这个合作社还有國家交給長期使用的耕地76畝（水田66畝、旱地10畝），不付土地报酬，農業稅由社負担。

为了照顧社員种植蔬菜或者别的園藝作物的需要，社員共有自留地15.75畝，每人平均0.14畝，佔每人所有土地的平均数的3%，已够用了。

（2）生產工具：耕牛和主要的大型農具已經公有化了。公有化的办法是折价入社，分攤股份基金。根据社內生產的需要和社員的負担能力，社員所有的11头耕牛全部折价入社，90件大型農具当中有76件折价入社。折价价格，耕牛按照略高於当地冬季市价（是冬季入社的）、農具按照供銷合作社牌价，評定成色，合理折价，共2,595元，按照入社田畝負担（公田应負担部分由公積金当中支付），每畝水田分攤股份基金5.18元，有12戶找進（富裕農民居多），18戶找出。为了兼顧社員的負担能力和本主的利益，价款的找补部分在三年內分期地付給本主。經过合作社和本主协商决定，沒有付清的价款不付利息。國家銀行及时發放了貧農合作基金貸款313元（包括公有化股份基金貸款和生產費股份基金貸款），貸給10戶（貧農7戶，新下中農3戶），基本上解决了他們交納不起的困难。耕牛入社以后，由社出賣4头，換進農船3只、抽水机1台。合作社規定股份基金在社員退社的时候可以帶走其交納的一份。此外，副業生產工具和設备（养蚕用的蚕具等）採取私有由社租用办法，小農具自备自用。这样做的結果，合作社內已經基本上解决了生產工具公共使用和私人佔有的矛盾。

生產費用，原是採取社員按照入社田畝向社定額投資，超过部分取息，不足部分付息（按照当地信用合作社存款利率計算）的办法。1955年秋收以后，也改为向社員征集股份基金，共計2,724元（包括8戶新社員在內），每畝田3.44元、每畝地2.4元，其中公田的生產費則按劳动力分攤。已經一次交清。社員家庭所積存的肥料，由合作社另行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買，价款在秋收以后付清。

（3）公共積累：1955年秋收分配当中，公積金在实际收入（生產总值扣除生產中的各項消耗）中提取3.5%，計576元，全部用於合作社的基本建設（購置打稻机、双輪双鏵犁、噴霧器、耕牛等）。公益金在实际收入中提取0.7%，計115元，用於發展合作社的文化福利事業（裝置有綫廣播器、購買汽灯及簡單的藥物等）。

（二）社員在生產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

在吳家木桥合作社內部，与所有的合作社一样，社員之間沒有剝削和被剝削的关系，而是同志間合作和互助的关系。其內部的生活，遵守着民主的原則、团結的原則和進步的原則。社員大会是合作社的最高管理机关，实行民主管理，行使社章所規定的处理社內一切重大問題的职权。社員大会选出來的管理委員会，是一个以共產党員、青年团員和貧農、新下中農的積極分子佔优势的坚强的領導核心，9个委員当中有党員3人、团員1人、其他村幹部積極分子5人（貧農1人、新下中農2人、上中農2人）。管理委員会在社內的党小組領導、团分支部协助之下，正确地進行管理社务的工作。因此，沒有貪污、盜竊，沒有包办、强迫，每个社員都有着同等的权利和义务，有着共同富裕和共同進步的光輝燦爛的幸福前途。

（三）產品分配情况：

由於合作社內貫徹了貧、中農互利的原則和公私兼顧的原則，对特殊困难戶还作了適当的照顧，因此1955年戶戶社員都增加了实际收入，並且保証了一定的公共積累。各階層增加收入的情况：

	1955年 純收入(元)	1954年 純收入	增加比率
貧農9戶	2,857.00	1,759.00	62.4%
23人每人平均	124.22	76.47	同上
新下中農10戶	5,156.00	3,864.00	35.6%
39人每人平均	132.20	99.08	同上
新上中農3戶	3,982.00	1,875.00	59%
19人每人平均	157.00	98.70	同上
老下中農3戶	2,137.00	1,576.00	35.6%
14人每人平均	152.60	112.50	同上
老上中農5戶	5,160.00	3,376.00	52.8%
34人每人平均	152.00	99.30	同上
合計	18,292.00	12,450.00	47.6%
129人每人平均	141.80	96.50	同上

其中貧農增加最多，上中農次之，下中農增加較少（原因是这个社的下中農劳动力較少較弱）。总的趋向是各階層的每人平均收入数目之間的差距开始縮小，向着相对平衡、共同富裕的方向發展。当然，就具体戶、具体人來說，由於劳动力多少强弱不等，他們的收入是不会平衡的。

我們再看几个典型戶入社前后家庭經济变化的情况：

貧農戴阿荣，1954年因劳动力弱，生產資料不足，5畝田只收1,500斤谷，全年缺6个月口粮。1955年社里照顧，分給輕活，共得110个劳动日，加土地报酬，共分到3,500斤谷，留足了來年口粮，偿还了25元旧債，生活進一步改善。

新下中農張金甫，土地改革以后，生活虽比过

去大大改善，但由於几年來娘生病，弟弟娶媳妇，虧空200元。1954年純收入折谷一万四千斤，短缺3个月生活費用。1955年在社里分得純收入折谷二万四千斤，全家11人留足了來年口粮，还清了旧債，向合作社交齐了生產費股份基金，買布200元，全家每人做了一、二套新衣，添制了新棉被，还多余200元存入銀行。

老上中農金玉田，秋收分配以前，他本人認定要減少收入，别的社員也为他担心。分配結果，比1954年增加收入折谷五千斤，全家7口人，每人平均增加七百多斤。

毫無疑問，社員們在普遍增加經济收入的基礎上，加上党的政治工作，不但貧農和下中農的社会主义覚悟提高得很快，富裕中農走合作化道路的决心也更加大了。

四　轉变为高級社和制定發展生產的規划

吳家木桥合作社在1955年究竟还只是一个建立不久的、小型的初級形式的合作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集体經济的优越性，但是由於領導骨幹經驗不多，經营管理还有缺点，因此这种优越性还远未充分發揮起來。最突出的問題，是从領導骨幹到社員群众的思想落后於生產关系起了变化的实际，时常用小農經济的眼光和办法去对待合作社的生產工作，例如增產指标保守，計划欠周密，若干可以採用的先進技術沒有採用，因地种植这个优越条件利用得很差；又加劳动管理不够健全，"爱社如家"的思想教育薄弱，有些社員工作只求数量，不顧質量，使生產遭受損失等等。特别是办社第一年獲得了空前的丰收以后，社員們就自滿自足起來，產生了"增產到頂"思想，有些人說："年年能够这样就很好，再要增產只有等拖拉机來了。"

毛主席"关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报告和十七条指示傳到農村以后，吳家木桥合作社的社員們和所有的農民一样，受到了巨大的鼓舞和啓發，开擴了自己的眼界，开始懂得了必須不断地把自己的生產適应於新的条件。因而使他們能够从兩个方面作出富有理想的規划：一方面是繼續發展生產，另一方面是爭取提早轉变为高級合作社，並且把兩者有机地結合起來，相互適应和相互促進。

1956年1月初，在群众迫切要求和中共曹庄鄉支部的領導之下，以吳家木桥合作社为核心，与鄰近的义和桥、三元村、西守村、曹庄桥（以上都是1954年秋季建立的合作社）、潘家桥（1955年秋季建立的新社）等五个合作社合併組織成为一个大型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了。現在它拥有280戶。同时，社內1956年發展農副業生產的指标和農業基本建設的規模和速度，都比原定的規划大大提高。全社3,064畝水田，1956年水稻單位面積增產指标高达每畝806斤，比1955年的490斤增加64%。吳家木桥合作社这种巨大的变化和富有理想的規划，完全是客观形势發展的必然趋势，决不是脫离实际的空想，也不是超越了可能的条件。

首先，从它提早轉变为高級合作社所具备的条件來看：

第一，为了更迅速地發展農業生產，增加社員的收入，就必須在办好低級社的基礎上轉变为高級社。取消土地报酬，完全按劳取酬，就会刺激社員進一步提高劳动積極性，提高劳动利用率和劳动生產率；打破地界，土地公有化，就能够毫無阻碍地進行大量的土地加工和農業基本建設，更合理地利用土地，增加生產內容。根据社內初步規划，1956年每个劳动日报酬將能达到3元以上，全社95%以上的農戶都能大大增加收入，即些貧困的、缺乏劳动力的鰥寡孤独戶也都能够得到照顧，至少达到食飽衣暖。

第二，社員自願，而且迫切要求轉为高級社。这首先是由於社員在办低級社的过程当中提高了社会主义覚悟，开始体驗到"按劳取酬"原則对自己的利益关系，削弱了土地私有观念；其次是本鄉在1955年試办的曹庄鄉第一高級合作社每畝水稻平均產量达到550斤，創造了1955年度全鄉大面積丰產的最高紀錄，秋收以后擴大到655戶，樹立了榜样；党中央和毛主席关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歷次指示大大鼓舞了農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積極性，群众進一步看見了自己的偉大的前途，因此全鄉在已經实現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入社農戶佔農戶总数98%）基礎上掀起了一个高級形式合作化的热潮，除原有一个高級社擴大了以外，在1956年1月初同时轉了三个高級社，加入高級社的農戶一共达到1,389戶，佔全鄉農戶总数80%。尤其是貧農和下中農兴奋地說："高級社完全按劳取酬，多劳多得，我們是'头頸盼得絲瓜長'了。"

（下轉第47頁）

"資本論"第一卷書評*

恩格斯

下面所刊載的"資本論"第一卷書評，为恩格斯所寫，其目的是打破資產階級报刊用來包圍"資本論"的沉默的陰謀。恩格斯並不限於在当时为数还不多的几个工人机关报刊或接近於工人运动的机关报刊上刊載書評；在1867年9月11日致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建議"为了把事情推动起來，……用資產階級观点來寫文章批評这本書。"馬克思答复說："你从資產階級观点來批評这本書的計划是最好的軍事手段"。（"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一版第23卷第445頁）。恩格斯为了实現这个計划，曾通过自己的友人，把許多書評寄到資產階級的机关刊物去。这些書評的一部分畢竟还是沒有刊載出來，而这里發表的是从手稿譯出來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一版編者

〔为"萊茵报"《Rheinische Zeitung》寫的書評〕

卡尔·馬克思　資本論　政治經济学批判　第一卷　資本的生產过程　梅斯納出版　1867年

普选权对我們到現在为止已有的議会政党添了一个新的政党，即社会民主党。在北德意志議会最近一次选举中，它在大多数大城市里和所有工厂区里，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並且通过了6个或8个代表。与再前一次的选举比較，它表現出了相当大的力量，因此我們可以假定，至少現在它还处在增長的过程中。在一个由於普选权，最后的决断現在已是屬於人数最多又最貧窮的階級的國度里，要繼續用庄重的緘默來处理这个政党的存在、活动和理論，便是愚蠢的了。

無論在少数社会民主党的議会議員之間內部如何分歧与散漫，我們还是可以肯定地說：这个政党的一切党团，都將欢迎这部書，把它看做自己理論的聖經，看做一个武庫，他們將从这个武庫中採取自己的最重要的論据。單是这个原因，这本書就值得特別注意了。但就是照它的內容本身來看，也是

---

*譯者按：这几篇書評，是从俄文第一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一分册(207—227頁)譯出的。譯文曾請宗白華先生根据德文本"馬克思恩格斯小經济学論文集"校正过；俄文本与德文原文有些出入，現照德文原文改。

恩格斯所寫的"資本論"第一卷書評，共有9篇，我們常見的是为"民主周报"（Demokratisches Wochenblatt）寫的書評及为"双周評論"（Fortnightly Rewiew）寫的書評(譯文見三联書店出版"恩格斯論資本論"），下面七篇書評还是第一次譯出。关於这些書評，除了上面俄文第一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編者按語外，叶·斯捷潘諾娃所寫的"恩格斯傳"里，曾有很好的說明，可以帮助讀者了解这几篇書評的意义："恩格斯在当时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是：展开对这本書的討論，並迫使資產階級經济学家發表对这本書的意見。

"結果，恩格斯終於达到了在資產階級报紙上發表一系列書評的目的。在这些書評中，恩格斯顯示了借批評的形式把馬克思的观点傳达給讀者的驚人本領，以致給讀者留下的印象是：对的畢竟还是馬克思而不是他的'批評者'。实际上，这些書評的鋒芒是針对着庸俗的政治經济学的代表（恩格斯想尽办法挑逗他們对'資本論'發表意見）和拉薩尔的理論观点的"。(見人民出版社版第145—6頁)

恩格斯在下面譯出的第一篇書評中，十分簡要而易解地說明了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說，"資本論"第一卷的內容，还附帶地指出第一卷"除了开头40頁有些困难的辯証法的东西外，虽然有極嚴格的科学性，这部書还是容易理解的"；在第二篇書評中特別着重指出了馬克思对於經济規律和經济范疇的歷史态度；第三篇書評非常出色地完成了叶·斯捷潘諾娃所指出的那个主要任务；第四篇和第五篇主要是說明馬克思的"把經济社会形态的發展看做一个歷史过程"的观点(見"資本論"第一卷初版序言)；第六篇及第七篇則按照所投各报的性質而說明了馬克思寫英國工厂法史等时引用原始材料的这种嚴格科学精神，同时也說明了工人階級为爭取縮短劳动日而斗爭的歷史。这几篇書評，实际上是从各个角度來說明和介紹"資本論"第一卷的內容和馬克思的經济学說，这对於我們現在学習和研究"資本論"第一卷仍是有很大帮助的。

能引起兴趣的。拉薩尔的主要論据，——拉薩尔在政治經济学中僅僅是馬克思的学生，——限於不断重复着所謂李嘉圖的工資律——而这里我們面前的这部著作，它的作者却以無可爭辯的罕見的博学，在与整个經济科学的联系中，考察了資本与劳动之間的全部关系，以"揭露現代社会的經济运动規律"为自己的終極目的，並根据对这个問題無可怀疑的知識作出來的絕对誠恳的研究，得出了这个結論：整个"資本主义生產方式"必須被揚棄。可是我們想特別注意的，不僅僅是这部劳作的最后結論，而且作者在其整个篇幅中是以全新的观点陈述的政治經济学上許多重要点和在純粹科学的問題上得出了一些結果，这种結果大大地不同於一切先前公認的政治經济学，並且使一些学院的經济学家如果不願自己先前的学說遭受复沒，不得不予以嚴厉的批評和作科学上的反駁。为了科学的利益，希望在專門書刊上，俱可能快地圍繞这些重要点展开論战。

馬克思从闡述商品和貨幣之間的关系开始；其中最重要的，早已在一部專門著作中發表过了①。然后他轉到資本上，而这里我們立刻就接近到本書的中心点了。資本是什么呢？是一种貨幣，这种貨幣变成商品，以便从商品再变成較原先数量为多的貨幣。我買進100台婁尔棉花，110个台婁尔把它賣出，就实現了作为資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的100台婁尔。可是那时就發生了一个問題：在这个过程中我所賺的这10个台婁尔是从哪里來的呢？經过兩次簡單的交換，100个台婁尔怎样变成110个台婁尔的呢？要知道政治經济学恰巧假定：在任何交換中都是等价交換。於是馬克思分析了一切可能的情形（商品价格的上落等等），証明在政治經济学做为出發点的上述那种前提下，由原來的100个台婁尔形成10个台婁尔的剩余价值是不可能的。虽然这种过程每天都在發生着，而經济学家們却沒有向我們解釋这个事实。馬克思对这件事做了如下的說明：这个謎只有这样才能解开，即我們在市場上找到一种非常特殊的商品，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在於生產交換价值。这种商品是存在着的，这就是劳动力。資本家在市場上購買劳动力，而迫使这种劳动力为自己工作，以便把它的生產品賣出去。所以我們必須首先研究劳动力。

劳动力的价值是什么呢？根据那人所週知的規律來說，这就是依照該國和該时代在歷史上形成的水平，工人能够維持自己的生存和延續自己的种族所必要的那些生活資料的价值。我們假定工人能够得到自己劳动力的全部价值。其次，我們假定，这个价值表現在每天6小时的劳动上，或半个劳动日上。可是資本家硬說他是購買了整个劳动日的劳动力的，於是迫使工人工作12小时或12小时以上。因此，在12小时的劳动下，他獲得了6工时無償的生產品。馬克思由此得出結論：任何剩余价值，無論它是哪里來的——是資本家的利潤、地租或賦稅等等，——都是無償劳动。

由於工厂主所关心的是每天尽可能榨取更多的無償劳动，和由於工人的相反的利益，就發生了圍繞着劳动日長度的斗爭。在值得特別注意的將近100頁篇幅的說明部分中，馬克思描寫了这个斗爭在英國大工業內的歷史；这个斗爭不管主張自由貿易的工厂主的反对，去年春天結束的結果是：不僅全部工厂工業，而且全部小生產，甚至全部家庭工業，都納入了工厂法的范圍內；按照这个工厂法，規定在最重要的工業部門內妇女和小於18歲兒童（从而也間接地規定了男子）每天最高限度的劳动时間为10小时半。馬克思同时也說明，为什么英國工業不僅不因此而受到損失，而反而得到好处，因为每一个人的劳动个別地來看，都因强度的增加比長度的縮減來得大而得到好处。

可是除了延長劳动时間超过生產必需的生活資料或生活資料价值所需要的时間之外，剩余价值还可用別种方法來增加。在一定的劳动日中，比如說12小时的劳动日中，按照我們先前的假定，包含着6小时的必要劳动和6小时的用在生產剩余价值上的劳动。如果能用某种方法縮短必要的劳动时間至5小时，那末余下的7小时就用來生產剩余价值。这可以用縮短生產必要的生活資料所需要的劳动时間來达到，換一句話來說，就是可以用減低生活資料价格的方法來达到，而減低生活資料的价格又可以用改進生產的方法來达到。对於这一点馬克思又詳細地作了說明，他考察和研究了3个主要方法，用这些方法就可以造成这种改進：（一）协作，或由於許多人同时有計划地合作而產生的力量的增强；（二）劳动分工，即在眞正的工場手工業时期（大約在1770年以前）發展起來的那种劳动的分工，最后，（三）机器，大工業从那时起就借机器而發展起來。这些研究也很有趣，並顯示出对於所研究的問題的驚人知識，一直到工藝学上的細節里

① 系指1859年出版的馬克思的"政治經济学批判"。——譯者

面去。

我們不能進一步过細地論述关於剩余价值和工資的研究，但为了避免誤解起見，应該指出：像馬克思用許多引証所指出的，即使在学院經济学中也並非不知道这个事实，即工資少於全部劳动生產品。我們应該希望，这部書將給那些教授先生們有机会至少向我們詳細說明这个奇異之点。应該特別贊揚的是：馬克思所引証的一切事实証据，都取自最好的來源，大部分是取自國会正式的書面报告。关於这一点，我們支持作者在他序言里間接提出的这个建議：在德國也通过政府的專員，——但这些專員不应是怀有成見的官僚主义者，——对各种不同工業部門內的劳动关系、狀况切实地調查，並向議会和公众提出書面报告。

第一卷以研究資本的積累結束。关於这个問題，人們已經寫过很多文章，可是我們必須承認，这里也有新的东西，而旧的东西也从新的方面來闡明。这里最特出的是試圖証明，与資本的集中和積累同时並進地也發生了工人过剩人口的積累，而这兩个过程归根到底一方面造成了社会变革的必要，另一方面造成了社会变革的可能。

無論讀者对於作者的社会主义观点抱什么态度，我們相信还是可以指出：讀者在这里所接触的是远远高出於通常社会民主主义日常書刊的一部劳作。我們还可以附加說：除了开头40頁有些困难的辯証法的东西外，虽然有極嚴格的科学性，这部書还是容易理解的，由於作者对誰也不寬恕的諷刺的态度，甚至是有趣的。

弗·恩格斯为"萊茵报"所寫，未刊載。
按手稿刊印

〔为"未來"《Die Zukunft》寫的書評〕

卡尔·馬克思　資本論　第一卷　漢　堡　梅斯納出版　1867年　8开本784頁

我們这个出思想家的民族，直到現在为止在政治經济学方面貢献如此少，这对於每一个德國人都是可悲的事实。这方面我們大名鼎鼎的人物，充其量不过是像洛①和罗雪尔②那样的編纂者，如果人們也会遇到什么独創者的話，那我們就会碰到像李斯特③那样的保护关稅論者（而且他似乎是从一个法國人那里抄襲得來的），或者是像洛貝尔圖斯④和馬克思那样的社会主义者。我們御用的政治經济学，顯然事实上，是把任何認眞地研究經济科学的人，都推到社会主义的怀抱里去，作为自己的任务。要知道我們大家都是这一事实的見証人：整个御用的政治經济学敢於在反对拉薩尔的斗爭中，否認久已聞名和公認的規定工資的規律，並讓一个拉薩尔來保衛李嘉圖这样的人不受苏尔茲—德利希⑤等的攻击。遺憾的是，無疑地这些先生們在科学方面甚至不能对付拉薩尔，並且他們的实踐的努力不論如何值得承認——他們都应受非难：他們的全部科学都在於傳播巴斯夏⑥的掩飾一切矛盾和困难的协調論。承認巴斯夏为权威，否認李嘉圖——現时德國御用政治經济学的情形就是如此。的确，还能怎样呢？很遺憾，政治經济学在我們这里是一个在科学上誰也不感兴趣的領域：它或者是國家考試必要知識的一部分，或者是作極尽膚淺地学習政治鼓动的补助手段。这是我們國家分散狀态的过錯，是我們可惜还这样不發达的工業的过錯，还是在这个科学部門內我們傳統的依賴於外國人的过錯？

在这样的情况下，獲得像上面所提的那样的書常常是愉快的，在这部書中作者怀着憤怒的心情，把現在流行的庸俗化了的政治經济学，或者像他極其中肯地称之为"庸俗經济学"的，与它的古典的先驅者（自李嘉圖起至西斯蒙第止），对立起來，同时对古典派也採取批判的态度，而始終力圖不离开嚴格科学研究的道路。馬克思先前的著作，特別是1859年在柏林鄧克尔書店出版的关於貨幣的著作⑦，已經以其嚴格的科学性和無情的批判而出类拔萃，就我們所知，到現在为止我們整个御用政治經济学还沒有什么东西和它对抗。如果它对於那部

① Rau, Karl Heinrich（1792—1870），德國庸俗經济学家。——譯者
② Roscher, Wilhelm（1817—1894），德國資產階級經济学家，是庸俗經济学的代表。——譯者
③ List, Friedrich（1789—1846），德國資產階級經济学家。——譯者
④ Rodbertus-Jagetzov（1805—1875），德國經济学家，"講座社会主义者"。——譯者
⑤ Schulze-Deitsch, Hermann（1808—1883），德國資產階級經济学家，資產階級"進步党"領袖之一，"劳資协調"的鼓吹者。——譯者
⑥ Bastiat, Frédéric（1801—1850），法國庸俗經济学家，劳資利益"协調"的鼓吹者。——譯者
⑦ 系指馬克思的"政治經济学批判"。——譯者

著作沒有什么可反駁，那它对現在这部有49印張的論資本的書还能做什么呢？我們希望人們正确地理解我們。我們不是說这本書的結論是無可反駁的，說馬克思已經充分提出了自己的証明；我們只是說：我們並不認为在我們一切經济学家中間，那怕有一个人会把这些結論駁倒。这本書中所包含的研究，以極大的科学的确切性傑出。我們首先举出全書整个巧妙的辯証的結構，举出在商品的概念中貨幣如何已經以存在於自身（an sich）中的东西的資格被表述着，从貨幣中如何發展出資本。我們承認：新加入的剩余价值的范疇我們認为是向前推進的一步；我們沒有看出有什么东西可以反駁这个論断：在市場上以商品的資格出現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我們認为修改李嘉圖的利潤率規律，是完全正确的（即应該提出剩余价值以代替利潤）。貫串於全書的歷史的态度，使作者不把經济規律看做永恒的眞理，而僅僅是社会某种过渡狀态存在条件的公式，我們应該承認，这种歷史的态度对我們來說是非常令人信服的。而遺憾的是：在我們御用經济学家那里，我們要找尋这本書里用來描寫社会不同的歷史狀态及其存在条件的那种淵博和精細的理解力，是徒劳無益的。像研究奴隸制的經济条件和規律，農奴制和人身依賴的各种不同形态，自由劳动的起源等的这样的研究，对於我們那些得过奬狀的經济学家，到現在为止是完全陌生的。这本書里关於协作、劳动分工和手工工場、机器和大工業在其歷史的和經济的联系及結果中的那些研究，我們也想听听这些先生們的意見；这些先生們無論如何在这里可以知道一些新的东西。尤其是关於那些与自由競爭的一切傳統理論直接相牴觸的，但是在这本書里根据官方的事实材料已經証明了的事情：虽然在自由競爭母土的英國，現在几乎任何一个劳动部門它的劳动日都是借國家干涉而嚴格規定着的、都是有工厂監督注視着的，可是随着工作时間的限制，不僅發生个別工業部門的高漲，而且个別工人在減少时間中較原來較長时間时生產更多的生產品，——关於这种事情他們会說什么呢？

遺憾的是，作者說到德國御用經济学家时所用的那种声色俱厉的語調，不可否認的是有他的理由的。这些經济学家在某种程度內都是隸屬於"庸俗經济学"的；他們为了今天的声譽，拿自己的科学作賣淫的勾当，而背棄了科学的大师。他們高談"协調"，而糾纏在最平庸的矛盾中。讓这本書給他們的嚴厉的教訓，促使他們从昏睡中醒來，提醒他們，政治經济学不是供給我們牛奶的奶牛，而是需要認眞、热心为它工作的科学。

弗·恩格斯所寫
載於1867年10月30日"未來"
第254期（附錄）
沒有署名
按手稿刊印

〔为"爱北斐特新聞"《Elberfelder Zeitung》寫的書評〕

卡尔·馬克思　資本論　漢　堡　奥托·梅斯納出版　第一卷　1867年

是50印張的学術著作——目的是为了証明：我們銀行家、商人、工厂主和大土地佔有者的全部資本，不外是積累起來的工人階級的無償劳动！我們回憶一下，1848年"新萊茵报"如何以西里西亞農民的名义，提出了"西里西亞10億"的要求。該报确定，在取消農奴制和封建賦稅时，單是从西里西亞農民非法地夺去和落到大土地佔有者口袋里的，总額就有10億台婁尔，因此該报要求归还这个总額。可是已寿終正寢的"新萊茵报"的先生們，正如聖女巫及其神諭書①一样，願給他們的越少，他們要求得越多。10億台婁尔与現在以全体工人階級的名义所提出的那个龐大要求比較起來算得什么呢？因为我們正应該这样來了解这件事啊！旣然有產階級全部積累起來的資本不外是"無償劳动"，那末顯然从这里应該直接得出結論說：这种劳动应該在事后償付，即这里所指的这全部資本应該交給劳动。也許那时就应該預先談談，到底誰有权獲得这种資本。可是把玩笑丢在一边吧！虽然所論述的这本書对自己的任务有急進社会主义的态度，虽然它反对被

① "神諭書"是古罗馬所保存的一种來源神秘的神諭的輯錄，元老院在緊急和有災难时查詢此書。照罗馬史家李維（Livy）的意見，原有九册：邱米（Cumæ）的女巫（Sibyl）阿瑪尔賽（Amalthea）布伊奥利亞（Æolia）把它賣給泰尔昆（Tarquin）被拒絕她燒掉了3本，过了12个月，她把留下的6本以同样价錢賣給他，仍被拒絕，她又燒去3本，再过了12个月以后，她以同样的价錢出賣那留下的3本，这一次却被接受了，虽然書是少了，总价是一样的。——譯者

認为有权威的人的态度是嚴酷的和無情的，我們畢竟应該承認，这本書是追求最嚴格的科学性的高度的学術著作。在报刊上已不止一次地談到，馬克思打算以批判迄今存在过的一切政治經济学的形式，总結自己多年研究的結果，並以此而为社会主义的意圖奠定到現在为止無論傅立叶和蒲魯东，亦無論拉薩尔，都不能为它奠定的那个科学的基礎。关於这部著作，在报刊上很早就有报道，並且常常有报道。1859年柏林鄧克尔書店曾出版"第一分册"①，可是其中所談的事物沒有直接的实踐的兴趣，因此很少引起过注意。以后几分册沒有問世过，似乎新的社会主义科学忍受不了產痛。对这个新發現的諷刺話是說得如何尖銳：关於它的消息是如此經常昭告世界而似乎从來沒有注定能見世面！可是好了，我們面前終於出現了"第一卷"，一如已經說过的，有50印張，——並且誰也不能否認，它包含着充分的，並且非常充分的勇敢而大胆的新东西，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完全科学的形式呈献出來的。这一次馬克思拿他的不平常的原理，不是向公众，而是向科学人士請教的。科学人士应該保衛他們那些在这里被从根本上駁斥的經济理論的規律，他們应該証明，虽然資本也是所積累的劳动，但不是無偿的所積累的劳动。拉薩尔是实际的鼓动家，所以可以限於用实际鼓动性質的言論在日报上、在集会上來反对他，可是这里所涉及的是有系統的科学理論，这里日报就不能解决，这里只有科学可以講决定性的話。应該期望像罗雪尔洛、麥克思·威尔兹②等人不要放过机会保衛那到現在为止被一般所承認的政治經济学的正确性，來反对这个無疑地不能輕視的新的進攻。社会民主主义的种籽在青年一代和工人居民中間長出芽來了，所以他們也会在这本書中为自己找到充分的养料。

弗·恩格斯所寫
載於1867年11月2日"爱北斐特新聞"
第302号。
沒有署名

① 系指馬克思所著"政治經济学批判"，該書書名下寫着"第一分册"，而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初版序言中又說"現在刊行第一卷的这个著作，是我1859年發表的'政治經济学批判'的續篇"。——譯者

② Wirth, Max(1822—1900)，德國庸俗經济学家。——譯者

〔为"杜塞尔多夫新聞"《Düsseldorfer Zeitung》寫的書評〕

卡尔·馬克思　資本論　政治經济学批判　第一卷　漢堡　梅斯納出版　1867年

这本書会使某些讀者很失望。在某些圈子內已經有好几年談到它的出版了。書里畢竟应該揭露社会主义的眞正秘密的学說和万应藥方，而另一些讀者在終於看到关於它出版的通告后，可能会以为他从这本書里会知道共產主义的千年王國看來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誰要是翹足期望这种愉快，誰就是着实迷惑了。不过他会知道，事情不是这样的，而且这一点在784頁的篇幅上会向他說得非常清楚明白的，誰有眼睛來看，誰就会看到：这里社会革命的要求是足够清楚地提出來了。这里所指的不是像在已故的拉薩尔那里那样的具有國家資本的工人协会，这里所指的是消滅一般資本。

馬克思过去是，而且畢竟仍然是始終如此的同一的革命家，並且在科学著作中他比無論誰都少掩蓋自己的这些观点。可是关於社会变革后將怎样，他僅僅提出了一些很隱晦的指示。"我們將知道，大工業造成資本主义生產过程形式的矛盾和对抗的成熟，从而也造成形成新社会的因素和变革旧社会的要素的成熟"，其次，資本主义生產形式的消滅，"恢复个体所有制，但这是以資本主义时代的成就为基礎的，就是說，是以自由劳动者的协作以及他們对土地和他們自己的劳动所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公有为基礎的。"①

这一点我們应該感到滿足，並且照已出版的这一卷來判断，这部著作所約許的第二卷和第三卷也將很少給我們提供关於这一有趣之点的东西。可是这一回我們应該滿足於"政治經济学批判"，而这里我們就進入了非常廣袤的原野。我們在这里当然不能对这一本卷帙龐大的書中所做詳細的結論，作深入的科学的評价，我們甚至不能簡略地轉述那里所

① 这一段引文，恩格斯引自"資本論"第1卷第24章"所謂原始積累"末第2段（参見人民出版社版中文本第964-965頁）。这段話的意义，恩格斯在"反杜林論"第1篇第13章"辯証法，否定之否定"开始几段曾詳細加以說明；該处的引文，德文編者曾加註說明与"資本論"原文有出入；同样，这里的引文也有出入。——譯者

提出的基本原理。大家多少知道的社会主义理論的基本原理都归結为一点：在現代社会中工人並沒有得到他劳动產品的全部价值。这个原理像紅綫一样貫串着所評論的这本書全部，可是它較迄今为止所做的远为明确，更为徹底地貫徹到由此所得出的一切結果中，更为密切地与政治經济学的基本原理联系起來，或比起过去來对它們是直接处於对立地位了。著作的这一部分以力圖达到嚴格的科学性而与我們所知的一切先前的类似著作有出色的不同，並且可以看到作者不僅僅是对自己的理論，而且一般地对科学的認眞的态度。

在这本書中特别使我們注目的是下列一点：作者不是像通常所做的把政治經济学的原理看做永远有效的眞理，而是看做一定歷史發展的結果。甚至当自然科学越來越变成歷史的科学时，——只要提到拉普拉斯的天文学理論、全部地質学和达尔文的著作就够了，——政治經济学到現在为止却还是像数学一样的是如此抽象和一般意义的科学。这本書的其他一些論断無論遭到怎样的命运，我們認为馬克思的不可抹煞的功績是他結束了这种局限的观念。在这本著作出現以后，例如不可能把奴隸劳动、農奴劳动和自由的僱傭劳动在經济上等量齐观了；不可能把对於以自由競爭为特征的現代大工業有效的規律，直截了当地搬到古代的关系上去，或中世紀的行会上去，或者当这些現代的規律不適合於先前的关系时，把后者宣佈为異端。所有一切民族中，德國人是最大程度地(而且也許差不多只有他們才唯一地)具有歷史观念的，因此正又是德國人在政治經济学方面也發現了歷史的联系，这是完全正常的。

弗·恩格斯所寫
載於1867年11月17日"杜塞尔多夫新聞"
第316号
沒有署名

〔为"观察者"《Der Beobachter》寫的書評〕*

卡尔·馬克思　資本論　政治經济学批判　第一卷　漢　堡　梅斯納出版　1867年

对本書的傾向無論持怎样的态度，我們还是認为有权說：它是屬於那种使德國的智慧獲得荣譽的著作之列的。特出的是，虽然作者也是普魯士人，可是是萊茵省的普魯士人，而萊茵省的普魯士人不久之前还爱把自己叫做"不得已的普魯士人"；而且作者在最近几十年內是在远离普魯士的放逐中度过的。普魯士本身早已不再是任何科学首倡的國土，特别是在歷史、政治或社会領域中，这种首倡在那里是不可能的。关於普魯士，不如說它是俄國精神而不是德意志精神的代表。

至於这本書本身，則其中可以确切地分为兩个非常不同的部分：第一，对於論題的有价值的优秀的叙述；第二，作者从其中所得出的結論的傾向。前者大部分是直接丰富了科学。作者在那里考察了經济关系，应用了完全新的唯物主义的自然史的方法。可以作为例子的是对於貨幣問題的叙述，以及以博大的知識完成的詳細研究：各个不同順序的工業生產形式，——在这里是协作，劳动分工以及狹义的工場手工業，以及机器，大工業和与它相適应的社会联系和关系，——如何自然而然地一个接着一个發展出來。

至於作者的傾向，那我們在其中也可以分别出双重的趋向。因为他極力証明，現代社会，从經济上來考察，孕育着另一个更高的社会形态，所以他只是力圖在社会关系方面确立那达尔文在自然史方面所确立的同一个逐漸形成的过程作为規律。这种逐漸的变化实际上到現在为止在社会关系方面也在發生着，从远古时候起，經过漫長的中世紀至我們現在为止，而就我們所知，在科学上从來沒有而且誰也沒有認眞地断定說亞当·斯密和李嘉圖已經对於現代社会往后的發展說出了最后一句話。反之，自由主义的关於進步的学說，也包括着社会方面的進步，而那些只是傾向於虛飾的奇談怪論的所謂的社会主义者們，把事情說成这样：似乎他們是唯一包办社会的進步的。应該承認，馬克思与通常社会主义者比較起來的巨大功績是：他指出了，甚至在現代条件的極端片面發展，引起了直接使人恐懼的后果的地方，也有進步存在着。这一点在凡是描寫由整个工厂制度而來的貧富等对比时到处都有。正由於对論題的这种批評的观点，作者提供了，——無疑地是違反着自己的意志——反对任何專門家的社会主义（Sozialismus von Fach）①的最有力

* 做这篇文章的基礎的，是1867年12月7日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見俄文第一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83—4頁）——俄文版編者。

的論据。

談到作者的傾向、主观結論和他怎样对自己和别人表述現代社会發展过程的最后結果，事情就完全不同了。它們与我們称为本書的積極部分沒有共同之处。如果篇幅許可的話，那也許可以指出，他的这些主观的幻想，是被他自己的客观的叙述所駁斥掉了。

拉薩尔的全部社会主义在於辱罵資本家，而向普魯士容克献媚，在这里我們所發現的則直接相反。馬克思先生明白地指出了資本主义生產方式（如他对於現在社会階段所称的）的歷史必然性，同样地，那些僅僅消費地佔有土地的容克階級的非必要性。拉薩尔腦中充滿了幻想，以为俾斯麥能承担实行社会主义千年王國的任务，馬克思先生則極其明白地否認着自己的不肖学生。他不僅确定地說，他与一切"普魯士王國的政府社会主义"沒有共同之处，而且也在762頁及以下几頁上說：現在在法國和普魯士佔統治地位的制度，如果不及时地制止它的話，很快就会導致俄國的鞭子对欧洲的統治。

最后我們要指出：我們在这里能够注意的僅僅是这部龐大卷帙的基本特征；在詳細地分析时，还可以指出許多我們在这里必須省略的东西。可是，有很多專門雜誌正是为这个目的而存在的，無疑地，它們会較詳細地論述这一部無論如何是出色的出版物的。

弗·恩格斯所寫
載於1867年12月27日
"观察者"第303号。
沒有署名
按手稿刊印

① 系指空想社会主义。（見1867年12月7日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俄文第一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83頁）——俄文版編者。

〔为"符騰堡实業报"《Gewerbeblatt aus Württemberg》寫的書評〕

卡尔·馬克思　資本論　政治經济学批判　第一卷　漢堡　梅斯納出版　1867年

我們注意这本書，完全不是为了作者在序文中就已經公开表露的特殊的社会主义傾向。我們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本書，不管它的傾向，包含着值得任何人注意的科学的研究和实际材料。我們也不在这里研究科学部分，因为这不在我們的目的之內，我們僅僅限於事实方面。

我們並不認为有任何别的著作，——德文的或是任何其他文字的，——像在本書第302—495頁上那样的3章——协作、工場手工業和大工業——那样，如此明白而完全地分析了現代工業史的基本特征，从中世紀起至現在为止。工業進步的每一个个别方面，这里都按貢献而予以应有的地位，即使有些露出了特殊的傾向的話，我們畢竟还是应該为作者主持公道：他沒有一个地方是把事实去迁就自己的理論的，相反地，他力圖把自己的理論表現为事实的結果。他总是从最好的來源襲用这些事实，涉及現代的則襲用眞实的可是現时德國还不知道的來源：即英國國会的报告。那些不僅从日常贏利的眼光來看自己的工業，而且把它看做在各國全部偉大的現代工業發展中的重要环節，因此对於对他們的部門沒有直接关系的事也有兴趣的德國商業人士，在这里会找到丰富而有教益的泉源，並將感謝我們促進他們注意这一点。要知道每一个經济部門个别地、和平地独自存在的时代，早已过去了，現在它們全都互相依賴着，依賴着最遠远的國度的進步，也依賴着直接鄰近的國度的進步以及变动着的世界市場的行情。如果关税同盟的新条約很快就会造成先前的保护税的減低（这是可以期待的），那末熟悉現代工業史的一般輪廓，以便預先知道在这样的变动中如何行动，对於我們所有一切工厂主就成为必要的了。到現在为止常常挽救我們德國人的丰富的学識，不管我們政治上的分散，在这个問題上也是最好的武器，我們可以用它來反对粗俗唯物主义的英國人。

这把我們引到第一个問題。在关税同盟新的立法下，很快地就会來到一个时候，那时在加入同盟的各國中，工厂主本身会要求同样地調整工厂中的劳动时間。如果在一个國家里劳动时間，特别是妇女和兒童的劳动时間，完全依工厂主处理，而在另一个國家里則受到大大的限制，这顯然是不公平的。在这一方面，特别是如果保护税确实將降低时，如果沒有关於公同标准的协議，未必可以行得通。可是在这一方面我們德國沒有充分的經驗，也許甚至可以說沒有任何經驗，所以我們不得不限於从其他國家的立法中，特别是英國的立法中和从这种立法的后果中，可以吸取的那些教訓。而这里作

者对德國工業作了巨大的貢献的地方，是他根据官方的报告，以最詳尽的方式論述了英國立法及其結果的歷史（参閱第207—281，399—496及个别的地方）。英國工業史的这一方面，差不多完全不为德國所知，而讀者將驚奇地知道：在今年的國会法令把不下於150万工人置於政府的監督之下以后，現在不僅是差不多全部工業劳动，而且大部分家庭工業劳动，以及一部分農業劳动，在英國都置於官吏的監視下了，而且劳动时間的長度都得受直接或間接的限制。我們号召我們的工厂主不要害怕本書的傾向，要認眞研究特別是本書的这一部分；無疑地，我們迟早一定会面臨这同一个問題的。

弗·恩格斯所寫
載於"符騰堡实業报"（1867年12月27日"符騰堡官报"《Staatsanzeiger für württemberg》第306号附錄）
沒有署名
按手稿刊印

〔为"新巴登官报"《Neue Badische Landeszeitung》寫的書評〕

卡尔·馬克思　資本論　政治經济学批判　第一卷　漢　堡　梅斯納出版　1867年

我們讓別人去研究这部著作的理論部分和嚴格的科学部分，批評作者对於資本起源的看法。可是我們不能不注意：它同时向我們提出了大量最有价值的歷史材料和統計材料，这些材料几乎無例外地全部从調查委員会向英國國会所做的正式报告中得來的。他不無根据地着重指出这种調查委員会对於研究某一國家內部狀況的重要性。这样的委員会，——自然，假如有合適的人在里面，——对於人民來說，是認識自己的最好的手段，而馬克思先生說，在德國所做的类似的調查，將得出一定会使我們自己因此害怕的結果，他是未必不对的。要知道在这些委員会工作以前，任何英國人都不知道他國內的最貧窮的階級是如何生活的！当然，沒有这一类的調查，任何社会立法（像現在在巴伐利亞所称的），將僅僅以淺薄的知識來执行，並且常常是愚昧無知的。德國政府机关的所謂"登記"和"調查"，按其价值來說不像这些委員会的材料，甚至相差很远。官僚主义的千篇一律我們知道得太清楚了：分發一些表格，如果随便怎样把它塡滿了拿回來就滿足了；而这些表格所据以塡寫的情报，又常常恰巧是向那些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掩蔽眞理的人征集的。与此相反，請拿英國各工業部門劳动条件調查委員会的調查來看看。这里所听取的，不僅僅是工厂主和工头，而且还有工人，連小姑娘都包括進內；並且所詢問的不僅僅是他們，而且还有医生、治安裁判官、神甫、教师以及一般地凡是能够提供一些关於这个問題消息的人。而且每一个問題和每一个回答都速記記錄了下來，逐字地刊印出來，全部材料附以据它而寫的委員会的报告及結論和建議。因此，报告及所附的材料一起具体地表明了委員会的成員是否履行了和怎样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因此使个别成員的偏私的态度大大發生困难了。在上述这本書里可以找到关於这一点的詳細情形以及無数的例子。这里我們只想着重指出一点：即在英國，妇女和兒童的劳动时間在立法上的限制，从而几乎所有各工業部門都在政府的監視之下，这种情形的擴展与工商業自由的擴展是並行的。馬克思先生給我們做了这种發展的詳細的歷史的叙述，指出，最初在紡織企業中如何从1833年起劳动时間被这种方式限制为12小时；如何在工厂主和工人之間經过長期的斗爭之后，劳动时間終於規定为10小时半，兒童为6小时半，以及如何从1850年起，工業部門如何一个接着一个服从於这个工厂法：最初是印花布工厂（从1845年起就已如此），然后是从1860年起染房和漂白坊，从1861年起花边工厂和織袜工厂，从1863年起制陶場、壁紙工厂等等，最后至1867年几乎全部其余稍大的工業部門；关於1867年这最后一个法令的意义，可以由此來判断：这个法令把不下於150万妇女和兒童置於劳动法的保护和監督之下。我們所以特別着重指出这一点，是因为我們德國在这一方面很遺憾的，整个事情是很惡劣的，而我們应該感謝作者如此詳尽無遺地考察了这个問題，並且使它成为对於德國公众也易於了解。每一个人道的人，無論他对於馬克思先生的理論原理持何种态度，都会有同样的意見。

其余的关於工農業史的珍貴材料，篇幅不容許我們來加以考察了，可是在我們看來，任何有兴趣於政治經济学、工業、工人的狀況、文化史和社会立法的人，無論他抱何种观点，都不能不讀这一本書。

弗·恩格斯所寫
載於1868年1月21日"新巴登官报"第20号
沒有署名

（谷　鷹譯　宗白華校）

为什么要学習政治經济学？

——学習“政治經济学教科書”筆記之一

千家駒

随着全國農業合作化和資本主义工商業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來之后，將出現一个全國文化建設的高潮。馬克思主义理論的学習，成为当前我們最迫切的任务之一了。当我們正在向着社会主义建設勝利進軍的时候，不由不想起了斯大林在苏共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教導我們的一段話：“沒有什么必要使得一位医学專家，同时又是一个物理学專家或植物学專家；反过來說也是一样。但有一个科学部門的知識，却是所有一切科学部門中的布尔什維克所必須具备的，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义关於社会、社会發展規律、無產階級革命發展規律、社会主义建設事業發展規律以及共產主义勝利的科学。”①

如所周知，馬克思列寧主义是由三个基本部分組成的：即馬克思主义哲学（辯証唯物主义和歷史唯物主义），馬克思主义政治經济学和科学共產主义理論。这三个組成部分是互相联系而不可分的，它們構成馬克思列寧主义的整体。列寧曾經說过，政治經济学是“馬克思主义底主要內容”，是“馬克思理論最深刻，最周到和最詳細的証实和运用。”②所以政治經济学决不僅僅是那些專門研究經济科学的人所应該学習的科学，同时也是一切自然科学工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文藝工作者、工程师以及一切想要学握馬克思列寧主义武器的人都必須懂得的科学。本文我想簡要地解答三个問題：

一、为什么要学習政治經济学？

二、政治經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三、怎样学習政治經济学？

这三个問題是互相关联而不能机械地划分的。因此，我也不拟分开來談，而当为整个問題來談。

* * * *

为什么要学習政治經济学？簡單地說，就是要認識社会經济發展規律，並运用这些規律，來更好地为偉大的社会主义建設事業服务。讓我們先从政治經济学是怎样一門科学說起。

任何一个人要生活，就必須有物質生活資料，即必須有衣、食、住、行以及其他一切物質資料。这些物質資料都是靠人們劳动生產出來而不是从天上掉下來的。物質資料的生產是社会存在和發展的基礎。人們在物質資料的生產过程中，必須具备三个要素：即一、人的劳动，二、劳动对象，三、劳动資料。人的劳动即人們为了改变自然物体的形态而使之適合於人类需要而進行的有目的的活动。劳动对象是人的劳动加於其上的一切东西。劳动对象可以是自然界原來就有的东西，如森林中的木材和地下的礦藏；也可以是經过加工的原料或原材料，如紡紗厂中的棉花，机械工厂中的鋼材。劳动資料是人用來影响和改变劳动对象的一切物件，其中最主要的是生產工具，其次是土地、生產建筑物等等。在生產过程中，人們用生產工具來影响和改变劳动对象，同时也發展着自己的劳动能力、智慧和技巧，並丰富自己的生產經驗。

劳动对象和劳动資料構成生產資料。生產資料本身如果不和劳动力相結合，它們就只能是一堆死的东西。为要使生產过程能够進行，劳动力就必須与生產資料、首先和生產工具結合起來。生產物質資料所使用的生產工具以及具有相当生產經驗和劳动技能而运用生產工具的人相結合，就構成社会的生產力。所以，生產力所表示的是人們在生產过程

① 斯大林：“列寧主义問題”，莫斯科中文版，第760頁。

② 列寧：“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7頁。

中对自然的关系。在整个社会發展中，生產工具在生產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生產工具發展的水平是社会控制自然的尺度。生產工具决定了生產力發展的水平。由粗笨的石器过渡到金屬工具（青銅器、鉄器）；再由手工生產工具过渡到机器，表明了社会生產力發展的不同階段，所以生產力所回答的問題是人們用怎样的生產工具來生產他們所必需的物質資料。馬克思曾經說过，經济上的时代不是根据生產什么东西來划分，而是根据怎样生產，用什么生產工具進行生產來划分的。

但生產力只是生產的一个方面，生產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人們在生產过程中發生的相互关系，即人們的生產关系或經济关系。孤立的个人的生產，像"魯濱孙飄流記"上所描寫的魯濱孙，只不过是小說家的幻想，在社会实踐中是不存在的。在生產中，人們必然要建立彼此間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說，物質資料的生產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社会的生產而不是孤立的个人的生產。（一个个体手工業者在形式上好似个人進行生產，但他的原料、手工工具是向市場買來的，他的產品也是賣給別人的；况且他的衣、食、住、行也决不可能靠他自己一个人劳动來解决的。）

生產关系包括着："（甲）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乙）由此產生的各种不同的社会集团在生產中的地位以及他們的相互关系，……（丙）完全以甲乙二項为轉移的產品分配形式。"①这三者之中，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生產关系本質上是这样一个問題：即生產資料归誰所有，由誰支配——是归个别的人、集团和階級所佔有以剝削那些沒有生產資料的廣大劳动人民呢；还是归整个社会所佔有，用來滿足廣大人民群众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如果是前者，人們的生產关系便不能不是一种剝削和被剝削的关系，如果是后者，那么人們便处在一种同志間的合作和互助的关系中。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和人們在生產中的地位，又决定了產品的分配形式。誰佔有了生產資料，生產的成果自必归誰所有。例如，在資本主义制度下，生產資料归資本家所有，工人們辛辛苦苦所生產出來的生產品也就全部为資本家所佔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產資料为全民所有或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因此，生產品也就是人民自己的財產，而消費品的分配則按照各人劳动的数量和質量來進行分配。由此証明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是生產关系的基礎，所有制形式改变了，生產关系也就跟着發生变化。

馬克思在"政治經济学批判"的序言中說过一段关於生產力和生產关系相互关系的有名的話。他說："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產中参与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們本身意志为轉移的关系，即与他們当时的物質生產力發展程度相適合的生產关系。这些生產关系的总和就組成为社会的經济結構，即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所借以樹立起來而且有一定的社会意識形态与其相適应的那个現实基礎。物質生活底生產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一般精神生活的过程。並不是人們的意識决定人們的存在，恰好相反，正是人們的社会存在决定人們的意識。社会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时，便和它們向來在其中發展的那些現存生產关系、或不过是現存生產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現的財產关系發生矛盾。於是这些关系便由生產力發展的形式变成了生產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时代就到來了。"②馬克思这一段話把生產力与生產关系，基礎与上層建筑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作了經典性的表述。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話。首先，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不参加社会生產中某种特定的生產关系，这种生產关系是不依他个人意志为轉移的客观存在过程，不是自由选擇的結果。在階級社会中，超階級存在的个人是沒有也不可能有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不打上了階級的烙印，即不能不把自己擺在一定的不依他的意志为轉移的生產关系上。（一个人可以改变階級成份，但不等於說他可以自由选擇階級或不参加任何階級）。其次，生產力和生產关系总是統一在一种生產方式中，一定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常和一定形式的生產关系相結合，也就是說，社会生產总是由生產力与生產关系兩方面組成的，它們是不可分割地互相联系着的。只有具备了这兩个方面，才能有社会生產，我們不可能想像离开了生產关系而存在的社会生產力，也不可能想像不与一定發展階段的生產力相結合的生產关系。生產力与生產关系虽然是統一的，但它們畢竟是社会生產的兩个不同的方面。生產力是社会生產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生產的变更和發展总是从生產力的变更和發展，特別是从生產工具的变更和發展开始的。有了蒸气机的發明，才有工業革命，也才有資本主义的生產关

①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經济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65頁。

② 馬克思："政治經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序文第2頁。

系。"但这並不是說，生產关系不影响到生產力的發展，生產力不依賴於生產关系。生產关系虽然是依賴於生產力底發展而發展，但同时它們又反轉來影响到生產力，加速或延緩其發展。"①当生產关系和生產力性質相適合时，它就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成为生產力發展的决定性的力量；当生產关系与生產力性質不相適合时，生產关系就阻碍生產力的發展，成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人們的生產关系随着生產力的發展而發展，但同时又積極影响生產力。先進的生產关系是推动生產力强大發展的力量，例如，苏联和欧洲人民民主國家以及我國在革命勝利后社会生產力的飛躍發展，說明了新的生產关系对於生產力起着多么大的積極的推進作用。与此相反；旧的过时了的生產关系却阻碍着生產力的向前發展，使生產力日趋萎縮，英、美、法各資本主义國家生產的停滯不前，就是最好的証明。

当然，資本主义的生產关系，当它破坏了封建制度的生產关系而建立資產階級的生產关系的时代，曾經有过一个时期（即当十八世紀时）是生產力的主要推進者，这时候，它和生產力是完全相適合的，它促進了当时生產力的迅速發展。但是随着資本主义社会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特别是到了壟断資本主义时代，資本主义生產的社会性与資本主义私人佔有形式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这时，資本主义的生產关系就变成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障碍了。

但是生產关系不能过分長久落后於生產力的增長並和这一增長相矛盾，因为只有当生產关系適合於生產力的性質及情况，並使生產力有發展余地时，生產力才能尽量發展起來。因此，無論生產关系怎样落后於生產力的發展，但它們迟早总会去適合生產力的發展水平，適合於生產力的性質。不然便会有生產体系中生產力与生產关系統一的根本破坏，便会有生產危机和生產力的萎縮等現象發生。为了使生產关系適合於生產力的性質和發展水平，人們就必須改变旧的落后的生產关系，建立新的生產关系。在以生產資料私有制和人剝削人为基礎的社会中，生產力和生產关系之間的冲突表現为階級斗爭，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解决生產关系与生產力不相適应的矛盾，以新的生產关系來代替旧的生產关系。

在社会生產过程中，随着生產力的变化和發展，生產关系也必然要变化和發展，生產力是生產中最活动最革命的要素，生產关系往往要落后於生產力的發展，但迟早必須与生產力相適合，这就是生產关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經济規律。同时这也是一切社会發展的共同規律。

但是生產关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这一客观規律的要求，在階級社会中，往往会遇到社会中腐朽势力强力的反抗，这是因为，在分裂为敌对階級的社会中，掌握生產資料，代表旧有生產关系的統治階級，为了維持剝削者的階級利益，总是要竭力保持旧有的生產关系，反抗这一經济規律的实現。例如，在現代資本主义國家中，資本主义的生產关系早已不能和生產力的發展相適应，生產关系已嚴重地阻碍生產力的發展，但是生產关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还沒有能为自己开辟道路，其原因即在於腐朽的資產階級竭力阻止这个規律的实現，用極其殘酷的手段來鎮压人民的革命运动。要实現这一規律，必須有先進的社会力量來粉碎腐朽势力的反抗，这种先進的社会力量，就是無產階級。这就說明在階級社会中，旧的生產关系的推翻和新的生產关系的建立，必須經过階級斗爭，即經过社会革命，才能实現。

至於在消滅了剝削階級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有沒有生產关系落后於生產力發展的情况呢？也是有的，因为生產力旣然是生產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力量，它总归是跑在生產关系的前头，所以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生產力和生產关系之間也会發生矛盾。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矛盾不会变成对立，这样也就不会弄到社会的生產关系和生產力發生冲突。社会主义社会的領導机关能够及时地看出日益增長的矛盾，並及时採取办法，使生產关系適合於生產力的增長來克服这种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沒有那些能够組織反抗的衰朽的階級。举例來說，我國工業化的迅速發展，会引起了社会主义大工業和小農經济之間的矛盾，如果不改变分散落后的小農經济的生產关系，就会妨碍我國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共產党和毛主席預見了这种矛盾，及时地採取了迅速進行農業合作化的正确方針，这样就使農業生產力迅速地向前推進，这又轉而促進其他國民經济部門新的發展。

其次，我們再來說基礎与上層建筑的关系。

馬克思指出：生產关系的总和就是一个社会的經济結構，这是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所借以建

① "苏联共產党（布）歷史簡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60頁。

立起來而且有一定的社会意識形态与其適应的那个現实基礎。上層建筑是社会經济結構即基礎的產物，但它一經出現，就对基礎發生積極的影响，積極帮助自己基礎的形成和巩固，並且促使它進一步的發展。斯大林在"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一書中指出，每一社会都有它的基礎以及適合於这个基礎的上層建筑。基礎与上層建筑的辯証关系是：上層建筑由基礎所决定，並与基礎共存亡；另一方面，上層建筑必須为自己的基礎服务，帮助它的形成和巩固。正因为如此，所以，上層建筑一經出現后，就成为一个巨大的力量，能够对自己的基礎發生積極的反作用，从而影响社会生產的發展。"上層建筑与生產及人的生產行为沒有直接联系。上層建筑只是經过經济的中介、基礎的中介与生產發生間接的联系，因此上層建筑反映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改变，不是直接發生。不是立刻發生的，而是在基礎改变以后，通过生產改变在基礎的各种改变上的折光來反映的。"①这就是說，生產力的發展和变化首先是引起生產关系的变化，而后經由生產关系的变化引起政治、法律、宗教、藝術以及思想意識的变化。同样的，这些上層建筑也不能直接影响生產，而必須通过人們生產关系的媒介才能对生產發生作用。

由上說明，社会的变化首先是由生產力的变化开始的，生產力的变化引起生產关系的变化，随着生產关系的改变，上層建筑也要發生改变。生產关系的总和構成一个社会的基礎。基礎对上層建筑起决定作用，反过來，上層建筑積極服务於基礎，基礎又反作用於生產力，促進或阻碍它的發展。这就是生產力与生產关系，基礎与上層建筑相互作用的过程。我們要了解一个社会，首先必須了解它的基礎，即了解这个社会的經济結構。

政治經济学就是一門研究社会生產关系發展規律的科学。在"政治經济学教科書"中为政治經济学下了一个簡明的定义："政治經济学是关於人們的社会生產关系即經济关系的發展的科学。它闡明人类社会各个不同發展階段上支配物質資料的生產和分配的規律。"②政治經济学旣然是研究人們的社会生產关系的發展的科学，因此，它是一門歷史的科学。我們知道，在人类歷史上有过五种基本的生產关系，即原始公社的，奴隸佔有制的，封建主义的，資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生產关系。这五种基本的生產关系也可以說是五种不同的生產方式，因为任何的生產关系都是与一定發展階段的生產力相結合的。一种生產方式之被另一种生產方式所代替，这是基於生產关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这一共同的經济規律的要求。世界上沒有一种永古不变的社会制度，正如封建主义社会之必然被資本主义社会所代替一样，資本主义社会也必然要被社会主义社会所代替，这是一个不依人們意志为轉移的客观过程。社会主义和共產主义是全世界人类必然要走的歷史道路，不过有的國家先走一步，有的國家后走一步。苏联是走在最前面的，我國在中國共產党領導之下，經过了三十多年的奋斗也跟上去了，將來英國、美國都要走这一条路，这是任何反动派、任何原子武器也是阻擋不了的。这种不依人們意志为轉移的客观过程我們叫做"科学規律"。科学規律有兩种：一种是自然規律，一种是經济規律。無論是自然規律或經济規律，都具有客观性質。所謂客观性質的意义就是指这些規律是"不以人們的意志为轉移的客观过程的反映。人們能發現这些規律，認識它們，研究它們，在自己的行动中估計到它們，利用它們來为社会謀福利，但是人們不能改变或廢除这些規律，尤其不能制定或創造新的科学規律"③。

但經济規律也有与自然規律不相同的地方。不同之点在於：第一，經济規律不像自然規律那样是長久不变的。因为大多数經济規律是在一定的經济条件下產生的，而經济条件是在不断地变化着的，經济条件变化了，旧的經济規律也就讓位給新的經济規律了。例如，資本主义的生產方式產生了剩余价值、利潤、競爭和生產無政府狀态等等經济規律；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在資本主义社会發生作用的經济規律由於出現了新的經济条件而失去了效力，而新的規律——即社会主义的基本經济規律和國民經济有計划(按比例)發展的規律等等开始發生作用，但原來的那些規律，並不是被消滅，只是由於出現了新的經济条件而失去了效力，退出了歷史舞台。

經济規律不同於自然規律的另一特点，是在研究自然規律的"自然科学中，發現和应用新的規律是或多或少順利地進行的；与此相反，在經济学領域中，發現和应用那些触犯社会衰朽力量的利益的新規律，却要遇到这些力量極强烈的反抗"④。这是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頁。

② "政治經济学教科書"，人民出版社版，第6頁。

③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經济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2頁。

④ 同前書，第6頁。

因为發現和利用經济規律是有階級背景的，除了最先進的無產階級外，任何其他階級都为其階級立場所限制，不可能無保留的利用經济規律來为社会謀福利。相反的，剝削階級为了巩固他們的階級統治，不得不竭力反抗对經济規律的發現和应用。現代帝國主义國家和殖民地的統治者今天不是把揭露資本主义秘密的馬克思主义眞理視为異端邪說而加以禁止嗎！資產階級的御用学者不仍在那里鼓吹什么資本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最高的"理想"，是"万古長存"的嗎！剝削階級为了保护本階級的利益，不得不極力反抗或抵制人們發現和应用新的經济規律的例証是不勝枚举的。

为什么只有無產階級才能不为他的階級立場所蔽，能够無限制地發現和运用新的經济規律來为社会謀福利呢？这是因为"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是和社会絕大多数人的利益融合在一起的，因为無產階級革命不是消滅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剝削，而是消滅任何剝削；至於其他階級的革命，却只是消滅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剝削，而为它們与社会絕大多数人利益相矛盾的狹隘階級利益所限制"①。

政治經济学旣然是一門研究人們經济关系(即社会生產关系)發展規律的科学，而如上所述，發現和运用經济規律是有階級性的，因此，政治經济学也是一門具有階級性和党性的科学。由於政治經济学所涉及的問題，是关系於社会各階級最切身的利害問題，不同的階級自必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認識。例如，对於資本主义制度的滅亡和社会主义体系的勝利是否不可避免的問題，資本主义的剝削是否合理和資本家及工人階級"誰养活誰"的問題，資本主义的利益同社会的利益和人类向前發展的利益是否矛盾的問題，对於这一类最关鍵性的問題，不同的階級自必有不同的看法。由於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代表不同利益的經济学家，对於社会生產关系就不能要求有相同的看法，即不可能有各階級的統一的政治經济学。事实上亦存在着各个階級的政治經济学——即資產階級政治經济学，無產階級政治經济学，以及中間階級即小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济学。其中小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济学按其本質來說，也是屬於資產階級思想体系，而为資產階級利益服务的。党性是階級性的集中表現，旣然政治經济学是有階級性的，那也就是說它是有党性的。資產階級学者往往說政治經济学是沒有階級性的"客观的"科学，这不过是他們隱蔽階級立場以便利於对人民進行欺騙而已。

只有無產階級的政治經济学才是眞正客观的、不怕眞理考驗的唯一科学的政治經济学。这是由於無產階級的階級地位所决定的。因为在資本主义社会，無產階級丧失了一切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他們和大生產联系着，所以無產階級是最有远見、大公無私、最富於革命性的階級。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是和社会絕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以及和社会向前發展的利益完全相一致的，因而，它不害怕眞理，迫切要求認識和运用社会經济發展的規律來解放自己。無產階級政治經济学之所以是眞正科学的政治經济学，理由即在於此。

如所周知，無產階級政治經济学是由工人階級偉大的領袖和導师馬克思恩格斯所創始的。馬克思在他的天才著作"資本論"中揭示了資本主义的發生、發展和滅亡的規律，論証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必然性，指出了無產階級是資本主义的掘墓人和新社会的締造者。馬克思和恩格斯大体上制定了关於从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和共產主义社会兩个階段的学說。但在馬克思那个时代，壟断資本主义还沒有發展成熟，壟断資本主义是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才逐步形成的，到了二十世紀初，作为壟断資本主义特征的帝國主义达到了登峰造極的地位。壟断資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和它的經济規律都不是壟断前的資本主义所能概括的。对資本主义的壟断階段作科学分析，發展了並丰富了馬克思主义政治經济学的是馬克思理論天才的学生和承繼者列寧。列寧依据"資本論"的基本原理，全面地科学地分析了壟断資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和壟断統治的具体形式。在列寧关於帝國主义、关於壟断組織的統治代替了自由競爭、关於保証壟断資本高額利潤的源泉和方法的学說中，提供了壟断資本主义基本經济規律的要点。他論証了帝國主义是資本主义最高的和最后的階段，論証了帝國主义是壟断的、寄生的和腐朽的資本主义。列寧的帝國主义理論揭示了資本主义壟断階段的矛盾：劳动和資本間、宗主國和殖民地國家間、以及帝國主义各國間的深刻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它証明了帝國主义战爭的不可避免性，以及反对帝國主义奴役和压迫的民族解放斗爭的正义性。同时列寧的帝國主义理論也論証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列寧总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歷史經驗和苏联建設社会主义的实踐，丰富了並發展了整个馬克

①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經济問題"，第45頁。

思主义，从而也丰富了並發展了馬克思主义政治經济学。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勝利給馬克思主义政治經济学提供了無限丰富的課題。苏联社会主义建設的光輝成就，給全世界人类帶來了新的希望。苏联所走过的道路不惟是各人民民主國家和我國正在走着的道路，而且也是全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以及所有資本主义國家將來要走的道路。苏联社会主义建設的經驗不僅在苏联國內具有重大意义，而且还具有國际的重大意义。究竟苏联是怎样擺脫了資本主义鐐銬的；他們怎样以社会主义精神改造全國的經济；怎样加强和巩固了工農的親密联盟；怎样把一个不久以前还是落后的貧困的國家变成了全世界最富强的國家；怎样進行社会主义工業化和農業集体化的工作；怎样在消滅了生產資料私有制之后还保留了商品、貨幣、貿易、銀行等等，並利用了这些資本主义經济范疇來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以及怎样从"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逐步过渡到"各取所需"的共產主义社会。苏联解决这些問題丰富的經驗，对於正在向着社会主义道路上前進的我國人民，具有特別重要的意义。

斯大林根据了眞正科学的政治經济学的創造者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著作，根据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設經驗的实踐，探討了社会主义政治經济学的一系列新問題，提出並發展了經济科学一系列的新原理。斯大林進一步分析了現代資本主义即壟断資本主义的基本經济規律；指出了資本主义总危机是旣包括經济也包括政治的全面的危机；同时他还論証了实現國家社会主义工業化和農業集体化的道路和方法，表述了社会主义基本經济規律和國民經济有計划（按比例）發展的規律。斯大林又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义关於从社会主义向共產主义过渡的原理，即关於共產主义制度下國家的原理，关於消除城市和鄉村間、腦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間的重大差別的原理，並且使这些原理更为具体化了。

我們現在所要学習的政治經济学，並不是那种在解放前各大学中所开課的專为資本主义做辯护士的庸俗的政治經济学。我們所要学習的政治經济学是由馬克思、恩格斯所創始，而由列寧、斯大林集其大成的眞正科学的政治經济学。馬克思列寧主义的政治經济学是馬克思列寧主义的主要內容之一，是各國劳动人民進行革命斗爭，为实現無產階級革命而斗爭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我們建設社会主义、共產主义的强有力的精神力量。

馬克思列寧主义政治經济学能够教導我們些什么呢？在"政治經济学教科書"中指出了五点，玆加以概括的介紹。①

第一、政治經济学教導我們說，人类社会的經济發展是合乎規律的过程。每一种生產方式之被另一种生產方式所代替，不是任何人主观的意願，而是客观的經济規律發生作用的結果。政治經济学使我們能够認識客观的經济發展規律，並利用这些規律來为社会謀福利。

第二、政治經济学根据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的經驗指出，資本主义國家的劳动人民走什么道路才能擺脫資本主义的枷鎖。它表明資本主义國家劳动人民的貧困和受到压迫，不是偶然發生的，而是根源於資本主义經济制度本身。不推翻資本主义制度，不改变資本主义的生產关系，就無法避免劳动人民失業、貧困、飢餓和死亡的威脅。資本主义國家和殖民地人民为推翻資產階級統治而实行的革命，是这些國家經济發展的深刻的矛盾的必然結果，什么革命輸出論是毫無根据的。

第三、政治經济学教導我們怎样用社会主义的精神來改造經济。政治經济学总結了苏联建設社会主义的歷史經驗，指明了苏联怎样通过國家社会主义工業化和農業集体化把一个革命前貧弱的俄國变成了目前这样富强的苏联。这种經驗对於我們是特別宝貴的。

第四，政治經济学教導我們，只有依据社会發展的經济規律，社会主义建設的实际工作，才能獲得成功。了解經济發展規律，就有可能使我們在实踐中順利利用和运用这些規律，來为社会主义建設事業服务，就有可能使我們免於主观主义的錯誤，防止我們按照"無所不能"或"放任自流"的原則办事。同时有了經济規律的知識，就有可能深入經济过程的本質，科学地預見經济發展的过程，來改進我們的領導工作。

第五，政治經济学表明，社会主义是最進步的生產方式之一，它較之資本主义具有决定的优越性，从而加强了我們对社会主义陣营必然勝利的信心。資本主义的基本經济規律与社会主义的基本經济規律令人信服地証明資本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經济制度。資本主义生產的目的是为了獲得最大限度的利潤，它用使劳动者破產、貧困、失業、飢餓和

① "政治經济学教科書"，人民出版社版，第670—677頁。

死亡的办法來保証壟断資本家的高額利潤；而在社会主义社会，支配生產的是人的利益，是滿足日益增長的人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社会主义的必然勝利和資本主义的必趋滅亡，是我們最后达到的結論。

上述五点是政治經济学的基本結論，同时也就說明了学習政治經济学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現在，我們來談一談怎样学習政治經济学。

有人認为政治經济学是一門專門的学問，学習起來一定很困难，这种看法，是錯誤的。其实，我們每个人都离不开經济生活，正如每个人都离不开政治生活一样，这种經济生活都有它一定的客观規律，政治經济学便是把这种客观的經济規律加以系統的研究与科学的分析。只要我們有学習的决心，認眞学習，穩步前進，凡是有相当文化水平的人，都可以通过自学而掌握政治經济学的知識。自然，任何一种学問都是要化点功夫的，馬克思在"資本論"的法文譯本的序文上曾經說过，"在科学上面是沒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嶇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有希望到达光輝的頂点"。馬克思是在科学工作中辛苦过來的人，他的話是經驗之談，应当成为我們学習中的南針。任何人如果沒有辛苦的劳动，認眞的学習，而想随随便便就掌握一門学問，自然沒有那样便宜的事情。

其次，我們学習政治經济学时必須联系实际，使理論和实踐相結合。馬克思列寧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我們学習政治經济学不是为学習而学習，而是为了掌握政治經济学的知識來提高我們的工作。因此，我們必需把政治經济学的理論同我們建設社会主义的实踐結合起來。例如关於生產关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这一經济規律，就可以联系到如果我們不对農業和資本主义工商業進行社会主义改造，不改变分散落后的小農經济和資本主义的生產关系，就不能適应社会主义工業化的要求，即不能適应生產力的發展。又如我們学習了价值規律，就可利用价值規律來研究工農業產品的比价是否合理，來实行經济核算制。联系实际，就是要使馬克思主义政治經济学的理論与中國具体实踐結合起來，我們既要反对脫离基本原理而过分强調中國特殊性的傾向，同时也要反对不分析中國具体的經济条件而机械搬用一般規律的做法。只講实际，不要理論是經驗主义；只講理論，不要实际是教条主义，这兩种偏向都是錯誤的。斯大林說过："理論若不和革命实踐联系起來，就会变成無对象的理論，同样，实踐若不以革命理論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踐。"（斯大林："論列寧主义基礎"。）

最后，我們应該很好地学習苏联以及欧洲各人民民主國家的社会主义經济建設的經驗。在目前階段，我們学習政治經济学是为了更好地進行社会主义建設。自从1953年我國進入了發展國民經济第一个五年計划的建設以后，为了勝利地建設社会主义，学習苏联社会主义建設的先進經驗，已成为全國的風气。馬克思主义政治經济学中关於社会主义部分便是苏联建設社会主义社会的勝利經驗的总結。此外，在各人民民主國家中也有很多建設社会主义宝貴的經驗，值得我們学習。苏联科学院經济研究所集体編著的"政治經济学教科書"，对於苏联社会主义建設中已經解决的政治經济理論問題加以系統的論述，对於我們來說，是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的。

从今年起，我國全國在职幹部即將展开对於政治經济学的系統学習，这是十分重要的。我願再說一遍，学習政治經济学並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只要每个人有学習的决心，認眞从事，在一定的学習制度和必要的指導下是完全可以自学成功的。在学習时，应当提倡鑽研，开展对每一問題的討論和爭論，要避免教条，不要只背誦馬克思列寧的个别原理而不去領会它的精神，不与实际生活相联系。应当注意活生生的創造性的辯論，而不是死啃公式和定义，这样我們才不至於把学習政治經济学理論变成我們的負担，才能提高我們的馬克思列寧主义水平，使理論成为我們建設社会主义的思想武器，从而改進我們的工作，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設事業服务。

太平天国有关土地制度的公据

荣孟源

太平天国土地制度的实施情况，是近代史上大家注意的問題。为了求得科学的結論，須要詳細佔有材料，仔細分析。只就太平天国公据來研究，当然並不全面；可是我以为把現在所見到的42件有关土地制度的公据分析一下，却可以使我們了解太平天国土地制度的一部分情况，对於全面綜合的研究可能有一点帮助。

一　田憑确定了農民的土地所有权

田憑即太平天国所頒發的土地証，我看到了5件影印本。即：

"黃祠墓祭田憑"（"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圖錄"63，下簡称"圖錄"），系太平天国12年在江苏金匱縣（辛亥革命以后併入無錫縣）蕩口鎮所發。

"空白田憑"（"歷史教学"3卷1期，周穗武："太平天国常熟守將錢桂仁所發田憑並跋"），系太平天国12年在江苏常熟一帶所用。

"陈寿天田憑"（"圖錄"64），系太平天国12年在浙江石門縣（今崇德縣）所發。

"年文德田憑"（"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圖錄續編"62，以下簡称"續編"），系在石門縣所發，原件無年数，推測应为太平天国12年。

"潘叙奎蕩憑"（"續編"63），系太平天国13年在江苏吳江縣所發。

根据地主們的記載，太平天国区域的情况是：南京附近農民，直接給太平天国交錢粮，"不复交田主粮矣"（汪士鐸："乙丙日記"）。無錫"農民不分業佃，随田納款"，"各佃戶認眞租田当自產"（佚名："平賊紀略"）。常熟"旅帅卒長按田造花名册，以实种作准，業戶不得收租"（顧汝鈺："海虞賊乱志"）。1863年曾國藩总述安徽、江西、江苏、浙江各省太平天国情况說："粤匪初兴，粗有条理，頗能禁止奸淫以安裹脅之众，听民耕种以安佔据之縣，民間耕獲，与賊各分其半。故取江南数郡之粮运出金柱关，取江北数郡之粮，运出裕溪口，並輸金陵。和春等虽合圍城外，而賊匪仍擅長江之利，挹不竭之源，傍江人民亦且安之若素。"（曾國藩："沿途察看軍情賊势片"）漢奸劊子手曾國藩的話，固然字字污蔑太平天国，但是这一段話却証实了太平天国区域內所普遍实施的土地政策，是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即是佃戶不交地租，把原來租种的土地作为自己的產業。因此，農民拥护太平天国，清軍虽然圍困天京，可是太平天国有長江兩岸的農民支持。

太平天国11年冬季以前，做到了耕者有其田，事实上也承認了農民的土地所有权，可是还沒有明文确定農民的土地所有权。到了頒發田憑时，才把農民的土地所有权正式确定下來。"潘叙奎蕩憑"說："我天朝恢疆拓土十有余年，所有各邑田畝，業經我忠王操劳瑞心頒發田憑。"由此推断，頒發田憑的制度，系李秀成所創立。关於頒發田憑事在太平天国11年冬季以前，不見記載。佚名的"庚申避难日記"咸丰11年12月初2日条記載，常熟"耕种自田領憑"，鄉官催領（轉引自罗尔綱："太平天国史事考"209頁）。王元榜的"庚癸紀略"同治元年3月27日条記載，吳江"監軍提各鄉卒長給田憑，……領憑后租田概作自產。"这些記載，和現有田憑对照，可以推断，开始頒發田憑的时間应是太平天国11年（1861年）冬。

是否太平天国区域都頒發过田憑，文献不足，不能判断，但江苏和浙江兩省都頒發了田憑是無可怀疑的。現有4件田憑，格式和文字完全相同。由此可以推断，太平天国頒發田憑有一定的制度，至

少江苏、浙江两省都归李秀成管轄，其制度是統一的。在江苏所發的兩張田憑用忠王李秀成名义，在浙江頒發者用听王陈炳文名义，或殿前又副掌率鄧光明名义，可知頒發田憑須用一省主要官長的名义，而实际頒發人則为每縣的官長，各在憑上加盖朱印。江苏兩件田憑右边与存根相联处編号、盖騎縫印，印文均为"忠殿戶部尙書李生香"。是江苏省田憑均由忠王府統一頒發，亦卽由一省主管机关統一頒發。是否各省都由該省長官統一頒發，尙須等待材料來証实。

太平天国11年頒發田憑时，並未把蕩包括在內。蕩憑系太平天国13年冀天义程某所創。只就蕩憑說应为江苏省吳江、震澤兩縣的特有制度。但就鄧光明等所發的"便民預知由單"分土地为田、地、蕩三种；恋天福董順泰告示（"圖錄"52）分土地为田、地、山、塘四种；可以推断，其他地方也很可能頒發蕩憑之类。从太平天国确定農民土地所有权方面看來，是先頒田憑，为一般的制度，而后可能是各处因地制宜，根据特殊情况又頒蕩憑。

太平天国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后期又頒發田憑确定了農民的土地所有权，这都表現了在封建制度压迫下的農民大众对於土地的革命要求。但是太平天国革命仍旧只是一个沒有工人階級領導的單純農民战爭，農民自己"不可能制定明确的革命綱領，並用这个綱領來团結所有的革命群众；他們不可能長期地維持革命的紀律，以便集中自己的力量战勝强大的敌人；他們缺乏用科学的方法总結革命經驗，並用这些經驗來指導革命实踐的能力。"（1951年1月11日"人民日报"社論："紀念太平天国革命百週年"）在太平天国晚期頒發田憑时，我們就看到了土地制度实施中的矛盾現象。金匱黃祠墓祭田憑，海鹽顏令占祭易知由單（"圖錄"68）、金匱吳公祠錢粮执照（"續編"72右），諸暨永思堂灯会業戶执照（"圖錄"80）是太平天国承認黃姓、顏姓、吳姓的祭田和村中公田。祭田和公田向來由地主所把持，向來是由農民佃种由地主收租的，太平天国承認这种地的合法存在，实际是允許繼續租佃关系。这和以"实种作准，業戶不得收租"的政策是矛盾的。这种矛盾現象，証明太平天国晚期內部發生了斗爭。

二　田賦和派捐打击了地主

"易知由單"是太平天国征收田賦的通知單，串票是征收田賦的收据，收照是派捐的收据，这一类的公据最多，我看到了35件影印本，1件抄印本。卽：

"顏令占祭易知由單"（"圖錄"68）、"顏一善金記易知由單"（"圖錄"69），均太平天国11年浙江海鹽縣所發。

"关順酉廷記便民預知由單"（"圖錄"70）、"吳加惠便民預知由單"（"圖錄"71）、"范万春便民預知由單"（"圖錄"72）、"章連桂便民預知由單（"續編"68）、"关順昌福記便民預知由單"（"圖錄"73）、"朱皆备便民預知由單"（"嶺南学报"11卷2期138頁）、"朱鳴玉預知由單"（同上139頁）、均石門縣为征收漕米所發，前4件为太平天国12年，后3件为13年。

"馮嘉龍便民由單"（"圖錄"74），太平天国13年仁和縣所發。

"倪鼎魁軍需由單"和"倪士魁軍需由單"（均見"圖錄"75），均征上忙軍需田捐，太平天国13年發，地点不詳。

"沈夕余完銀串票"（"續編"69），"沈德裕完銀串票"（同上）、"孙永發完銀串票"（"圖錄"81）均石門縣所發，前1件为太平天国11年，后2件为13年。

"吳世傑完粮串票"（"續編"70）、"吳加堂完粮串票"（同上），为太平天国11年和13年石門縣所發。

"官經綸春納执照"（"圖錄"76），为太平天国11年安徽無为州所發的完銀串票。

"呂文兴漕粮納照"（"圖錄"77）、"章德林漕粮納照"（"圖錄"78）、"呂大祥漕米納照"（"圖錄"79），均为海寧州所發，前2件为太平天国12年，后1件为13年。

"王海銓漕銀納照"（"續編"71），为太平天国13年海寧州所發。

"永思堂灯会業戶执照"（"圖錄"80），为太平天国12年諸暨縣所發的完銀串票。

"过毅記錢粮执照"、"吳凝林錢粮执照"、"吳公祠錢粮执照"（均見"續編"72），均为金匱縣所發的完銀串票，前1件为太平天国11年，后2件为12年。

"黃志高粮米执照"、"黃配海粮米执照"、"黃

配德粮米执照"（均見"續編"73），均为桐鄉縣所發的完粮串票，前2件为太平天国11年，后1件为12年。

"黃志高地丁执照"（"續編"73），为太平天国12年桐鄉縣所發的完銀串票。

"汪添發收照"（"續編"74），为太平天国12年昭文縣所發的完銀串票。

"黃仁安田捐支照"（"續編"74），为太平天国12年桐鄉縣所發的派捐收据。

"章荣堂收照"3張（"圖錄"87、88），为太平天国12年会稽縣所發的派捐收据。

"周志記租捐执照"（見罗尔綱："太平天国的理想國"32頁，系模抄排印），为太平天国11年所發的一件易知由單，地址不詳。

根据这些易知由單和串票，可知太平天国的正式田賦为漕米和地丁銀兩种，即田憑上所寫的："遵照天朝定制完納銀米"。完銀每年兩次，分上忙下忙；糟米一年一次，在秋季征收。征收粮米的数目，全按地数計算，浙江每畝漕粮不过1斗到2斗，列表如下：（表中有*号者为推算之数，無*者为公据所載之数）

縣	时間	戶名	地数	漕粮数	1畝应納数
海鹽	11年	顏令占祭	28畝7分*	2石8斗7升	1斗
海鹽	11年	顏一善金記	5畝4分5厘*	5斗4升7合	1斗
石門	12年	关順西廷記	田10畝9分6厘 地2畝3分9厘	2石1斗7合	田地平均1斗6升8合弱*
石門	12年	吳加惠	田12畝2分 地1分8厘	2石2斗	田地平均1斗7升8合弱*
石門	12年	范万春	田1畝9分 地5畝8分9厘	1石2斗7升	田地平均1斗6升3合弱*
石門	12年	章連桂	田7畝1分 地1畝2分	1石5斗1升8合	田地平均1斗8升3合强*
石門	13年	关順昌福記	田10畝9分6厘 地2畝9分5厘	2石2斗6升7合	田地平均1斗6升3合弱*
石門	13年	朱皆备	田52畝0分7厘 地19畝2分	11石5斗	田地平均1斗6升1合强*
石門	13年	朱鳴玉	田6畝2分3厘 地2分	1石1斗	田地平均1斗7升6合*

完銀串票中多不載地数，倪鼎魁和倪士魁兩張串票有地数，按地畝計算，每畝上忙納銀2錢8分，可惜这兩張串票地址不詳，仍不能詳論。江苏昭文縣汪添發收照，田4畝9分，上忙錢数为17千9百64文，按畝計算，1畝則为3千6百66文。据王元榜的"吳江庚辛記事"庚申年11月初旬条記載："每畝約出米一斗四五升，錢約百文。"吳江漕米数和公据中浙江各縣的漕米数相似，地丁銀数和汪添發串票距离太远，其中定有問題，留待后日研究。

根据易知由單和串票，我同意罗尔綱先生的論断："太平天国所行的征收農民粮稅，还是旧日的田賦制度。"（罗尔綱："太平天国史事考"203頁）但是我覚得必須补充一点：太平天国田賦制度只是形式上为旧日的漕米和上下忙地丁銀，而內容上却大不相同。旧制度是对於地主有利，太平天国制度却是对於農民有利。太平天国虽然按畝征粮，但是農民这时不向地主交地租了，向太平天国交錢粮比向地主交租要少，对農民有利；派捐由地主來負担，对於農民有利；浙江有些地区从5畝起科，5畝以下免征（梁方仲："論太平天国的易知由單"，引"剡源鄉志"与"忠义鄉志"），更对於農民有利。因此，地主反抗太平天国的田賦制度。据馮某的"花溪日記"記載，咸丰11年（1861年）5月初9日太平軍在海鹽縣通元鎮設局"迫完田銀"，士農"無不輸錢完納"，至11日共完千余戶。这时太平軍訪得"殷富者五人"令其先出500元。地主誘騙並威脅農民叛乱，搗毁澉城和通元鎮等处田賦局，進攻嶼城，最后被鄉官章阿五（"花溪日記"說是海鹽縣令，疑即頒發海鹽縣易知由單的"天朝九門御林郎天义戶司員佐理嘉海民务章"）鎮压下去。同書記載，太平天国办理征收田賦的人，如通元鎮局主要負責人黃八十，其住宅系六家共居，如王冒冒只有間半屋，当然都是貧苦農民。可見这一場田賦制度的斗爭是農民和地主的階級斗爭。又据陈錫麟的"粤逆陷寧始

末記"記載太平軍克海寧，俞湖（字和長，原系書吏）"献征册，漕賦加倍，需索尤意外。"太平天国失敗后海寧地主因痛恨俞湖，給他鑄一跪像，說什么"非俞長和献册媚賊（地主污蔑太平軍之称），賊何由按戶誅求"。今天我們看見了3件海寧的漕粮納照，呂文兴納米1斗1升7合9，章德林納米4斗7升6合6，呂大祥納米1升（？）零9勺，1件漕銀納照，王海銓納銀4錢5分。从这些数目看來，不会为農民反对。陈錫麒的記載，使人覚得太平天国系普遍的"漕賦加倍"，实为这个反动地主故意歪曲事实，污蔑太平天国。陈錫麒所說的"需索尤意外"，用他自己的話來註釋，那就是："里中無賴从賊为鄉官，敲詐勒索，無所不至，土匪乘之駕船刼掠，士紳殷富輒被擄以勒贖。"我們把这一段話中污蔑太平天国和農民的詞句去掉，很清楚的看見，太平天国是向地主"按戶收銀米，倍其数"。由此可知，太平天国的田賦制度尽管採用了旧形式，可是其內容則是農民对地主的階級斗爭。

再就派捐來看，浙江桐鄉縣黃仁安田捐支照告訴我們，黃仁安有田59畝，每畝每日派捐1文；会稽縣章荣堂派捐的情况是，太平天国12年3月20日捐錢50千，付洋16元，付錢26文（"圖錄"88右），24日又捐洋20元（同上左），到了8月初9日又捐洋16元又錢800文（"圖錄"87），"圖錄"說明这样的收据共有8件，書中只印了3件，如果以8件合計，派捐的数目就很大了。太平天国向地主派捐的事实，各書都有記載，不需要多事引証。各地都向地主大量派捐，有些地区对農民5畝以下免征，这又說明了太平天国的捐稅制度是農民对地主的階級斗爭。

太平天国晚期，在田賦和派捐方面也發現了一股逆流，違反上述太平天国的制度，禁止对地主派捐。太平天国12年石門縣翁天福李有慶等給地主沈慶余的会諭（"續編"58）說："節征畝捐田憑等項，繳数为弟等（沈慶余等）居多，即捐款一節，数亦甚鉅。"随即唆使沈慶余"親自來城放胆出控"鄉官。太平天国內部旣然有人代表地主階級說話，那么必然出現內部的斗爭。从現有的太平天国田賦和派捐的公据文書中，我們看到了太平天国晚期內部斗爭的線索，也看到了發生斗爭的階級根源。

三　收地租是太平天国內部的階級斗爭

收租票是太平天国發給地主收地租的憑据，今有一件，即來蘭堂收租票（"圖錄"82）。票頂横寫"業戶收租票"，全文是："荅珊縣右营軍帅來为給照收租事，今据業戶來蘭堂收到租◇石◇斗◇升，当於收菁后，將此票付交佃戶收执为据，以憑查对，此照。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九月◇日給。右字第三千一百〇二号，佃來蘭堂租四石六斗。"年月上盖印，印文不清。按太平天国荅珊縣即浙江省蕭山縣。"右营軍帅來"当为鄉官。受票人來蘭堂，獲此票据即可向佃戶收租。

太平天国允許地主收租开始於哪一年，文献不足，無从判断。据太平天国11年9月14日錫金在城租賦总局經董薛佈告（"續編"55）和11年11月忠天豫馬天兴告示（"圖錄"53），可以确定至晚在太平天国11年秋季开始即有地主收租的事实。錫金在城租賦总局經董薛佈告說："前……以錫金住城各業戶完賦無力，本閣節經示諭佃農照常輸租，抵办錢粮在案。兹屆年歲丰稔，新谷現在登場，除已另行曉諭各佃赶早还租外，惟錢粮如此緊急，因何至今尙未完納。速即查明各業完粮花戶銀数定限五日內，彙造菁册开呈，准其陸續完納。"馬天兴告示說：奉恋天福董順泰的命令，曉諭民众，"業戶固貴按畝輸粮，佃戶尤当照額完租。兹値該業戶粮宜急征之候，正屬該佃戶租难拖欠之时，倘有托詞延宕，一經控追，抗租与抗粮同办。"这兩張告示均說允許地主收租的理由是，地主收租完賦。按太平天国的土地政策，原为以实种作准，佃戶以租田当自產，向太平天国交粮，不向地主交租。后期允許地主收地租，不管其理由如何，事实是改变了原來的土地政策。而且向地主征粮和地主收地租是兩回事，地主完賦以收租为条件，就是說允許地主繼續剝削農民，地主先向農民收取一年收穫5成以上的粮食，然后拿出很小一部分按照董順泰的佈告（"圖錄"52）1畝田向太平天国納粮1升或2升5合。所謂"完粮收租"，实即保护地主剝削農民。太平天国晚期發生了允許收租的事实，說明那时太平天国的土地政策已被破坏，太平天国內部也發生了地主和農民的階級斗爭。

梁方仲先生和罗尔綱先生都說，太平天国对地主收租是要加以監視的，是限制地主階級的殘酷剝削。罗先生的根据是佚名的"庚申避难日記"所載賀天候洪某在常熟、昭文發佈的告示。梁先生的根据

就是來蘭堂收租票。按賀天候洪某告示："業戶領憑收租，欠繳錢粮解营押追。"就是說地主收得地租后，不准再欠錢粮，是实为催繳錢粮，並非限制租額。"庚申避难日記"所載："長毛要業戶領憑收租，現今各業戶俱不領憑，長毛告示，不領憑收租者，其田充公。"这一記載，似說太平天国限制了租額或有其他限制地主的地方，因此地主都不去領憑（收租票）。如果限制地主是事实，那么我們就看到太平天国从打倒地主的土地綱領——天朝田畝制度——改变为允許地主存在的土地綱領（虽然对地主有某些限制），这种改变是倒退，是对地主階級的妥协。太平天国晚期对地主这样妥协，如果是为了某种目的而採取必要的讓步，准备待机向地主進攻，当然無可厚非。但是在太平天国革命的歷史上，找不到这样讓步的必要条件，更找不到太平天国准备待机向地主進攻的任何象征。那么，太平天国晚期允許地主收租一事，确是違背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宗旨，是犯了原則性的錯誤。

就來蘭堂收租票說，可以有兩种解釋：一种如梁方仲先生所說："是維持原日的主佃关系，但对於地主收租实行監督……且对於超額地主加以較重的賦稅。"（梁方仲："論太平天國的易知由單"，"嶺南学报"11卷2期181頁）这种說法是可以成立的。同时另一种解釋是維持原來的主佃关系，太平天国保护地主收租；这种說法也是可以成立的。一件來蘭堂收租票不能証明哪一种解釋最恰当，討論一張來蘭堂收租票是限制地主还是保护地主不会有結論，反而会引導我們离开主題，去鑽牛角尖。我們要抛开对於这一件收租票的推測，要从太平天国既然"不准業戶收租"，而又頒發收租票允許地主收租，这样的矛盾中去分析太平天国晚期的土地政策。

太平天国晚期江苏浙江一帶的最高統帅是李秀成。从太平天国11年起我們看到了太平天国允許地主收地租的文告，看到了頒發給地主的收租票，也看到了地主們关於收地租的記載；可是同时我們也看到太平天国打击地主、向地主派捐、不准地主收租的文献。1861年江苏無錫"各佃戶認眞租田当自產，故不輸租，各業戶亦無法想。"（佚名："平賊記略"）1862年秋常熟地主周鑒說："租米充公，民（地主）無積蓄。"（周鑒："月鋤与胞弟子仁小崔書"）同年浙江海寧地主馮某說，太平天国鄉官在海鹽縣通元鎮設局收粮，"四出捉白头（地主）以詐錢"（馮氏："花溪日記"）。同年浙江紹兴府地主記載說，"曩称富人，重为刻剝，名曰'大捐'，千金万金亦不等，不受者，械击之。"（隱名："越州紀略"）同年江苏地主記載：撫天候徐遍貼告示，称奉忠王瑞旨"收取長洲闔縣租米"，發出黃紙諭單，"禁止業戶收租"（顧某："蠡湖異响序"）。罗尔綱先生根据"蠡湖異响序"判断，李秀成"禁止地主收租……这就可見無錫等地允許地主收租的办法不是太平天国中央政府原來的土地政策，而是地方政府改变了中央的政策。"（罗尔綱："天朝田畝制度的实施問題"見"太平天国史事考"213頁）我覺得罗先生的意見是正确的。罗先生还說允許地主收租，"是太平天国晚期乱政的一种"（同上217頁），我覺得須要补充一句，那是太平天国內部的階級斗爭。即地主和農民的階級斗爭在太平天国內部的反映，这是由於太平天国內部混入了地主分子和某些太平天国將領地主化所引起的。

太平天国12年6月浙江諸暨縣軍帅許蕙田致許君連札（"圖錄"61）說，設立鄉官，"每都各立师帅一人"，"須於每都中挖选殷实能幹人員充当斯职"。所謂"殷实"当即地主無疑。太平天国既用地主为鄉官，那么地主分子当然乘机混入太平天国。这些地主惡霸混入太平天国起初不过是为了免除太平天国的"大捐"和歧視，即所謂"殷戶沈王孙欲免禍，亦入党为帮办"（"花溪日記"）。后來就假借太平天国的名义和势力胡作非为，在太平天国收田賦时，他們"趁势收租，亦借鎗船恐嚇"（同上）。太平天国的政策，就被这些混進來的敌人破坏了。再有太平天国的將領如鄧光明之类，原为老弟兄，南征北战，也曾立功封王（太平天国13年封归王）。就現有的材料看來，太平天国12年（1862年）他任浙江省天軍主將，那时他就地主化了。他發給石門縣地主沈慶余的"劝諭"（"續編"56），就是一張保护地主的"护憑"。他說："凡我天朝所克各省郡州縣地方，亦有殷富之家不能出头，甘受困厄，大抵皆由人心不平，百般口（原字不清）害之所致，言念及此，可閔可恨。但本掌率既为尔邑撫字，……使貧富兩安，茲特为此护憑，仰該沈慶余收执永为保家之实据。嗣后如有不法鄉員恃强借掇，任意苛捐；及土棍刁民、軍中弟兄或以有妖朝功名，强勒索需；或以助妖粮餉，詐取銀洋；或以在前溥时曾受凌辱，欲复前仇；或有官兵往來打館滋擾；或有强佃抗拒收租，納捐不交；……仰該沈慶余放胆持憑即赴監軍衙門控告。如該監軍不理，則必來城於四門击本掌率所設大鼓，自当詳情追究，以洗沉

寃。"看吧，鄧光明是这样同情地主，保护地主，"連措詞都和清朝反动的地主相同。鄧光明的部下翁天福李有慶等在12月又給沈慶余"会諭"（"續編"58），竟痛罵鄉官派給沈慶余的畝捐，田憑等項銀数太大，促使沈慶余"親自來城放胆出控"。还提出保証說，"如果有胆控告……本爵等从重奬賞，决不食言"。看吧，李有慶等完全站在地主方面与農民为敌了。太平天国的政策也就被这些蛻化为敌人的坏分子破坏了。

太平天国將領蛻化，地主又鑽入太平天国政权以內，因此，就出現了太平天国保护地主的文告和公据，不准向地主多派捐，不准農民抗租，也不准農民"复前仇"。在这种情况下出現了收租票，那就不是限制地主收租的額数，而是要"佃戶尤当照額完租"（"圖錄"53"忠天豫馬天兴告示"）。因此，一些地主猖獗起來，說什么"以長毛之威，不怕租米不还也"（罗尔綱引"趙氏日記"）。

馬天兴的告示逼迫農民向地主交租，說什么"抗租与抗粮同办"；鄧光明的劝諭准許地主控告"强佃抗拒收租"；紹兴太平天国將領的告示"令凡有田者得自征半年租"（"微虫世界"）；蕭山縣鄉官頒發收租票；这一些事实說明太平天国中一部分人站到地主方面去了。太平天国內部一部分人站在地主階級方面与農民为敌，於是和代表農民利益的人發生了斗爭。太平天国的最高領袖並未蛻化，所以李秀成坚持不准地主收租的政策，一部分將領和地方官員蛻化了，所以地方政府就出現了允許收租的文告，在地方政权中以收租問題为中心也就展开了激烈的斗爭。据江苏吳江地主王元榜的記載（"吳江庚辛紀事"署名"知非"、"庚癸紀略"署名"倦圃野老"，均为王元榜，前書为初稿，后書为增补定稿）：1861年1月中（咸丰10年12月初）吳江地主設局收租，旋为監軍阻止；同年冬鄉官鎮天預費玉存設局收租，地主齐集，自备桌橙筆硯，20天后又为監軍阻止；1863年初程某管轄吳江又設收租局，每畝收地租3斗，農民不交，20多天以后農民群众入局中，把董事十几人擒去毆打。由此可知吳江縣三年当中收地租的斗爭繼續不断，費玉存原为流氓投机鑽入太平天国，后即投降了清朝。据浙江海寧地主馮某的記載（"花溪日記"），海鹽縣太平天国收田賦时，地主一方面趁机收租，一方面欺騙並威脅農民参加地主的暴动。这一場地主煽动的暴动固然最后被鎮压下去了，但是太平天国也遭受了不小的損失。鄧光明於太平天国12年就保护地主，他在太平天国內部起了一些什么坏作用，現在沒有材料，可是这家伙在1864年春向清朝投降了。

从太平天国允許地主收租一事，我們看到了太平天国內部的斗爭。太平天国后期某些地区允許地主收租，不是罗尔綱先生所說的因为查田困难，而是太平天国內部出現了地主階級的代理人。太平天国是單純的農民战爭，固然它比歷史上的任何一次農民战爭更偉大，它是中國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它負担起反抗外國侵略的任务；但是農民階級沒有獲得工人階級的領導，它自己不能有很明确地統一的綱領，統一的思想，統一的紀律。因此，太平天国高級領袖堅持着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而各地方官員却可以歪曲这种政策，保护地主；太平天国內部發生了收租問題的斗爭，只能是时而設立收租局，时而取消收租局，却不能按照一定的綱領，一定的思想，把暗藏的敌人清洗出去，維持一定的革命紀律。太平天国的高級領袖，許多將領和大多数的鄉官保持了革命的优良品質，蛻化分子和混入內部的地主分子是少数，但因不能清除这些坏分子，这些坏分子就違犯了太平天国的政策，使太平天国脫离了農民群众。我同意罗尔綱先生对於太平天国收租事的論断：允許地主收租是太平天国晚期革命基礎破坏的一个原因。我不同意梁方仲先生的論断，太平天国晚期在江浙一帶允許地主收租，是"运用各种不同的方式，配合当时当地的客观实在情况，有計划，有步驟，灵活巧妙地解决了当时許多問題。"很明顯，太平天国允許地主收租，不是如梁先生所說的，限制一下地主而把地主打下去，却是把已經打过的地主又扶起來了。

“西遊記”試論

沈仁康

一 “西遊記”產生的时代特征

唐僧西天取經的故事，在成書之前，已在人民中間流傳了几百年了。这些故事和傳說里，孕育着人民的智慧和創造，包含着人民的爱好和願望。它們曾被作为話本及戲曲的題材，但是直到了吳承恩手里，才給它們作了一个最完善最优秀的創造性的“捏合”。吳承恩在他的另一部神怪小說“禹鼎志”的序里这样說过：“不專紀鬼，明紀人間变異，亦微有鑑戒寓焉。”我們完全可以相信，“西遊記”的寫作，同样是如此的。因此，“西遊記”不可避免的表現了作者的政治理想、社会理想以及美学理想，反映了当时社会現实生活的面貌。

“西遊記”除了少数几处地方直接的描繪了当时社会生活情况，总的說來是通过三界及神怪的斗爭曲折的反映現实的。吳承恩生活在16世紀后半叶，主要活动年代在非常腐朽的明嘉靖年間。要正确的理解“西遊記”，我們首先要熟悉一下明代社会的主要特征。

朱明王朝代替了元蒙的統治，推动了停滯的封建社会走向更高的發展。明初，在政治上和經济上的一些措施，是有着很大的進步意义的。在農業方面，解放奴隸、農奴成为自由民，这种劳动力的解放，大大促進生產力的提高。又招誘流民及移徙農民去开垦荒地，並給農民以若干經济上的帮助，鼓励廣大農民对於農業劳动生產的積極性。例如在洪武初，令流民复叶，开垦荒地，听为已叶，免稅三年。又責成地方官，招徠無藉流民垦民，官給耕牛、种子，並以垦田多少作为官吏賞罰标准。鼓励人民到山东、大河南北特别荒蕪的地区，尽量开荒，作为已業，“永不起科”，同时还比較有計划的移徙流民或狹鄉無田的農民往垦荒地，予以免稅三年的优待。歷次移民，都由官府給鈔，备農具。洪武26年，全國田畝总数达850万頃，荒地大体垦成熟田了。遭受到元蒙統治破坏的農業生產，迅速地得到了恢复和發展。在工商方面，由於解放工奴和減低稅收，同时又有着農業經济的發达为基礎，为工商業的空前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样，明初的經济繁荣，促使了社会經济的上昇和社会生活的向前發展。

生產力的發展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前進，使封建社会的內部孕育了新兴的生產方式的因素，即資本主义的因素。这种因素的日益增長，就成为动搖封建主义基礎的力量。这是封建社会到了末期的特点。朱明王朝已处於封建主义的垂死階段了，因此要加强和巩固它腐朽和反动的統治，統治者必然是極力阻碍生產力的發展，用殘酷的手段鎮压人民的反抗。

朱明王朝在政权制度上的特点是高度的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廢丞相，軍权政权等一切統治权力都高度的集中於皇帝一人之手。自从朱棣（成祖）陷了南京，做了皇帝以后，中央集权的君主專制便更發展为極端的君主專制独裁。皇帝可以任意責打殺戮臣子，君臣的关系是实实在在的主奴关系，当然一般老百姓在統治者眼里更成为草芥了。在封建社会末期，封建势力开始为新的社会力量所动搖，而統治者又要極力巩固他的統治，这种君主專制独裁是与之相適应的。在思想观念上配合極端的君主專制独裁的是用腐朽的程朱理学束縛人民的思想，進行毒辣的思想統治。当时用八股文取士，不准士人發揮自己的見解，要揣摩古人語气，代替古人說話。主要是禁止人們自由思想。明代初期即开始有文字獄，言論不自由，要使人們的思想就范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因襲的陈旧观念。这無非是想

宣傳君主是独尊的、君主和天地一样神聖不可侵犯，必須唯命是听。朱元璋曾因为孟子說过"民为貴，君为輕"，"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一类有損於君主尊嚴的話，撤去他在孔庙中的位置，命令刘昆孙删節孟子文句。后來知道孟子的那些不中听的話只是偶發的、为数極少的，同时又經过了朱熹的註釋已經沒有什么危險了，才放心地恢复了孟子的地位。明代在思想观念上是竭力宣傳与君主專制独裁相適应的君为貴民为輕的观点的。甚至於進一步認为人的人性是有高下貴賤之分的，統治者与被統治者在人性上是有区别的。这样，統治者之压迫和剝削人民仿佛是应該的合理的，人民之被侮辱被損害是人性卑下和註定如此的。把对立的階級关系遮盖起來，把統治者剝削人民的关系說成是天然的关系，阻碍人民去認識被剝削与剝削的眞象。

明代商品貨幣經济不断發展的結果，促使更多的農產品商品化，也刺激了官僚地主階級及最高統治者更多的奢侈要求。於是，加緊剝削人民，加强掠夺和兼併土地，造成了土地高度集中的現象。皇帝是全國最大的地主，明代皇帝本人佔有大量的庄園作为私產，称之为"宮庄"或"皇庄"。仁宗时有宮庄数处。憲宗以后續有增置。武宗增置最多，在北直隸（今河北省）就有31处，連同原有5处，共佔地3万7千余頃。武宗时建立的皇庄后來更增加到300余处。这些皇庄的土地都是統治者瘋狂地掠夺農民耕地而來的。这种皇庄是皇帝派專人管理的，里面無法無天烏烟瘴气。范文瀾編"中國通史簡編"中有一段話，可以說明这种情况："皇庄有管庄太監，有旗校（武官），每处約有三四十人，招集土豪流氓，或称庄头，或称伴当，互相作惡。庄中起盖房屋，搭架桥梁，擅立关口，私刻印信，凡人民撑駕舟車，放牧牛馬，採捕魚蝦，無不勒索錢財，又鄰近地土任意划界，按畝征銀，民間妇女任意奸淫，略要分辨，即被誣指罪名，綑送庄官拷打嚴办。人民驚慌不安，怨恨入骨。"（762頁）除皇庄外，藩王、勳戚的庄田也有很大的数目。这些貴族为了擴大自己的庄田指民田为荒地向皇帝乞請恩賜，兴王祐杭前后向孝宗乞地达1300余頃。有的更依势压迫農民向其献地，有的公然搶夺民田。孝宗时賜勳臣張鶴岑肅寧（河北肅寧）諸縣田400頃，張竟乘机侵佔民田3倍，並毆民至死。勳戚閹臣的庄田共有330多处，佔地3万3千余頃。諸王府官及閹蓄养爪牙以万計，丈地征稅，四出敲詐，格殺庄佃，慘毒不忍聞。除了藩王、勳戚的庄田外，許多在鄉的官僚地主，也与官府相通，上下欺瞞，狼狽为奸，殺人夺產，胡作非为，殘暴的損害着人民的生命財產。大学士温体仁与都御史唐世济竟勾結太湘强盜殺人越貨，梁儲子梁次攄为了搶人田產，竟殺人200余口。这些庄田是各地的封建势力的堡壘，人民痛苦的根源。它們如同割据一方的小王國，瘋狂兇殘的掠夺和剝削，使農民生活悲慘，暗無天日；同时这些庄田擅立关卡，任意掠夺，也阻碍了工商業的發展。

明代从成祖以后，皇帝多荒淫無恥，昏憒平庸，懦弱無能。於是宦官佞臣專制，敲詐勒索，吞併土地，搶刼商旅，奸淫妇女，殘害人民，無惡不作。政治黑暗腐朽，人民处於水深火热之中。这种反动势力和各地庄田，形成了破坏農業經济的發展、压制資本主义因素成長的天罗地網。

由於土地的高度的集中，封建統治階級重重压迫和兇暴的掠夺，農民处於不能繼續生存下去的地步，引起了此起彼伏的農民起义。从朱棣以后，規模不小的農民起义接連不断的發生。同时，由於工商業發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形成了一个新的經济力量，与封建势力發生了嚴重的矛盾。封建統治階級为了巩固封建势力，对工商業的發展加以打击和摧殘。統治者一面用壟断某些重要的部門（如鹽、茶、礦產）及用加重稅收來阻止工商業的發展；一面貪婪的瘋狂的掠夺工商業，任意搜刮，横征暴歛，以滿足他們日益增長的奢侈要求。結果發生了市民起义。总之，農民、市民与進入垂死階段的封建势力，形成了尖銳的矛盾。①这就是"西遊記"產生的时代特征。

二 "西遊記"的現实意义

前面說过，明代極端的專制独裁，在思想观念上，統治者努力制造君貴民賤的說法，君主是至高無上的不可違抗的力量，君主是神化了的天的意志的化身。把統治者与被統治者区别为高貴和卑賤的等級，認为是天命註定的，皇帝"天子"理当为統治

① 本節中有些材料，分别引自尙鉞編"中國歷史綱要"及范文瀾編"中國通史簡編"。

者，人民卑賤理当为被統治被压迫者，这样來維护皇帝的尊嚴和神聖，以巩固君主的統治。但是，在“西遊記”里却否定了这种观念，提出了君主与一般人民在人性上並無高下貴賤的区别，而是处於平等的地位。这样來否定傳統的君主的神聖和尊嚴，实質上就是人权平等思想的萌芽。

“西遊記”第一回石猴作猴王的那段描寫，說明孙行者能当猴王並無别的原因，而是第一个勇敢的穿过瀑布找到了水帘洞。進洞以后，孙行者說：“列位呵，‘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你們才說有本領進得來，出得去，不伤身体者，就拜他为王。我如今……尋了这一个洞天与列位安眠穩睡，各享成家之福，何不拜我为王？”於是，众猴听說才拱服礼拜的“分派了君臣佐使”。这里很明确的想从最初形成君臣之分时，來解釋君主臣民本來是平等的，君臣的分别只是后來的人为的关系。这道出了事情的本質。不但这样，另外在吳承恩的筆下，君主与臣民在人性既無貴賤高下的分别，也無至高無上的独尊。在唐太宗入冥的故事中（第十一回），唐太宗在冥間分文沒有，要得些錢鈔給孤寒餓鬼，不得不向开封一家販賣鳥盆瓦器营生的貧戶相良借用庫銀。这里皇帝就失去他的尊嚴和高貴。曾經是至高無上的統治者的李淵、和他的兒子建成、元吉，与那些六十四处烟塵七十二处草寇的寃魂並無分别，同受着种种折磨。这些描寫虽然雜有宿命观点，但却也打破了等級观念，把皇室与平民平等地看待。太宗入冥的故事虽然在唐代就有了，但經过作者具体的描寫，把君主和人民平等化起來，打破了統治者与人民之間命定的不平等的观念。

“西遊記”創造了一个成功的形象——孙悟空，孙悟空是作者心目中的英雄，也是人民心目中的英雄。为了得到武器，打入龍宮，以致敖廣在玉帝的表文中說：“……妖仙孙悟空者……逞兇呈势，甚为难制”，希望“乞派天兵，收此妖孽，庶使海獄清寧”；为了反抗“暗中有閻王老子管著”，大鬧地府，以致十殿閻王在表文中說：“……妖猴孙悟空，逞惡行兇，不服拘喚。弄神通，打絕九幽鬼使；恃势力，驚伤十殿慈王。大鬧森罗，强銷名号”，希望“收降此妖，整理陰陽，永安地府”。孙悟空勇於打击統治秩序，这当然不为統治者所容，狡滑陰險的太白金星用“弼馬温”去招安他，后來又用“齐天大聖”的空名去籠絡他，最后用强力去鎮压他。孙悟空因为玉皇“甚不用賢”（第四回）而大鬧天宮，提出了“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第七回）的大胆口号，攻击着“君君臣臣”的封建观念及君主專制独裁統治。这种大鬧天宮地府、蔑視一切統治势力的思想正是人民起义所需要的。在当时，統治者把天、地、人君認为是神聖不可触犯的东西，是無比尊嚴的。但是在“西遊記”里所描寫的孙悟空的行动，却嚴重的打击了这种观念。同时，在孙悟空大鬧天宮的故事里，表現了一面是統治势力的黑暗腐敗，玉皇的老朽昏庸，天神天將的懦弱無能；一面是孙悟空的勇敢無畏，蔑視一切“尊嚴”的統治势力，並敢於反抗。这样完全暴露了九曜星、五方將、二十八宿、四大天王、十二元辰、五天五老等等是不堪一击的，揭穿了貌似神威的統治者是可以被战勝的。人民幻想中的英雄孙悟空用金箍棒殺开了一条血路，使人們看到統治者的秘密：腐朽与黑暗，懦弱与無能。

孙悟空大鬧天宮的故事成为人民最欢喜最熟悉的故事，一方面它顯示了人民的力量，間接的反映了人民要求推翻当时腐敗政治的願望；另一方面，它对於人民反正統思想，給予有力的啓示和鼓舞。在君主專制独裁与政治黑暗的明代，“西遊記”有着很大的現实意义。

三 “西遊記”的社会意义

孙悟空大鬧天宮后，被如來佛压在五行山下有500年之久，直到唐僧西天取經路过五行山將金字压帖揭去后，才脫离了苦境，从此开始了九九八十一难的艰險路程，沿途展开了与妖魔鬼怪的斗爭。在鬧天宮的时候，孙悟空是作者和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形象，所有的同情和讚許都集中在他身上，因为他是正义的，反对不合理的黑暗的統治是符合人民願望的。在去西天路上，孙悟空跋涉了千山万水，吃尽了千辛万苦，排除了难以置信的困苦，消滅了各种各样妖魔，作者和人民同样是把同情和讚頌集中於他的。因为孙悟空是善良正义的，是視惡如仇的，是勇敢堅毅的。消滅危害人民的妖魔也是与人民的願望相一致的。

如果說，这些盤踞在各个山嶺洞窟中的妖魔是代表農民起义，那是完全錯誤的。这样不但污蔑了農民起义的性質，同时也否定了孙悟空斗爭的意义。

八十一难的描寫佔全書的六分之五，是作品的主要部分，如果这样去理解"西遊記"，也等於否定了它的价值。

这些鬼怪妖魔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爱吃人或危害人的。例如，黃袍老怪（第二十八回）一陣狂風攝走了宝象國的百花公主，强成夫妻。在宝象國銀安殿作客时，現了本相伸开簸箕大手吃过宮女。紅孩兒搜掠地方，甚至連山神土地也叫起苦來："把我們头也摩光了。弄得少香沒紙，血食全無，一个个衣不充身，食不充口。"（第四十回）通天河的金魚怪要吃一个童男一个童女以及猪羊牲醴，否則就降禍生災，弄得人民痛苦不堪（第四十七回）。隱霧山折岳連环洞的豹子精的后洞里，孙悟空解救了一个樵子，这个豹子精同样是吃人的（第八十六回）。例子举不勝举。这些妖魔鬼怪絕不是代表農民起义，而是代表着地方上的惡霸地主的。明代土地高度集中，皇庄、諸王貴戚庄田、官僚地主的庄園都是一个个的小王國，前面說过这些堡壘压榨搜刮、殺人放火、奸淫掠夺，無惡不作，这与那些妖魔何等相似！明代的官僚地主及藩王勳戚倚势恃强压迫人民，与最高統治者有着千絲万縷的联系。"西遊記"中的許多妖魔也是如此的，例如黃袍老怪是天上的奎木狼。想吃唐僧肉的金角大王銀角大王是太上老君的兩个看爐童子（第三十五回）。烏鷄國國王被金眞道士謀害三年，無处伸寃，因为那个道士"神通廣大，官吏情熟，都城隍常与他会酒，海龍王尽与他有親，东嶽齐天是他的好朋友，十代閻罗是他的異兄弟"，所以"無門投告"。原來是文殊菩薩为了洩私憤把他的坐騎青毛獅子派來捉弄人的（第三十九回）。这样的例子也是多不勝举的。这些妖魔的确非常眞实的反映了当时地主統治階級的面貌和情况。

在人們心里，是希望把这些罪惡的、無惡不作的妖魔剷除掉，孙悟空成为这种願望的具体化身。他用他的勇敢、智慧、不折不撓的斗爭及神通廣大的力量打垮了沿途的各个妖魔，夷平了他們的洞窟。每战勝一个妖魔后，我們都感到輕松和欣喜。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正义和勇敢的孙悟空取得了勝利，邪惡力量被消滅了。孙悟空是被热情的讚許和肯定的。当时痛苦不堪的農民，正幻想孙悟空这样的英雄人物來推翻那些封建地主惡霸解除苦难的。孙悟空这个形象是当时農民眞实的願望的反映，是救苦救难、除邪誅惡的化身。

如前所說，明代工商業發展成为一个新的經济力量，与封建統治形成了嚴重的矛盾。那些形成割据局面的庄田，往往掠夺工商業，自設关卡剝削工商業等，嚴重的阻碍和打击工商業的發展。工商業的發展正要求剷除那些小封建王國似的庄園，不扫除他們工商業就不可能得到順利的發展。在"西遊記"里，虽然並沒有直接寫到工商業的發展，但是寫唐僧孙悟空等排除困难，走过亘古以來从未有人來往过的地方，打垮了反动的妖魔統治势力，消滅了沿途的重重阻塞，开辟着交通，在客观上却是工商業發展要求的曲折間接的反映，表現了資本主义萌芽要求冲破封建主义重重限制層層束縛的願望。这不能不說"西遊記"含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

四 "西遊記"的人民性

孙悟空大鬧天宮，是代表了人民对統治階級的反抗的火焰，是应該肯定的。在去西天的路上打击妖魔，是代表了人民要求打垮惡霸地主的願望，也是应該肯定的。但是，我們看到孙悟空在大鬧天宮的时候，玉皇与佛是联合起來鎮压他的，而在他与各个妖魔斗爭的时候，天神天將及佛都是來帮助他共同对付妖魔的。这样，是不是孙悟空已投降了統治階級了呢？假如这样的話，前后肯定孙悟空的斗爭是不是有了矛盾了呢？許多研究者由此得出各种不同的結論。要解决这个問題，必須从作品的基本傾向上去看。

首先，我認为要解决作者对皇帝所抱的态度問題。这在"比丘國"的故事（第七十八回）中，最能典型地說明作者的态度。比丘國道士做了國丈，進女色，國王荒淫無恥，殘忍昏憒，搞得國内烏烟瘴气，"在街市上行毆多时，看不尽繁華气概"。國王用國丈延寿的海外秘方，要用一千一十一个小兒的心肝做藥引子，煎湯服藥有千年不老之功。屈伤这許多小兒性命，甚至唬得唐僧骨軟筋麻，止不住腮边淚墮，失声連叫："昏君，昏君！"作者在这里是完全否定那个昏君及比丘國的腐敗政事的。但是，以后作者是把罪惡归到那个道士身上，國王最后清醒过來了，說："感謝神僧救我一國小兒，眞天恩也！"非但沒有提出推翻國王的思想，反而对清醒过來了的國王加以讚揚，寿星甚至送他三枚棗子退病延年。从这里我們很具体的看到作者对皇帝的态度。一方面，

吳承恩对那些不能用賢的、殘害人民的、昏庸無能的、荒淫無恥的君主是仇視的、反抗的。这可以說明为什么作者要对孙悟空鬧天宮时的玉皇、受道士支配的滅法國國王和比丘國國王都極尽諷刺攻击之能事。另外，对君主兩側的、引誘皇帝做坏事的、危害人民的"國丈""國师""赃官"更是仇恨至極。比丘國的國丈、車迟國的虎力鹿力羊力大仙都是心怀叵測的道士，想通过祈雨、進女色等方式实現他們的陰謀。这很眞实的反映了明代的情况，道士利用最高統治者的腐敗和想長生不老，通过煉丹、祈雨等办法爬上高位，取得权力，殘酷的搜刮和統治人民。被皇帝奉为眞人的道士邵元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用了类似的欺騙手段竟做到了礼部尙書。这些人，在吳承恩的筆下，沒有一个是有好下場的，說明了作者对他們的切齒憤恨。"祭賽國"昏君不察事理，寃枉和尙偷珠（第六十二回），而那些赃官則变本加厉，"千般拷打，万样追求"，弄得人痛苦不堪。这些赃官，正是明代腐朽統治所產生的那些宦官佞臣的反映，是被完全否定的。作者对腐朽的、黑暗的政治是反对的，他用滿腔热情刻画了孙悟空的英雄行为，清除那些在君主兩側的無惡不作的姦臣，使人民的苦痛得到解除。但是，另一方面，吳承恩把皇帝昏憒、殘忍的原因归之那些佞臣的引誘，而为他推卸罪惡的責任。作者並不提出要推翻皇帝，而是保留他們的。例如烏鷄國的故事，那个道士篡了皇位，但后來被孙悟空辨明邪正，打垮了道士，那个死了三年的烏鷄國國王，作者仍使他恢复了生命並复了皇位。滅法國、祭賽國、比丘國、車迟國等國國王，都沒有被推翻，当他們清醒了以后都是被肯定了的。这可以說明孙悟空为什么沒有推翻得了玉皇的宝座，如來佛为什么帮助玉皇鎭压了孙悟空的原因。吳承恩所希望的並不是推翻皇帝，而是希望有好皇帝。

在吳承恩看來的理想政治，是像唐初那样的开明政治，君明臣賢。我們从唐太宗入冥故事中可以看出，作者对唐太宗是肯定的，甚至入冥的时候李世民陽寿已尽，还加了他20年的陽寿。对魏征这样賢臣，作者也是一再肯定的。李世民入冥时，崔判官說："陛下到陽間，千万做个水陸大会，超度那無主的寃魂，切勿忘了。若是陰司里無寃恨之声，陽世間方得太平之福。凡有不善之处，但可一一改过。普諭世人为善，管教你后代綿長，江山永固。"李世民一一謹記（第十一回）。作者希望最高統治者能看到人民的疾苦，能仁政爱民，乐善寬刑，使人民減少痛苦。而西天取經正是象征着去追求那种減少人民痛苦、希望眞正的國泰民安的理想和眞理的。另外，天竺國玉華縣的玉華王，是天竺皇帝的宗室，因为他甚賢，"重爱黎民"，作者也是十分歌頌的。那里酒楼歌館，热鬧繁華，被称为"五谷丰登之处"和"極乐世界"。玉華王的三个王子想拜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尙为师，"学他手段，保护我邦"，也被允許了，傳授了非凡的武藝（第八十八回）。这些例子都充分說明，吳承恩追求的是开明的政治及人民安居乐業的生活，並沒有推翻皇帝的意思。一面反对昏君和黑暗的政治，一面主張有明君賢臣的盛世，这是符合於当时人民的願望的。

中國封建社会經济發展是不平衡的，明代資本主义萌芽僅僅局限於某些商品經济高度發展的地区及某些工商業，再加上封建君主專制仍很巩固，苛捐雜稅以及統治階級种种的限制和压榨，使資本主义因素未能形成足以推翻封建統治的力量，在当时也还不可能提出超越封建观念使另一种社会制度來代替封建制度的思想。而農民由於受落后的生產方式的限制，更不可能提出超出封建制度的政治理想。因此在"西遊記"里也沒有能提出推翻封建主义的要求，这是作者思想的限制，也是时代的限制。在当时，反封建主义進到末期时的腐朽的政治，而要求政治开明，人民能够減輕痛苦，应該說是進步的思想。

总之，吳承恩只在反对君主的昏憒而已，而希望、劝諫君主能清醒起來，使政事清明，人民安定。孙悟空鬧天宮是因为玉皇昏庸"甚不用賢"，才提出"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的。但是沒有提出可以不要皇帝，而是希望有一个英明的皇帝。在孙悟空去西天取經时，玉皇对孙悟空的态度由敌对的关系轉变为共同一致，玉皇一再殷勤的派天神天將帮助孙悟空去除妖。在"西遊記"里，吳承恩希望君主清醒和賢明起來，去扫除盤踞各地危害人民的惡势力，玉皇后來是这样做了，作者对玉皇於是也採取了肯定的态度。总之，吳承恩是主張自己理想中的英雄帮助比較賢明的君主去扫除各种邪惡的与人民对立的惡势力的。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在鬧天宮时肯定孙悟空和在西天取經路上肯定孙悟空並不是矛盾的，而是統一的。它体現了作者希望解除人民痛苦的思想，因此，"西遊記"是具有極大的人民性的。

但是，單这样說还是不够的，必須指出作者思想上的缺陷。吳承恩把政治改良的希望寄託給賢明

的君主，这是幻想。因为，最高統治者与人民是对立的，不可能为了解除人民的痛苦，做到"陰司里無寃恨之声，陽間享太平之福"的。恰恰相反，残酷的封建統治压榨得人民难以生存下去，那些布滿在各地的封建惡霸势力，是最高統治者的爪牙和支柱，最高統治者是不可能像書中所寫的玉皇、菩薩收服妖魔那样把危害人民的罪惡势力加以剷除的。吳承恩認識不到这些，因此事实和他的理想形成了巨大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在当时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

五　对"西遊記"的評价

在評价"西遊記"的时候，不得不涉及宗教問題。在"西遊記"里所有的道士都是坏人，禍國殃民的騙子手。明代的許多昏愚皇帝都相信道教，在各地兴师动众建雷壇、行齋醮等，而耗費大量錢財的結果，必然要加緊搜刮人民。"西遊記"从道教的禍國殃民的角度上否定道教，态度是明确的。但是，对佛教的态度則是复雜的。

宗教究竟是怎样產生的呢？斯大林說：

> 奴隸与奴隸主，農奴与農奴主，農民与地主，工人与資本家，被压迫者与压迫者——自古以來，世界总是这样構成，而且現时在絕大多数國家里仍然是这样。在数千百年当中，劳动群众数十百次企圖过擺脫压迫者，而成为自己生活底主宰。但他們每次遭到失敗，受侮丟臉，不得不实行退却，不得不忍气吞声，隱忍着恥辱与寃屈，憤火与忿怒，而翹首望着渺茫的天空，希望在那里找到救星。①

人們对巨大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無力反抗，而產生了消極反抗的幻想。列寧說过："宗教对一生工作和一生貧困的人，用現世生活中的順从和忍耐來教訓他，同时用期待天國的报偿來安慰他。"②因此，宗教的中心目的是要人們安於現狀，就范於命运的擺佈，而想用这种麻痹自己的消極办法去取得上天的恩賞，在虛無飄渺的來世的世界中獲得幸福。这是模糊階級性，麻痹人民的反抗意識，是为剝削階級統治人民服务的，因此馬克思称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不管道教或佛教，歷來都是中國封建統治階級用來統治人民的工具。

我們現在來看一看佛教所宣傳的思想內容。一方面，佛教宣佈了一切的人，不論階級、門第等，在佛法的面前都是平等的，沒有高下貴賤之分。要說佛教思想中有平等思想的話，应該是指的这一点說的。在封建社会中，尤其是在君主專制独裁的明代，压迫是深重的，人民处於被損害、被侮辱、被奴役、被蔑視的地位，佛教所宣揚的众生在佛法面前一律平等的思想，適应了人民要求平等的願望。但是，另一方面，也是佛教教义中更本質的一面，佛教在麻痹着人民的斗爭思想。佛教宣揚要在現实世界中棄絕一切慾念，放棄一切斗爭，要甘心承受一切剝削和侮辱而不加反抗，馴服於一切殘暴力量下反而把希望寄託給虛幻的、假象的來世。这样，佛教实質是在帮助統治階級維持殘酷的不平等的階級压迫的現狀。因此，在平等的口号下，掩蓋着佛教思想反动的本質。

在"西遊記"里，吳承恩从同情人民的立場出發，是接受了佛教的那种平等思想的。例如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后來都成了正果。另外，也接受了佛教的救苦救难的善良思想，孙悟空一路解除了無数人民的痛苦，对这些作者都是热情歌頌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佛教爱众生的思想与"西遊記"爱民的思想是有着区别的，这具体体現在唐僧和孙悟空的身上。唐僧的慈悲是抽象的，不分善惡和不分敌我的。对於唐僧出自慈悲心腸而加禍於自己，作者發出了譏諷和嘲笑；在通河天等故事和描寫中，孙悟空乐於解除善良的被压迫人民的痛苦，作者刻划出了他的善良正直的精神和对邪惡势力毫不留情的态度。作者肯定了孙悟空的善惡分明的人道主义，这是与人民的利益相一致的。另一方面，"西遊記"对佛教的安於現狀，消極的逃避斗爭，听憑命运的擺佈等观点，則是揚棄和批判的。这也鮮明地表示在对唐僧和孙悟空的态度上。唐僧非常迂腐，憑天由命；孙悟空則堅强勇敢，妥协、不气餒的与各种妖魔作斗爭。相形之下，我們是更爱孙悟空的。事实上，"西遊記"中寫唐僧被妖魔擄去，每次都不是听天由命得到解救的，总是孙悟空等战敗了妖魔以后才被解救。唐僧把孙悟空赶回花果山后，就不能前進，重新得到孙悟空以后，才能走完去西天的艰苦的路程。沿途卽使有观音等來帮

---

① "列寧文选"，兩卷集，第一卷，莫斯科中文版，第26頁。

② 列寧："社会主义与宗教"，三联版，第2頁。

忙，也全是孙悟空想尽办法知道了妖魔的底細，然后才把他們的主人請來的。因此，去西天的成功，是不屈不撓的战勝了邪惡势力取得的。吳承恩在肯定孙悟空的斗爭精神的同时，也就批判了佛教教义中对丑惡的凶暴势力放棄斗爭的观点，这也是从人民的立場出發的。总之，吳承恩对佛教思想的态度是有肯定有否定的，接受了它的一部分对人民有利的东西，批判了那些危害人民的、对人民不利的观念。对待和尚的具体态度上，也可以看到作者是有同情有否定的。車迟國的和尚被强迫做苦力（第四十四回），祭賽國的和尚負屈，"一个个披枷戴鎖，沿門乞化，着实的藍縷不堪"（第六十二回），滅法國的和尚遭到殺戮之禍，作者对他們是同情的，这不是从尊佛抑道的观点出發，而是从人道主义的观点出發的，因为在明代道教得势，和尚往往受到种种迫害。而对僧官的貪財势利，看中了唐僧的袈裟就起謀財害命之心，对和尚的寄生生活及要"人事"等丑事，作者又投出了尖銳的諷刺。

"西遊記"中对道教禍國殃民的批判，对佛教不利於人民的观点的批判，就是要人們不安於凌辱和痛苦，不安於奴役和屈服，鼓舞人們去斗爭。

但是，無可否認，在"西遊記"里也夾雜着許多糊塗的观点，最特出的是因果报应等的宿命論思想，給作品帶來很大的損失，这不得不說是吳承恩的思想的落后和局限的一面。

吳承恩对如來佛和观音是肯定的，把他們寫得很崇高和理想，他們能够掌握那种支配着世界的絕对的永恒的观念，他們能知过去和未來，佛法無边。在吳承恩看來，世界的一切是有一种無形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在操縱着的。皇帝是应該存在的，因此孙悟空这样大的本領也無济於事；那种力量是不可違拗的，因此孙悟空一个觔斗十万八千里也翻不出如來佛的手心；唐僧西天取經要有八十一难，因此处处是难关，少一难也不行。把支配一切的力量宗教化，不得不產生命定思想。当然，这也是时代的局限，人民多少年成百成千次的斗爭都被鎮压了，即使斗爭成功了，勝利的果实也是被一些野心家窃夺作为改朝換代的工具，始終脫离不了苦海，擺脫不了封建主义物質上、观念上的束縛，看不到斗爭的前途，而对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認为是不可动搖的。因此，在"西遊記"批判某些宗教观点的同时，又夾雜着宿命的宗教观念，这不能不說是"西遊記"很大的缺陷。

但是，"西遊記"有其光輝的一面，它給人以積極的、乐观的、坚决地与邪惡势力斗爭的教育。同时，"西遊記"曲折地反映了时代的面貌，它是帶有現实主义精神的一部作品。無疑地，"西遊記"与其他优秀的古典作品一样，是我們文学遺產宝庫中的瑰宝。

（上接第19頁）第三，社內領導骨幹强。有党的小組。貧農和新下中農佔居領導优势。並且領導骨幹已經積累了初步的經营管理經驗。加上曹庄鄉是中共浙江省嘉兴地委的基点鄉，指導上具体有力及时，有了問題能够迅速解决。目前正在生產高潮中抓緊处理經济关系問題和建立生產劳动組織。

具备了以上的条件，就完全可以轉变为高級社。

其次，从这个合作社1956年發展生產的規划來看：要实現水稻每畝806斤的高額產量指标，是具备着可能条件的。基本的增產措施是：第一，大力改变耕种制度。全社种植双季稻的田畝將由1955年的約佔总田畝数13%增加到70%，其余全部种單季晚稻，消滅旱、中稻面積。第二，增積肥料。河泥由1955年每畝70担增加到140担，綠肥由每畝產量1,500斤增加到2,500斤。养猪由300只增加到600只，羊由400只增加到500只，达到每畝施畜肥20担。第三，增加生產工具，採用新式農具。農船由17只增加到25只，耕牛由67头增加到72头，抽水机由6台增加为7台；購置双輪双鏵犁8部、打稻机10架、治虫器械噴霧器8具、汽灯8只，建造糞池8只。第四，改進耕作方法。主要是深耕密耕、小株密植等等。第五，同病虫鳥獸害作斗爭。所有这些增產措施，在高級社內是完全能够实現的。旱地粮食產量，1956年达到每畝450斤，比1955年的250斤增加80%，主要措施是在30%的旱地面積上由二熟（春花、黃豆）改种三熟（增加一熟玉米），在50%的旱地上推廣玉米、番薯等高產作物。为了發展蚕繭生產，决定大力培育和擴大桑園。1956年补种桑苗120畝（每畝补种150株），1957年再补种200畝，1958年补种100畝。养魚在1955年3,000条的基礎上，1956年增加到16,000条。随着合作社經济形式的提高和組織規模的擴大，随着農副業生產的迅速發展和社員收入的逐年增加，社內規划了其它各項社会主义建設。綠化村庄，1956年植樹9,000株；修桥鋪路，1956年修筑由村通鄉的大路三条；扫除文盲，社內1956年办冬学5所、吸收16歲到45歲的文盲50%入学，办常年民校一所，吸收20%入学；文化生活，1956年春耕以前裝好一个有綫廣播机，秋收以后架設电話机一台，買收音机一架，建筑籃球場、俱乐部，1958年裝置电灯。总之，一个"生活富裕、人畜兩旺、文化發达、風景美丽"的社会主义新農村很快就要出現了。

明代治黃專家潘季馴

何仲珉

一 前 言

"黃河清，聖人生"。这一句流傳很久的古話，一方面表明人民对根治黃河的渴望；同时也說明了黃河不是不可治，而是以往的封建王朝（包括國民党反动統治在內）不能治。这是因为它們的政权是反人民的。只有人民自己掌握了政权以后，才能根治黃河。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議通过的"根治黃河水害和开發黃河水利的綜合規划"，表明了这个眞理。在中國共產党和人民政府領導下，眞正实現了"黃河清"，人民的夢想，变成了現实。

过去一切王朝，也都不断地進行"治理"黃河，但是都沒有能从根本上解决黃河的問題。我們知道，远在西漢哀帝时，征士賈讓曾經上过有名的"治河三策"。在那里面，他第一次提出了"筑石堤、建水閘、攔蓄河水、引水溉田"的積極开發黃河水利的傑出理想。但他的建議並沒有被採納。以后，歷代治黃的人們，都只能够照着賈讓所說的"下策"去做，即所謂"繕完故堤，培卑倍薄，劳費無已，数逢其害"。

不过，由於我國劳动人民同黃河災害進行了長时期的艰苦和英勇的斗爭，因而，在治黃的办法上和治黃的工程措施上，都積累了丰富的經驗。上述賈讓"治河三策"中的上策和明代治黃專家潘季馴的"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原則，就是其中傑出的总結。

潘季馴的治河原則，虽然沒有超出送走水和泥沙的范圍，但是我們从歷代防治黃河史上可以看出，要想順利地送走水和泥沙，就是說，要使黃河安流入海，不致泛濫为害，也大非易事。所以，从这一点上，並联系当时的社会条件和技術条件，來看潘季馴的治河，我們就不能不承認潘季馴所作的貢献是空前的。他是我國歷史上傑出的治黃專家。

二 潘季馴防治黃河的事蹟

潘季馴（1520—1595）①字时良，号印川，烏程（浙江吳兴）人，嘉靖29年進士。初做九江推官，后升御史，巡按廣东，在任时嚴懲貪官汚吏，斥抑豪强，一时貪官汚吏听到他來，都紛紛离去。他很能接近人民，頗知民間疾苦；虽出身地主階級，但作風和当时的一般官僚大不相同。他在45歲那年，即嘉靖44年（1565）开始轉任河道总理，到73歲，即万曆20年（1592）退休止，前后四任河官，在河工上花了27年的心血（除离开河工职务外，实际任河工十多年），他那丰富的經驗都总結在"河防一覽"这部治黃專書里面；此外，他还留下一部著作名"留改集"。

潘季馴第一次总理河道是在嘉靖44年（1565）8月。这年7月河决蕭縣等处，（这时黃河主流，大体是从汴水至徐州入泗再入淮，略似現在地圖上的淤黃河。）分为南北兩大股，北股更散为13股，縱橫以入运河、昭陽湖，运道淤200余里。这是有明以來河变最厉害的一次。明王朝以工部尚書朱衡总理河漕，以大理寺少卿潘季馴晋升都察院右僉都史，总理河道。朱衡主張循盛应期前議，即开南陽至留城的新运河。潘季馴初請复賈魯河的故道，未被採納。后乃請准接浚自留城至境山53里的旧河。治河成功，晋升为右副都御史。次年11月，因母丧

① 潘季馴死於1595年，时年75歲。他的生年是根据他的卒年推算出來的。

辞职。

第二次总理河道是在隆慶4年（1570）8月。自隆慶元年起三、四年來，不断决河，阻运道，坏漕舟，前后浚治，都無功效。於是封建統治集团慌張起來了。有的主張棄黄河，行曲头集支河；但支河阻淺。有的主張棄黄运，改由膠萊运河和海运。有的主張开泇河。議論紛紜，不能归一。於是再起用潘季馴，总理河道兼提督軍务。潘季馴到任后即親到各处踏勘，上疏力言治河办法唯在疏浚黄河故道，經过多次的反复辯論，說服了当时的反对者。他督率民工5万人，進行疏河筑堤。計疏浚睢寧匙头灣以下正河80余里，沿河筑縷堤3万余丈，塞决口11处。使河流受束，浚刷淤沙，恢复了旧河，暢通了漕运。王錫爵說他这次河工的成就："廢址尽复，其所浚深厚，再倍於故河，而費半之。出官民之舟於積淤者，以万計。"①在这次施工中，潘季馴曾乘小舟至河中勘測，遭遇風暴，幸船被冲到樹上碍着，沒有淹死。当筑塞工程快完成时，接連多日大風雨，黄河桃汛，山水驟漲，新旧堤防多被冲决，官夫多欲逃散，潘季馴这时正患背疽，便包瘡而出，親到工地督工。大水漫过堤頂，淹及他的脚上，还坚持不去。在他这种忘我精神鼓励下，大家都奋勇工作，終於完成了堤工。

因为他曾反对开泇河，得罪了当道，被勘河給事雒遵誣为对於"驅漕船就新溜，坐視陷沒"。於隆慶5年12月撤了他的职，"冠帶閒住"。

第三次总理河漕是在万歷6年（1578）。先是万歷3年河从崔鎮等口北决，淮从高家堰东决，徐邳以下至淮南北漂沒千里，桃源一帶运道阻梗。万歷5年8月，河又决崔鎮，黄水北流，清河口淤澱。全淮南徙，高堰大坏。"横流四溢，連年不治"。吳桂芳所开的草灣入海之道（万歷3年开始，万歷4年完工），这时也完全淤塞。河变这样嚴重，嚇昏了封建統治集团，有的認为不应再循黄河故道；有的認为决口不要塞；有的認为多开支河，以殺下流水势；还有的主張另辟海口。明王朝感到手足無措，只得再起用潘季馴。

万歷6年2月升潘季馴为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工部右侍郎，总理河漕兼提督軍务。他到任后，親到海口踏勘，再沿黄、淮、运調查情况，訪問治河官吏、居民以及船工篙师，將他們的意見進行分析总結，然后决定他这次治河的方針："筑高堰，塞崔鎮，束河淮正流，使並趋入海"。他在有名的"兩河經略疏"中，再度强調"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原則。又条陈治河六議：（1）塞决口，以挽正河；（2）筑堤防，以杜潰决；（3）复閘壩，以防外河之冲；（4）創滚水壩，以固堤岸；（5）止浚海工程，以免糜費；（6）寢老黄河之議，以仍利涉。这就是他这次治河的全面規划。他这次又上了"河工事宜議"。最后一議是息浮言，他說："至於將迎之間，稍稍簡略，則以是为非，变黑为白。"要求准許他"殫力馳驅，悉心料理，寬臣以三年之期，如有不效，治臣以罪"②。这几句話把当时恶劣的政治風气、社会風气和他在工作中遭到掣肘的情况，全盤反映出來。由於他那理由充分的意見和勇敢負責的精神，說服了当局，准許他"便宜行事，不加中制"。有了这个机会，他便按照他的一貫的原則和这一次的全面規划，开始了治河工程。首先是大筑黄河兩岸遙堤。北岸遙堤自徐州呂梁起至邳州直河止；又自宿迁古城起至清河縣城止。南岸遙堤自徐州三山起至宿迁李字鋪止。又於泗、宿、桃界内筑归仁堤，以遏黄河南奔入淮之势。大筑高家堰（長60余里，清朝增为100里），以蓄清刷黄。修筑清江浦至柳浦灣（在山陽縣东北）旧堤，接筑柳浦灣至高嶺（在安东縣对岸）新堤。再筑塞崔鎮等大小决口130处（决口均在今泗陽、淮陰北岸）。又建桃源縣北岸崔鎮、季泰鎮、徐昇鎮、三义鎮減水石壩四座（四壩都筑在遙堤上，清康熙年間另筑遙堤，四壩均廢）。又於丰、碭界建邵家口大壩土壩一道，遏断秦溝旧路，專行崔家口新河。这次工程自万歷6年至8年2月，費时約兩年，使黄、淮归入正道，沙刷水深，暢流無阻，海口亦被冲开。万歷8年他又議防徐北，以固上流。乃大修太行堤，帶筑縷堤，修筑月堤，以为保障。又筑王簡口堤（在清河縣境内，清口西3里），使淮水專出清口。河工完畢，他在"河工告成疏"中再度論証他的治河原則和規划。又上"善后疏"，提出7項河防的具体意見。

万歷8年5月，他晋升为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等黄汛过去，9月离开了河漕职务。万歷9年改授南京兵部尚書，11年正月改为刑部尚書。这一年他为張居正案对当道有所批評，被誣为"党庇"張居正，朱翊鈞竟把他削职为民。

第四次总理河道是在万歷16年（1588）4月。自从潘季馴在第三任中塞决筑堤以后，黄淮安流了

---

① 王錫爵："印川潘公墓志"。

② "河防一覽：河工事宜疏"。

五、六年。可是自他去后，河工廢弛，不遵守歲修法，也不設管河專官，僅以漕督兼理。明封建王朝这时已更加腐朽了，財政也非常困难。

可是河患的加深，一向是跟封建王朝的衰落成正比的。万歷14年河决范家口，又决天妃壩。15年决开封、灵宝、祥符銅瓦、封邱、原武，責令撫臣分区經理，無济於事。統治集团束手無策时，只得"交章"荐潘季馴，甚至說他功不在宋礼之下。为了起用潘季馴，特恢复总河專官，派他为右都御史总督河道。他到任后，还是貫徹他原來的原則和規划。首先請停开已动工的曹家营支河；同时，大修河堤。筑徐州塔山縷堤（自鎮口閘西北至塔山），塞張福口，又加帮王簡口旧堤，以專清口的刷黃水力。17年又大筑黃河兩岸遙、縷、月各堤，自武陟、滎澤至單縣、虞城；又自丰、碭至桃、清，修筑丰、沛太行堤、邵家大壩、塔山縷堤。又自塔山西北延筑長堤，截断茶城运口故道，与旧堤相接。筑徐州以下兩岸格堤7处。18年筑長樊大壩（徐州境自長山至樊家店，無啓閉，水漲自行出水，过磨臍溝），接筑安东南堤（自高嶺至戴百戶营）。19年冬，他查勘海口暢通。又建議高堰石堤南北一概砌石，以加强蓄清刷黃的工程，因經費难筹，未实行。王錫爵說他这次的成績："兩河合軌，数万艘轉运無害，緣河之民，始見室廬丘隴，烟火弥望"。①他曾上"河工八事疏"，特别强調歲修法，規定每年要加筑遙堤高厚各5寸。这个时期他已是70歲的老人了，仍親自参加野外工作，"与役夫雜处畚鍤萃蕭間，沐風雨，裹霜雪，髮白面黧"，以致"咯血骨立"②。自万歷18年冬起，他便上疏乞休，不允。19年升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兼右都御史。20年正月批准了他第四次的退休請求。时年72歲。退休后第3年，即75歲，便死去。

三　潘季馴对河防的貢献

明代自永乐9年以后，所有中央政府和边防軍的給养，都靠由东南一帶經运河运來的粮食。所以运河水道直接关系明王朝的統治。而黃河要穿运入海（筑断黃陵崗以前，黃河北流自山东穿运，南流在徐州与运会），一旦黃河决堤，便冲塞运河。在統治階級看來，黃决不算了不起的事，因黃决而淤运道，致每年400万担粮食不能运至京师，才是極嚴重的問題。"續文献通考"說："然前代河决不过坏民田廬而已，我朝河决則慮併妨漕运，而关系國計，故治河視前代尤急"。这里很明白地說出了明代治河的目的，主要在於保护运河（清代亦复如此）。虽然有明一代的治河者都不能違背这一最高原則，但他們在治河的实踐上，却有不同的方針。大体上可以分成兩方面，一方面，也就是大多数的治河者所持的方針，僅僅是防黃河冲淤运河，对於治河採取消極的态度。如徐有貞、白昂、刘大夏、刘天和（甚至朱衡也在內）等都是其中的著名人物。另一方面，就是潘季馴，还有万恭也是与潘季馴意見一致的。潘季馴堅决反对这种消極态度，提出"治河卽以治运"的口号，主張積極治河。对治河採取消極态度的人們，主要的办法就是"分疏"。所謂"分疏"，就是在黃河下流多开枝河，分洩河水。詹翰（嘉靖27年总理河道）有几句話，足以表明这派人的思想情况，他說："利不当与水爭，智不当与水斗，汲汲唯枝河是开，長堤是防"③。他們还有另一种更反动的办法，就是"以鄰为壑"。白昂、刘大夏、刘天和等趁黃河有南行趋向，便在黃河北岸修筑太行堤，筑曹單長堤，筑断黃陵岡，絕北流之道，攔河南行，而独空着南岸不筑堤防，以便黃河漲水向南泛濫，不致妨害运道。在他們看來，河水南潰"不过坏民田廬而已"，算不了什么。要是北潰，一定淤运，就关系"國計"。封建統治階級把它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区别得很清楚。此外，他們引为得意的事，还有迁运避黃。刘天和还說什么"运河远黃如远賊"，这也是說，他們只要能保护运道就够了，至於黃河为害人民不是他們所关心的。

必須指出，这一派的治河方針只是有明一代封建統治集团腐敗無能的反映。在那种后期的沒落的封建社会里，更兼永乐以后，中央集团日益腐朽，不可能有更远的眼光和与黃河災害積極進行斗爭的魄力。所以这种治河的消極态度一直与明代相終始。就是在潘季馴治河时期，由於他們在理論和实踐方面都是失敗的，不得不暫时退步，但並沒有停止活动，且又加上"疏海口"一說。潘季馴在治河中

① 王錫爵："印川潘公墓志"。
② 申时行："潘公季馴傳"、王錫爵："印川潘公墓志"。
③ "行水金鑑"，卷25："明世宗嘉靖27年"条。

四起四黜①，也表明双方所進行的复雜的斗爭。

但是"分則易淤，水壅則敗"。这就是分疏的必然后果。自永乐至嘉靖44年，这160多年的明代河防史表明的情况是：愈分疏，愈淤塞，愈改道，以致"河变愈急"。原來分疏对於顢頇的官僚來說，旣可以救急邀功，又可以兴工漁利，还可以不負責任。正如万歷年間給事中張养蒙所說："淤决則委之天災，而不任其咎。浚塞則归之人事，而共蒙其賞。及报成未久，懼有后虞，急求謝事，而繼者复告患矣"②。"南河編年"的作者正确地指出这一点："嘉靖戊午（1556）乙丑（1565）間，全河散漫逆行，其分支者以十数。論者謂河变之極。非河自变也，有使之变者也"③。分疏結果如此，並不能保护运道。而且，自从塞断黃陵岡逼河南行，山东运河全靠泉河給水，一遇旱年，运船阻滯，又造成了新的矛盾。朱衡說："古之治河惟欲避害，而今之治河又欲資其利，故流出境山以北則閘河淤，出徐州以南則二洪涸。惟出自境山至徐州小浮桥四十余里之間，乃兩利而無害"④。他們看到了这个問題，但沒有决心來解决它。

潘季馴坚决反对这些人所持的方針和对治河的态度。从他总理河道之日起，就一面和劳动人民一起，積極同黃河水害進行搏斗；一面同这些人們進行斗爭。特别在万歷6、7年的"兩河經略疏"、"河工告成疏"；万歷16年的"停訾家营支河工程疏"；万歷20年的"河議辯惑"、"堤防告成疏"、"併勘河情疏"中，对於分疏、導海、另开新河、不塞决口等等主張給以痛切的駁斥，在他退休时还上疏丁寧囑咐地說："人欲棄旧以更新，而臣謂故道必不可失也。人欲支分以殺势，而臣謂濁流必不可分也。……去國之臣，心犹在河。"⑤

潘季馴所以坚决反对这些人，最基本的是他所持的出發点和这些人不同。潘季馴所坚持的出發点是"民生运道兩便"。这也是潘季馴在河防上所作的一切貢献中最主要之点。在他的奏疏中，几乎每次都說到要"免运道梗阻之虞"；尤要脫虞、夏、丰、淮、揚"昏墊之苦"，使人民"得以安居乐業"。他在"河工告成疏"中說："臣等受事之初，触目驚心，所至之处，孑遺之民，扳輿号泣，观者皆为隕涕"。他就是以这样的心情來治河的。和那些顢頇官僚有根本区别。

在"民生运道兩便"的方針下，他一貫主張積極治河。他說："通漕於河，治河卽以治漕"。他之所以反对开南陽新运河和泇河，就是为着糾正只重运道不顧民生的錯誤方針，以便集中力量防治黃河。明中叶以后，黃河散漫入淮，以致淮水多害，黃淮入海口道常淤。主張分疏的人們，有的要多开黃淮入海之道；有的要疏導海口；甚至有的主張不塞崔鎮决口，讓淮陰以东地区做黃淮尾閭。他对这些便运害民的主張，一律駁斥。他說："河会於淮，治淮卽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於海，則治河淮卽以治海"。总之他認为要治运只有治河；治淮也是为了治河。由於黃夺淮入海，造成淮河水患。由於运河穿过黃河（这时尙未开通泇河，徐州以下运行黃河），河患卽是漕患。根本的問題是使黃河"順軌"。黃河能安流入海，一切問題就容易解决，所以必須以全力防治黃河。他正确地掌握了問題的基本环節。

怎样來防治黃河呢？他提出了"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著名原則。他在四任河工中都坚持和貫徹这一原則，特别是在最后兩任中，差不多全部展开了他的防河規划。他根据黃河水流泥沙过多的特点，認为"急則沙随水滚，緩則水漫沙停"。所以，"惟当繕治堤防，俾無旁决，則水由地中，沙随水去，卽導河之策也"，亦卽"以水治水之法也"⑥当时一些庸俗之見，以为徐州以下河床道狹易淤，洪水來时，宣洩不及，以致潰决，所以要多开入海之道；或以为由於海口沙壅，入口不暢，以致河决，所以要導海或另开海口。潘季馴恰恰和他們相反，他認为分疏才是造成河身淤墊因而潰决的眞正原因，也才是造成海口壅塞的眞正原因。所以他說："尽令黃河全河之力涓滴悉趋於海，則力强且專，下流之積沙自去。下流旣順，上流之淤墊自通。海不滯而辟，河不挑而深矣"⑦。为了便於束水攻沙，他一貫主張浚旧河，反对开新河。因为故道虽淤，但河形尙在，而且"嫩沙新淤，見水卽可冲刷"。旣然唯一办法是束水攻沙，所以他的重点是在於筑堤。他說："固堤卽所以導河"⑧。

他对筑堤是有很多貢献的。他在沿河兩岸去河身相当远的地方筑遙堤，以防洪水。又沿河身兩旁

---

① 他在第一任时，反对开南陽河与朱衡議事不合。第四任时与周宗等議事不合，給事中楊其休請允季馴归去。参看"河渠紀聞"及"明史：本傳"。

② "治水述要"，卷3："明神宗万曆17年"条。

③ 裏書綬："南河編年"，卷3。

④ "行水金鑑"，卷26："明穆宗隆慶元年"条。

⑤ "河防一覽：併勘河情疏"。

⑥ "河防一覽：兩河經略疏"。

⑦⑧ 同前引書。

筑縷堤，以拘束河流，使能冲刷。於遙、縷二堤間横筑一堤，名叫格堤，以防縷堤冲决时，水遇格卽止，不致另冲成河。於縷堤內筑月堤（形如半月，兩端接縷堤），以备縷堤冲决，水遇月堤卽止。此外，还对於筑堤、护堤工程，修葺、防守制度，都作了許多具体的規定。誠如他自己所說："防御之法，頗称周备"。

总之，他的防治黃河水害的办法，就是沿河筑堤，用完备的堤防把滔滔的河水約束於原來的河道中，使河水全力冲沙入海。沙刷水深，河循正軌。当然这里还有兩个問題要解决的。其一，遇異漲之水，如果連遙堤也不能抵御时，应如何处治。其二，我們知道黃淮会於清口，同流入海。一般是黃强淮弱，因此，黃会淮时，势必倒灌，黃水的泥沙將淤塞淮河水道。他的办法是：在徐州筑長樊大壩，以分減徐州以上的黃河異漲之水；又於黃淮合流的道上筑崔鎮四壩，以分減黃淮異漲之水。其次，筑归仁堤，以防黃河冲入淮河；筑淮河堤，特别是沿洪澤湖筑高家堰，提高淮河水位，以"蓄清刷黃"，使黃水不致倒灌，黃淮併力入海。又疏子嬰溝、溼河，以便分洩淮河異漲之水。

以上就是潘季馴防治黃河的原則和全面的規划。他不但在理論上击敗了当时的反对者——主張分疏的人們，且在实践上証实了他的理論。隆慶6年万恭对於他的原則和功效，有这样的說明："欲令河專而深，莫若束水急而驟……舍堤無別策。前御史潘季馴議开一百里故道，給事中雒遵議筑三百里長堤，人情洶洶，謂堤費且無益，独荷先皇俞允……堤工遂成，河流順軌……今年黃水大發，而三堤竟不敗，河卒無虞。北运無一水阻，南还無一水阻"①。万歷初年，黃淮大决，"横流四溢，連年不治"，經他防治后，"一歲之間，兩河归正，沙刷水深，海口大辟。田廬尽复，流移归業"②。"明史"亦称"連数年河道無大患"③。还有一点应該指出，黃河南下以來，迁徙靡定，朱衡虽曾希望河出自境山与小浮桥之間，但他沒有能够做到，而潘季馴的治河，却把他这个理想实現了。

当然，潘季馴的防治黃河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黃河水害，况且他的重点，放在徐州以下，不是整个黃河，乃至不是黃河的整个下游。他似乎也知道这点，所以他对賈讓的"治河三策"，避不深論，僅諉为时势不同。旣然不能根治黃河水害，当然不能"一劳永逸"，所謂"劳費無已，数逢其害"的事情，也就不易避免，所以潘季馴一再强調修守的重要。但是，在那种社会制度下，在明末那种"人心玩於積習，法制廢於因循"④的情况下，我們也不能对潘季馴有超越歷史条件的要求。河防的强弱原來就是和封建王朝統治的兴衰直接联系着的。例如有清一代，是以"束水攻沙"为防治黃河的指導原則的，康熙、乾隆兩个时期，因封建政权比較穩定，黃河先后就有几十年未致大决。而潘季馴处在明王朝衰落时期，竟能做到"挽狂瀾於旣倒"，所以我們絕不能低估他的貢献。清代的治河者們奉潘季馴的原則和規划为圭臬，不是沒有原因的。

总之，从过去时代的河防史看來，潘季馴的防治黃河，無論就其出發点、还是就其原則來說，都是卓越的。

---

① "明神宗实錄"。
② "河防一覽：河工告成疏"。
③ "明史"，卷84："河渠二：黃河下"。
④ "行水金鑑"，卷33："万曆16年"条。

中國陶磁的制作和發展

傅振倫

一 引言

在中國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我們的祖先就創造了彩陶工藝和黑陶工藝。公元前16世紀至公元前11世紀，商代人民又進一步創造了更精致的青黃釉陶器和白陶。自此以后，逐漸發展、改進，到了公元后3世紀創造了磁器。其后，磁器的制造漸多。随着对外陸海交通的發展，我國磁器开始傳播到东方、南洋和中亞細亞，一直到欧洲，甚至到了非洲，受到了世界人民的热爱和称讚，中國从而博得了"磁國"的光荣称号。不过，在过去長期封建統治之下，尤其是在近百年帝國主义者的殘酷压迫下，磁器工藝得不到充分的發展，因而呈現了衰落趋势。全國解放以來，由於毛主席和中國共產党的正确領導，我國陶磁工藝才有了轉机，獲得了迅速的發展，七年以來，有了光輝的成就。

当全國陶磁会議1955年在北京举行时，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工業部、中華全國手工業生產合作社总社籌备委員会和中國美術家协会，为了配合这个会議，檢閱解放以來陶磁工藝的重大成就，特在故宮博物院保和殿，举办了"全國陶磁展覽会"。其中陈列着來自20多个省、市，40多个地区，2400多件的日用陶磁、美術磁和各种陶磁雕塑品。这些展品都是最近三年來各地陶磁窰厂的优秀出品，合乎实用、經济、美观等要求。这种优越成就，使我們感到無限兴奋。

二 我國陶磁的优良傳統

我國陶器的發明，始於5500年前。黃河流域、華东地区和东北一部分地区發見的彩陶和濱海地区發現較多的精致黑陶，都是有力的証明。"史記：五帝本紀"載："舜陶河濱，作什器於寿丘。……河濱器皆不苦窳。""礼記：曲礼"記載殷人制度說："天子之六工，曰土工，……典制六材。（陶旗之工曰土工）""周礼：考工記"說周代造陶，有陶人（用模子以制造炊飪之器）、旗人之分（用鈞以制造祭器和量器的"庾"）；还說"譽（損伤的东西）、墨（頓伤的东西）、薛（破裂的东西）、暴（僨起或不坚致的东西）不入市"（这是后世磁器忌骨、忌蔑、忌茅，归在脚貨的办法）。孟子又說过："万室之國，一人陶。"这些文献，說明了我國陶業工藝歷史的悠久，制度的嚴密，以及業务的發达。它的制造过程是：練土、造形、美裝、燒窰。磁器的制造过程，更为精進：取土、練泥、鏇匣、修模、洗料、做坯、印坯、旋坯、画坯、蕩釉、滿窰、开窰、彩器、燒爐。在5000多年長期的陶磁制造过程中，各个时期都有典型的优秀作品。

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器形簡朴雄偉，質地坚实，表面研光，圖案生动，顏色鮮明，同时期的黑陶，胎質細膩，內外烏黑，明亮如玻璃。薄者厚度不及一公厘。稜角規整，方圓合度。又有三足、圈足和鏤空的制作。商代發明了釉陶，还有雕塑得很准确、类似銅器上几何花紋的白陶。战國时代有刻画魚、龍、花、鳥的灰色陶器，还有山云、对鳥、双獸的瓦当，也有刮磨暗文的陶器。秦漢以來，有綠、褐、赭等釉的陶器，有弦文、漁獵、人物等圖案，有獸耳、熊足、乐舞等雕飾。墓葬中有塗朱彩繪的明器、瓦俑、模印人物、騎士、禽獸、几何花紋等陶磚、柱礎，有雕鏤飾物的陶器、屋宇、楼閣、井灶。到了唐代，創造了三彩和三彩加藍的三色釉陶

器，顏色鮮妍，圖样典雅。墓葬中的明器、瓦俑、鎮墓獸头、馬駝，造形逼眞，彩繪也很精細。还有攪胎、攪釉、內外紋理融为一体，而又極为自然的陶器。式样繁多的陶枕——如長方、半圓、鉢式、桃式、銀錠、鷄心等形，上面有的印文、画花，也有的刻画鳥獸、花卉、人物等等，一直到了宋代还是大量地生產。这些單色釉和三色釉陶器，現在仍然燒造不絕，通行民間。

江苏省宜兴蜀山鎮，是著名的陶都，它的造陶歷史是很悠久的，相傳陶朱公范蠡就在宜兴蠡墅燒造陶器。宋代仿鈞窑天青蟠桃筆洗是傳世的珍品。明代欧子明用土產的紫砂，摻以磁質，制造各式茶壺，花盆。这类制作，現在还繼續仿造，也有各式用品、文具、鳥獸以及佛道等塑像。廣东仿鈞窑的泥鈞，自明迄今，燒造不絕。云霞異彩，甚为美观。

我國磁器自第3世紀發明以來，各地燒造極盛。百花齐放，丰富多采。

兩漢陶器仿銅器而用綠釉，仿漆器而用褐釉。陶器加了氧化鉄的色釉，在氧化火焰里燒过后呈現黃褐色；經过还原火焰就变成为青色。这种青釉在陶磁上的使用，極为普遍。从兩漢到元代，綿延了1500多年。晉朝的縹磁（青白磁）、唐代的千峰翠色，都屬於这个系統。当时还有黑白等色磁器。邢窑（今河北省內邱）的白磁甌和端溪的石硯，通行全國各地。大邑窑（今四川省大邑）見称於詩人杜甫，他在一首詩里寫道："大邑燒磁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北方的邢窑、南方的越窑（今浙江省紹兴、余姚），代表了全國白磁、青磁兩个系統。陸羽的"茶經"說邢窑类銀、类雪、磁色白而茶色丹；越窑类玉、类冰、磁色青而茶色綠。它們声韵悅耳，可以击甌，成了一种乐器。昌南（即今景德鎮）陶窑、霍窑及饒州窑都是瑩縝如玉。五代后周御窑和吳越的"秘色"器，都是青磁系統。前者"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声如磬"。后者圖案精巧可喜，花叢小鳥、云里飛鶴、水中蛟龍，以及人物仕女，錯綜紛紜，形象万千。当时还有金稜、銀扣等磁器，这种磁器裝飾是以后定窑鑲嵌銅口制作的來歷。

宋代磁器种类很多，有飲食器用、供具、玩好，形式不同。其釉色，有青、白、黑、彩四大系統。青釉磁器，东窑（今河南省陈留）有碧青、油青。汝窑（今河南省臨汝）有天青、卵青、粉青。南北官窑（河南省开封、浙江省杭州）及余杭窑（浙江省余杭）有天青、翠青、粉青、月下白、大綠。龍泉窑及弟窑（即章龍泉窑。兩窑及哥窑都在今浙江省龍泉縣境）有天青、粉青、翠青、葱翠青。丽水窑（浙江省丽水）略似龍泉，有油青、灰青。哥窑有翠青、粉青、淺青、灰青，又有米色。湘湖窑（景德鎮附近）以粉青最好。景德鎮窑有天青、月下白。鈞窑（河南省禹縣）釉色甚多，而以天青为主，稍重則成天藍。其青料中含有銅質，經煅煉后即变成綠、紅紫或玫瑰紫，俗呼窑变。后人利用銅質，为人工的安排，因而造成紅紫的窑变。白釉磁器有吉州、蕭、肅、泗、平定等窑，而以定窑为代表。定窑繼承唐邢窑系統發展而出，質瑩白如粉，輕薄而有光，有瑩白、甜白、牙白等釉。花样复雜，有牡丹、萱草、双魚、飛鳳、孩兒諸种。用刀雕成者曰雕花；以針剔刺而成者曰綉花；用模印成者曰印花。往往鑲有銅口，甚为美观。定窑也有墨色的黑定器，还有金花定器、青花定器；它是重大的創造。黑釉磁器有鈞、定、磁州等窑，而以建安、建陽二窑的兎毫、鷓鴣斑、烏金釉为最有名。彩器有汝州扒村、德州、高平等白釉加紅綠彩器。磁州初造白器，其后有色釉、黑花、青花、雜彩。除了鉄綉花、繪黑花、画花之外，又有雕釉器。黃河南北兩岸有不少的窑厂，都大量制造这类的东西。

明代陶磁工藝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進步。在技術方面，以陶車旋刀代替了以前所用的竹刀旋坯；用吹釉法代替了以前的蘸釉法，都是很大的革新。尤其是景德鎮的陶磁工藝，更有輝煌的成就，成为全國磁器工藝的中心——"磁都"。明代劳动人民繼承已往雕貼、凸雕、剔花、画花、印花等优良技術，龍泉窑、德化窑大大地發展了雕花及堆花磁器，山西霍州、澤州、蒲州、陽城縣等窑又在佛教建筑物上堆彩裝飾花紋的基礎上發展为凸雕三彩器（俗呼为法華器）。景德鎮的磁器工藝更能用种种不同的釉彩代替了雕塑印造的圖案。五彩磁器主要的着色剂是銅、鉄、鈷、錳等金屬鹽类。銅鹽溶和於磁釉中，它呈色的作用是依溶化时的火焰性質而定。在氧化火焰燒成时，則呈綠、青、藍等色。在还原火焰燒成时，則呈紫、紅、黝等色。它的作用很灵敏，所以在燒成的时候，便能顯出种种鮮明的釉色。鉄鹽在氧化火焰燒成时呈現黃色、褐色。若在还原火焰燒成时，則呈現青色。但是因为火焰的变化，其着色作用頗为滯鈍，所以要想燒出鮮明的釉色，很感困难。鈷鹽的着色力極为强大，虽然含量不多，然而所呈現的釉色，却極鮮明。明代劳动人民能够利用这些原理，所以在造磁技術上有了很大的成就。青花磁

器就是用这种鈷鹽的色料繪成的。此外还有多种的創作。如成化斗彩（先在釉下用細綫描好青花圖样，燒成以后，再在釉上就青料鈎画的輪廓，塡以彩色。因为釉上釉下的色料，好像爭妍媲美，所以称为斗彩）、万歷五彩等磁器都有高度的發展，也是很名貴的出品。宣德霽紅、霽藍，正德和嘉靖的回青等一道釉磁器，以及宣德、嘉靖等青花磁器，也都是非常著名的美術工藝品。明代藝人又吸取了已往画花、印花、綉花等技術，对龍鳳、花卉的圖样，加以發揚，一直發展到人物、众獸，一步一步地丰富起來。成化时期創造的"錦灰堆法"的圖案（折枝花菓堆四面的圖案），色調配合的燦絢夺目，此外还有多种圖样，也極活潑自然，生动有力。永乐的錐拱（卽錐花）器、脫胎（純乎見釉，几乎不見胎骨）器，宣德的戧金（金飾）器、鏤空（透雕、雕空）器，嘉靖的捧字（圖样上加以圓圈，中寫文字）器，都是当时新的創作，"發古未有"。至於永乐的压手杯（坦口折腰的盞），宣德各式盞、注、杯、盆、墩，成化雞杯等等特殊作品，花样繁多，更难一一列举了。

清代磁器在前代發展的基礎上，續有提高，也是以景德鎭为造磁的主要地区。

景德鎭在康熙时期以臧窑（臧应选督造的窑器）、郎窑（郎廷極督造的窑器）为最著名。臧窑出品以天青、翠青、碧青、嬌黃、粉黃、吹紅、吹紫、吹綠为最精。鮮紅器淡如豇豆，俗称豇豆紅，是当时特殊出品。它的青花器並不次於宣德、成化。珐瑯彩磁（俗呼古月軒），也創於此时。它的顏色、繪画、款式都仿当时御制銅胎珐瑯彩的做法，顏料也是用西方的上等材料。郎窑以宝石紅、宝石藍、宝石綠最好。又有洒藍（先上白釉一道，又上藍釉一道，再上極薄釉子一道，然后加繪金花、金彩）、霽藍（並不先上白釉，而把顏色和釉水溶合之后，掛磁胎上，其釉很厚）、素三彩（於素燒的胎子之上施以綠、黃、淡紫或茄紫等色）、硬彩（彩色很濃，藍綠堆起，抹紅平淨）等器。当时磁器的裝飾圖案有金銀、漆黑、雜色等地，兼施以人物、山水、花鳥等繪画。有凸花、暗花及雕刻花菓、象生等形。到了雍正时期有碧玉釉；还發明了胭脂水釉。这种窑器胎骨極薄，里釉極白，外釉色紅，陪襯出異常美丽的粉紅色，嬌嫩欲滴。当时又盛造粉彩器（粉彩，一名軟彩，粉質松軟，彩色艷丽清逸，暗淡柔和）。

乾隆时期是封建社会磁器的黃金时代。由唐英監督景德鎭窑务，据他所著的"陶成紀事"所載"仿古採今，宜於大小盤、碗、鍾、碟、瓶、罍、尊、彝等器，歲例貢御"者57項，81种，这也說明了当时磁器的新成就。

乾隆时朱琰著有"陶說"，其中"饒州窑"条載称："邇年以來，……戧金、鏤銀、琢石、髹漆、螺甸、竹木、匏蠡諸作，無不以陶为之。""有陶以來，於茲極盛"。由此可見乾隆时代磁器工藝的發达，为空前所未有。不过，封建主义社会已經到了强弩之末，它所反映在磁器的空前繁荣时期，也为时不久，随着外國資本主义势力的侵入，而日趋沒落了。

三　解放以來我國陶磁的新發展

近百年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國，外而受到帝國主义的侵略压迫，內而受到反动政府的殘酷剝削，廣大人民陷於貧困不堪的境地。一切民族工業都遭受了嚴重的扼殺，磁器工藝也受了極大的摧殘，大部窑戶破產，大批藝人失業。幸而沒有歇業的窑戶，其生產技術也是停滯不前，优良傳統随着中断，奄奄一息，不过苟延殘喘而已。1949年随着全國的解放，中國磁器工業才度过了黑暗的时代，得到恢复和發展，在短短的七年中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解放以來，許多旧有窑厂恢复了生產，新的窑厂也与日俱增。統計現在國营大型窑厂有50多处，私营者150多家。有些工厂还採用了机械或半机械生產。自从政府号召生產競賽、技術革新运动以后，各地窑厂創造了、也推廣了一些先進的工作方法。景德鎭地方國营和公私合营的磁器工厂里的职工和藝人通过政治学習，也提高了技術水平。1952年起实行了生產責任制度，更保証了生產質量，減少了倒窑、廢品等現象，降低了破損率。1953年輕工業部为了提高磁質，改進磁業，派遣了工作組，配合景德鎭藝人，会同中國科学院有关部門在当地展开了研究工作。經久不用的礼林里磁土，經过原料配合研究之后，又恢复了使用，用以代替了价值高昂的和星子高嶺磁土及祁門磁土。也研究了新坯釉的配合和燒造。失傳很久的鈞紅、烏金、茶叶末、鱔魚黃等名貴色釉獲得了恢复和發展。

1953年河北省唐山市召开陶磁先進經驗交流大会，对原料粉碎、成型和燒成等方面的先進經驗，作了初步的总結，重点推廣了“磁球磨法”、“多刮板軋土法”、“控制火焰燒窑法”等先進生產方法，解决了生產中的粉碎力量薄弱、原料供不上制坯需要等关鍵性問題。景德鎮燒磁用茅草者佔23%，用木柴者佔77%，每年需用木柴180万担。福建德化窑燒窑要用570担的木柴。因此制造磁器嚴重地影响了國家护林政策，也影响了建設事業。1954年輕工業部召开了陶磁座談会，大家决定先从景德鎮試办用煤代替木柴。廣东的楓溪、高陂、饒平和湖南醴陵出產的日用磁，改進了生產方法，大大地降低了成本，价廉物美，合乎实用、經济、美观等要求，受到了人民的欢迎。又磁器裝飾所用的金水，过去都用舶來品，漏巵很大，1951年我國也能自己制造了，並且价格比外國貨低一倍，1952年开始大量生產，供給各地造磁的需要，大大地節省了國家外匯的开支。自手工業生產合作社联合总社提出“提高質量、降低成本、展开全面節約”口号以后，第一陶器生產合作社利用廢玻璃摻鉛配釉，已告成功。过去用鉛粉澆釉，100斤僅能澆600套盆。現在改用廢玻璃，能澆盆00套，成品合乎要求，因而降低了成本四分之一。这都是陶磁上重大的創造和成就。

景德鎮的磁器在明代已成了重要國际貿易品，目前它向外推銷的國家，有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民主德國等19个國家。廣东楓溪、高陂、饒平、潭江等地所造磁器，成本很低，不僅推銷國內，还有一半的產品，运銷到香港、南洋一帶。这都是新中國陶磁工藝蓬勃發展的新姿态。

在故宫博物院举行的全國陶磁展覽会是全國規模的現代陶磁工藝的大檢閱。在全部展品中固然不免还有某些缺点，然而通过这一个展覽会也看到了很多新的成就。这次展品來自全國20多个省市，包括以下各地区：北京市。江西省：景德鎮、萍鄉、雩都。河北省：唐山、宣化、峰峰。山西省：浑源、大仁、陽城。遼寧省。陕西省：銅川。甘肃省：山丹、永昌。山东省：淄博。安徽省：界首。江苏省：宜兴。浙江省：温州、紹兴、慈谿、泰順。福建省：德化、長乐。河南省：禹縣、登封。湖北省：漢川、宜昌。湖南省：醴陵、新化、洪江。廣东省：南海石灣、潮州楓溪、大埔高陂、饒平九村。廣西省：宾陽。四川省：重慶、荣昌、峨嵋、乐山、江安、江津、犍为、威远、甘孜、秀山、忠縣。貴州省：兴义、黔西。云南省：建水、龍陵。新疆省：烏魯木齐。

景德鎮自东漢开始陶造，唐有陶、霍二窑、南昌窑，宋有景德、湘湖、湖田等窑，元有樞府，明清有御窑。峰峰自宋代已开始造磁，就是有名的磁州窑。陽城造磁始於宋代。銅川宋有耀窑，燒造至今。淄博陶始自宋代。宜兴陶始自战國，号称陶都，宋时有精品可考，明清时更馳名全世。温州在晋有东瓯窑，紹兴在唐有越窑。德化造磁始於宋代。禹縣为宋以來鈞窑所在。南海自唐已造磁器，潮州則始於南宋。这些造磁名区都有悠久的优良傳統，到今天还燒造不絕。此外还有很多文献無征而現在大量造磁的地方。参加这次展覽的地区虽还不够全面，然而从这里也可看到我國造磁地区的廣濶了。通过这些地方的陶磁出品更說明了祖國陶磁的丰富多采及其成品的优越性。

北京大華窑業公司創办於1940年，解放后採用了半机械的生產設备，用当地磁土，制成旣实用又經济的日用器皿，运銷華北、西北和西南。北京还有琉璃窑造的建筑品和仿造的唐三彩陶駝、馬、人物。磁都景德鎮的出品陈列了1300多件，佔全部展品五分之三。展品中有一道釉、青花、粉彩、古彩和新花器；有日用品、美術磁和磁塑。其高級磁由於老藝人、美術工作者和中國科学院有关部門的合作，失傳很久的鈞紅等釉色都能燒造。在最近一年來，它造成了很多的新品种。如革命領袖、英雄、劳动模范、歷史人物等画像和造像都維妙維肖。已往不健康的磁塑，已經絕迹。湖南省產磁区凡12处，醴陵大量生產的釉下彩繪器，是別具風格的出品。廣东省东部是一个主要產磁区。高陂的碗、茶具，饒平的盤、匙，楓溪的餐具及美術磁，尤为大众所欢迎。饒平磁器胎薄釉潤，魚鳥花卉等圖样也很朴素大方。釉下彩磁一次燒成，省工省料，价廉物美。楓溪鏤空磁塑，表現了出色的制作技術。石灣陶器由於廣州市人民美術社的协助，制造了領袖像及志願軍像，以及中國科学家僧一行、李时珍、爱國詩人屈原、杜甫、李白等塑像，形态簡練生动，能刻划出各个人的性格。由已往塑造佛道像、小品玩具的習尙，轉向日用品和人民需要的新品种，走上了正确的方向。德化雕塑白磁人物像，恰如其分地表現了各种人物的不同形象，也發展了它的优良傳統。峰峰細磁是由磁州窑器演变而出，也發展了它的优良傳統。唐山大量生產的日用磁、磁塑、工業磁、电磁、衛生磁，都是全國聞名的。陕西省陶磁有黑釉，有青花，極富民間色調。湖北省磁坚固耐用，是它的唯

一优点。云南省造磁，全用手工，而便宜、坚实、耐用，釉色朴素，也極可喜。四川省青花陶磁另有一番作風。荣昌燒酒坊（即安富坊）翠青釉日用陶器，价廉式美，也大为人民所喜悅，經过四川省文化局美術工作室和西南美術学院的輔導，更大有提高。甘孜陶器利用細小磁片嵌成梅花圖样，也别具風趣。山西省陶磁中有能耐高温，在爐上煑飯烹茶而不爆炸者，又極合实用。渾源黑釉陶器和砂陶也很朴实耐用。江苏省宜兴紫砂生產小組和工厂，專做藝術陶，茶具也很好。安徽省界首三色釉的陶器，刻划花样，簡勁自然，也是别具風格的制作。

各地民間日用陶磁都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質地虽然有的較粗，加工較少，但都是从群众生活中來的，經过若干年的改進，各有它的实用价值和特点。限於篇幅，不及詳述。

四　我國陶磁工藝今后努力的方向

我國陶磁工藝具有悠久的歷史，优良的傳統，解放七年以來，在中國共產党的正确領導下，已經取得了偉大的成就。今后發展方向如何？也是大家所关心的問題。根据我个人不成熟的意見，以为：

1、陶磁器是人民日用所必需的东西，它的制作必先求实用，又要經济，其次要求美观，造出合乎新时代要求和廣大人民所最喜悅的东西。例如这次展覽会第三陈列櫃中，有一件花苞式青釉磁茶壺，最为大家所推許，其形态、釉色合乎实用、美观等要求。今后陶磁設計，应取法乎此。又如四川在宋代有一种青釉夾磁灯盞，俗呼"省油灯"，每夜省油一半，它的形制見陸游"老学庵筆記"及"齋居紀事"，現在还有流傳。这种东西，可以仿造，向農村推銷。至於耗費时間、人力、財力过多，而不大实用的作品，如永乐脫胎磁、乾隆活环轉心套瓶、景德鎮的現代仿琺瑯彩的美術磁……目前可先不必提倡。康熙弓鞋纖趺仕女圖磁和后世的百子、百蝠、戟磬等圖样的东西，以及刻繪"归去來辞"、"蘭亭集序"、"聖主得賢臣頌"……等詩文詞的磁器，也沒有仿造的必要。

2、各地制造陶磁，应就地取材，發揮其优良傳統（如華北各地的黑磁、德化白磁、曲陽白磁、黃河兩岸黑花雕釉磁、景德鎮五彩磁……），但不必競造同一类型的东西。

3、陶磁工藝是造型、雕塑、繪画等綜合的实用美術品，各窰厂应充分和当地美術工作部門合作，以求提高。

4、久已失傳的陶磁制作、釉色，可由中國科学院有关部門就博物館藏品，分析化驗研究，同时，还須向老藝人学習。求得結果后，再進一步研究省工省料的仿造办法，進而逐步改進，以为將來恢复和發展古代陶磁的参考。

我們新中國有充分的条件來創造实用、經济、美观三者兼备的陶磁器，希望陶磁工作者勿自滿於現有的成就，也不可自暴自棄，而当有信心地發揮劳动人民集体的聰明智慧和潛在力量，來完成这一光荣任务。

（1955年12月寫）

形式邏輯与辯証法

周谷城

一

形式邏輯与形而上学不同。形而上学对事物有所主張；形式邏輯則不然，对任何事物都沒有主張。正因形式邏輯对事物沒有主張，它便可以为形而上学服务。例如形而上学說"凡人皆有死"，形式邏輯对此因無主張，正可依此演出一个很正确的論式，如："凡人皆有死"，"張三是人"，"故張三亦必有死"。又如形而上学說"凡金屬是不能溶解的"，这当然不对；但形式邏輯依此，也可以演出一个很正确的論式來，如："凡金屬是不能溶解的"，"金子是金屬"，"故金子不能溶解"。这便是形式邏輯替不正确的主張服务了。主張有对的，有不对的，依主張所演出的論式，其自身却可以都正确。主張的对与不对，要看它与事实符合不符合才能定；如"金屬不能溶解"的主張与事实符合，便当算对，否則为不对。論式的正确与否，却只須看它自身前后矛盾不矛盾就可以定。如前面兩个論式的自身，前后都不矛盾："張三有死"与"凡人皆有死"不矛盾，"金子不能溶解"与"凡金屬不能溶解"不矛盾，故兩个論式的自身都是很正确的。主張有对有不对，論式却只許正确，不許不正确。形式邏輯如果只能替正确的主張服务，不能替不正确的主張服务，那它应早与形而上学絕緣了。而事实却不然，可見它能为錯誤的主張服务。

我們反对形而上学，但不一定要反对形式邏輯。正如我們击潰了敌人时，繳獲的槍械中如还有我們可以用得着的，我們大可以留用，不必一律予以銷燬。形式邏輯可以为形而上学服务；但落到我們手里，也可以为我們服务。我們說"凡存在的事物是發展变化的"。我們运用形式邏輯，依这主張，可以演出一个很正确的論式來，如："凡存在的事物是發展变化的"，"中國社会是存在的事物"，"故中國社会是發展变化的"。又如我們說"社会發展是不一定有階段可言的"，这当然不对。但我們运用形式邏輯，依这主張，也可以演出一个很正确的論式來，如："社会發展是不一定有階段可言的"，"中國社会的發展是一种社会發展"，"故中國社会的發展是不一定有階段可言的"。这里的兩个論式都是很正确的；但兩个論式所代表的兩种主張，却有对有不对。主張已不是形而上学的了，也有对与不对之分。我們运用形式邏輯，依兩种不同的主張演出兩个論式，也都可以正确。这可見形式邏輯在我們手里与在形而上学手里都能服务；可見它做我們的工具，为我們服务，与做形而上学的工具，为形而上学服务，都是可能的。

形式邏輯能为我們服务，是一事；是否因此就要把它与辯証法並列起來，又是一事。有人說："辯証法从發展、运动、联系和相互作用來考察現实現象，这並不排除有考察現实現象底最簡單关系之必要，並不排除有把它們看作特定的一段时間內和特定的具体条件下是穩固的、确定的、分离的現象之必要。……在整个現实中進行着的發展、变化、对立底斗爭，並不排斥現象、对象或事物在特定的一段时間內的某种相对的穩定。任何事物都是变化着的，但是在某一段时間內这些变化是不大的、不顯著的，並且对於实踐的目的是無关緊要的。……只要在特定的一段时間內一个对象保持着相对的不变，那末在考察这个对象时可以充分地应用思維底四个規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这种說法的主要目的在給形式邏輯一个应有的地位，我們完全贊成。不过我們如不了解这个主要目的之所在，而認为这是画分形式邏輯与辯証法之界限的，其結果反会使我們誤認形式邏輯与辯証法

之間沒有嚴格的界限，而認兩者为同一系列的学問，从而看不清形式邏輯与辯証法的正确关系。

这里我們且就可能有的一些困难略为談談：第一，在某些特定时間內相对穩定的东西可用形式邏輯來处理；然則不在这些特定时間內遇到了很不穩定的东西就不可以用形式邏輯來处理嗎？若果如是，則形式邏輯的用处就太少了。第二，那些变化是不大的、不顯著的，对於实踐的目的是無关緊要的；那些变化是大的、顯著的，对於实踐的目的是关緊要的；兩者之間，很难画出一定的界限。因之那里用辯証法，那里用形式邏輯，都不易确定。第三，即使变化之大小的界限可分；然小的变化，竟小到对实踐的目的無关緊要了，那末辯証法与形式邏輯对於这种小的变化根本都不必要，而成为可有可無的东西。第四，变化之大小的界限虽可分清，然大小兩种变化都是变化；形式邏輯处理的是变化，辯証法处理的也是变化；兩者的对象相同，試問彼此之間还有什么根本的区别。我們反对形而上学，連形而上学所用过的形式邏輯一併反对，不可。我們尊重形式邏輯，把形式邏輯搬到与辯証法同一系列，更不可。

形式邏輯旣不可与形而上学混同，又不可与辯証法並列，然則究竟是那一类的东西呢？这里我們可以一言蔽之曰是帮助思維的东西。它与文法学修辞学相近，但不可与辯証法並列。辯証法要了解事物；形式邏輯則根据对事物已有的了解，依思維形式作各种推論，使了解更正确。了解事物，須与事物作斗爭，須有感覚經驗等；根据已有的了解作推論，則不与事物發生直接关系也可以办到。講形式邏輯的教师，也許列举些最普通最常見的东西为例，說明形式邏輯的規定；但目的僅止於此，那些最普通最常見的东西却不一定是他研究出來的。辯証法則不然：自始就要求我們对实际事物作斗爭，要我們了解对象。列寧有言曰："形式邏輯……以最普通的、眼睛常見的东西为指導，採用形式的定义，並以此为限。……辯証邏輯要求我們更進一步。要眞正地認識对象，……"①这区别是最基本的。由此区别，我們不但可以曉得形式邏輯与辯証法的不同，而且曉得兩者相互的关系：辯証法要我們往前進，要眞正了解一个对象；形式邏輯要我們根据已有的了解，作正确的推論。了解对象，必求"了解"与"对象"之間的符合；据已有的了解作推論，則求了解本身前后不相矛盾。辯証法指揮我們獲得，形式邏輯則帮助我們進行推論。前者可以創獲关於宇宙的新知，后者可以糾正关於認論的前后矛盾。創新与正誤，都是認識眞理所不可少的。学会了辯証法，知道一些东西，也許思考不精密；学会了形式邏輯，头腦很清楚，也許除了形式邏輯以外，一無所知。为求有所知，必須依照辯証法向实际中摸索；为求所知的东西內部很調和，前后不矛盾，則必須运用形式邏輯，作推論工夫。照这样說來，辯証法是主，形式邏輯是从；主从虽有区别，却时刻不能分离。講到这里，有一問題須随着解答。前面我們說过，学会了形式邏輯的人，也許除了形式邏輯以外，一無所知。学会了辯証法的人，不也可能除了辯証法以外，一無所知嗎？不錯，这是可能的；專攻辯証法，而不拿它与任何实际相結合，結果除辯証法的条文外，可能一無所知。因此辯証法虽是形式邏輯的主人；但离开了实踐，不与实际結合，也不能發揮作用。要救此弊，只有訴諸实踐。毛主席在"实踐論"中說："無論何人要認識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於（实踐於）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沒有法子解决的。"②

二

形式邏輯不能与形而上学混同，也不能与辯証法並列，而是与文法学修辞学相近似的学問，旣如上述。現在我們且進而研究辯証法与形式邏輯的基本差異。这可先从兩者所依据的法則或規律講。辯証法的法則虽是指導我們認識事物的，但这些法則都存於事物之自身，即都存於自然界，都是事物自身存在、發展、变化之法則。斯大林謂辯証法把自然看作有內在联系的統一整体，把自然狀态看作不断發展的狀态，把發展过程看作由量变到質变的过程，把对立的斗爭看作由量变到質变这一过程的內容。这固然是辯証法的看法；但这"看法"可以使用的理由就是因为事物自身之存在、發展、变化的法則是与这看法符合的。先有事物自身之存在、發展、变化的法則；这些法則反映出來，掌握在我

① 列寧："再論职工会、目前形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錯誤"，人民出版社1955年3月版，第76頁。

② "毛澤东选集"，第一卷，第275頁。

們的手里，就成了我們的工具，可以指導我們認識事物，成为我們認識事物的法則。認識的法則是事物自身存在、發展、变化的法則之反映。沒有事物自身的法則，便不能有我們掌握的法則。由事物自身的，翻轉为我們掌握的；由客观实在的，翻轉为主观运用的，於是我們有作工具用的辯証法。故辯証法所依据的諸法則，自始就是屬於事物自身的。

形式邏輯則不然，它的法則只是規定推論过程的，对於事物自身並沒有增加什么說明或解釋。推論式的規則說："每一論式中，只能有三个判断和三个名詞，不能多也不能少"，"每一論式中的中名詞，在兩个前提中，至少必須周延一次"，"名詞在結論中的外延，不得大於在前提中的外延"，"由兩个特称前提，不能得結論；前提有一为特称，則結論也必是特称的"。凡此等等，只在作推論时有用；不作推論时，这些都用不着。例如"凡人皆有死"，"張三是人"，"故張三亦必有死"的論式中有三个判断，不多也不少；有三个名詞，即"人"、"張三"、"有死"等，不多也不少。这論式中的中名詞是"人"，它位於"張三"与"有死"之間作了一次媒介，把"張三"与"有死"的关系給說明了；它在第一个前提，即大前提"凡人皆有死"中周延了一次，意即这一次它代表了人类全体。結論"張三亦必有死"中"有死"一名詞的外延並不大於第一前提中同一名詞的外延。这論式的兩个前提中有一个是全称，並非兩个都为特称，故可以得結論；又第二前提"張三是人"为独称，范圍較特称虽更小（独称有时亦算全称）但結論亦为独称，范圍並不大於独称的第二前提。全部規則，这論式都能一一符合，故这論式是一个完全正确的論式。論式之能够正确，就靠有这些規則。但这些規則只是規定推論过程的，即列寧所謂形式的規定，对於事物自身却沒有增加什么說明或解釋。虽然，这些規則的依据实际上有一条公理，即全量大於部分的公理，似为屬於事物自身的。但仔細檢查起來，这条公理只是推論規則的依据，对於事物自身之存在、發展、变化，依然沒有什么說明或解釋。

此外更有四条著名的規律，是形式邏輯学者所最重視的，即所謂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是也。这四条規律中，除充足理由律外，其余三者可归併为一条，即同一律是也。同一律謂凡物必同一於其自身，如"人就是人"即同一律的表現，因为"人"与"人"是同一的；"人非非人"，即矛盾律的表現，因为"人"与"非人"是矛盾的；"人不能同时是人又非人"，即排中律的表現，因为"人"与"非人"既相互矛盾了，不能同时又互相一致。矛盾律实即同一律的反面，排中律实即同一律与矛盾律的結合。我們研究时，只研究同一律可也。同一律不是事物自身存在、發展、变化之法則。恩格斯有言曰："但是甚至在無机自然界中，同一性本身在現实中也是不存在的。每一物体不断地受到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作用，这些作用經常在改变它，修改它的同一性。"①沒有眞正的同一，便無所謂同一律了。

不过同一律虽不屬於事物自身，但在形式邏輯中却有它的地位。每一論式中的判断，都要依据同一律或矛盾律。例如"凡人皆有死"的一个判断，便是依据同一律而作成的；"凡人非不死"的一个判断，便是依矛盾律而作成的。判断所代表的事物虽时时变化，人、有死之物、不死之物虽时时变化；但在"凡人皆有死"的判断中，人与有死之物总是同一的，或不矛盾的；在"凡人非不死"的一个判断中，人与不死之物总是矛盾的，或不相一致的。判断是論式的構成部分；判断既然要依据同一律或同一律的反面矛盾律，那末論式自然是依据同一律或同一律的反面矛盾律而構成的。自然界的事物中儘管無同一律可言，但关於事物之認識的判断及論式却非有同一律不可。事物自身儘可以是变化的，但推論的方式却只能在某时限內不变。以"同一的"推論"不同一"，以"暫时不变的"推論"經常变化的"，以形式邏輯的符号推論辯証認識的所得：这等关系的本身也可以說是"辯証的"，亦即形式邏輯与辯証法的正确关系。形式邏輯的本身，自古至今，变化並不甚大；然而自古至今，变化万端的事物，都靠它來推論。这一点我們且留到后面再談；我們在这里，只要明白下之一义即得：同一律虽然存在，却不是事物自身存在、發展、变化的法則；只是推論式中構成判断之依据而已，只是在推論中对一个前提不任意变更而已。

同一律僅为推論式中構成判断之依据，固如上述，充足理由律，則又与此不同；它虽是正确的認識所必需，却非形式邏輯所眞不可少。形式邏輯中的每一个推論，虽有一个大前提作为推論的依据；但这样的依据，並不一定是充足的理由，有时只是一种假定的理由。大前提一出，形式邏輯便可据以

① 恩格斯："自然辯証法"，人民出版社版，第177頁。

为推。推論的錯与不錯，当然是要注意的。但錯与不錯，只問前提与結論之間有無矛盾，初不必問大前提本身有無充足理由。要檢討大前提成立的过程，要問它有無充足理由，是实踐的事，是向自然界摸索的事，是与自然事物作斗爭的事。实踐、摸索、斗爭的結果，可能獲得一种理由很充足的認識，或与事物眞相很接近的認識。但形式邏輯中的推論，却不一定注意实踐工夫；它的任务偏重依据大前提來作推論，却不追問大前提是怎样成立的。故充足理由律虽是正确的認識所必需；沒有充足的理由，即不能有正确的認識；然在形式邏輯的推論中，却並不一定被重視。假如每次推論，都要尋出充足理由，則形式邏輯將与其他科学沒有区別，或將其他各种不同的科学一一包办起來。例如天文学、地質学、物理学、心理学等，都是要尋找充足的理由，建立知識系統的。假如形式邏輯每作一次推論，即尋找一次充足理由，則它的任务必与其他科学相同，而失去形式邏輯的品質。我們尊重各种科学，却不必把形式邏輯挤入各科之中；形式邏輯独立成科，亦决不至降低其固有的价值。各科要从事物中尋找充足理由以为認識事物的憑据；形式邏輯則只須有各科現成的認識，便可据以为推。認識的眞不眞，是各科的事；推論的錯不錯，是形式邏輯的事。但各科在進行研究的时候，在任何求眞的过程之中，却离不开形式邏輯。任何科学家在進行研究时，或求眞过程中，必須一面問自己所知的与客观实在符合不符合，另一面問所知的內部前后矛盾不矛盾。

綜括看來，充足理由律虽为正确的認識所不可少，然未必为形式邏輯所必需；至於眞正的同一性虽在自然界中看不出來，然在形式邏輯之推論中，确有構成判断所依据之同一律。至於規定推論过程之諸种規則，是形式邏輯所独有的，則更是很顯明的事。这正与其他科学各有其自身应用的規則一样。各科自己的規則，都是各科的对象决定的；形式邏輯的对象是思維过程，是推論方式，故它有其一套規則，有其一套从無数經驗中提煉出來的規則。

三

从辯証法与形式邏輯所依据的法則或規律看，兩者的基本差異，略如上云。現在再从形式邏輯的工具性上着眼，看它有一些什么功用。形式邏輯是工具，是与文法学、修辞学相近的学問，前面已經講过。它的任务重在推論已有的認識或了解。人类对於事物的認識或了解，是長期实踐的結果；这結果可作形式邏輯推論的根据。例如我們說：金是金屬，金可溶解；銀是金屬，銀可溶解；銅是金屬，銅可溶解；鉄是金屬，鉄可溶解；……是金屬，……可溶解：故凡金屬都可溶解。这是形式邏輯中的归納推論式：由金、銀、銅、鉄……之可溶解，推論到凡金屬都可溶解。金、銀、銅、鉄等之是否眞可溶解，並非形式邏輯所能决定，而是長期实踐所决定的。人类与自然界斗爭，不知經过了多少年月，得到了一种近於眞相的了解或認識；形式邏輯可用归納推論式使已有的認識更为擴大。从这一例，可知形式邏輯是实踐的工具。以"凡金屬都可溶解"为大前提，又可得出一个演繹推論式，如："凡金屬都可溶解"，"錫为金屬"，"故錫亦必可溶解"。这个論式中，錫是否眞为金屬，也非形式邏輯所能决定，也是長期实踐所决定的。但一經决定了，形式邏輯便可据以为推，使已有的認識更为具体。从这一例，又可知形式邏輯是实踐的工具。除归納推論式、演繹推論式外，形式邏輯中更有所謂类比推論式者，如："錫是金屬"，"錫在溶爐中由固体化为液体的現象与其他金屬在溶爐中所起的变化完全相同"，"故知錫亦可溶解"。这論式中，錫在溶爐中所起的变化是否与其他金屬所起的变化相同，也非形式邏輯所能决定，也是長期实踐所决定的。但一經决定了，形式邏輯便可据以为推，从已知認識未知。由这一例，又可知形式邏輯是实踐的工具。

这工具究竟有什么用呢？分別說來，有很多用处。它能把已有的知識由隱藏的地位推到顯著的地位。例如"凡金屬都可傳热"的一个判断，如已确定成为知識，当是任何金屬都已包括在內的知識。不过包括在內的若不予一一揭出，便只是隱藏的，不是顯著的。我們运用演繹推論一一給揭出，謂金、銀、銅、鉄、錫等都是可以傳热的，那便是把隱藏的知識推到顯著的地位。由隱推到顯，使認識更明确，这是形式邏輯的用处。形式邏輯又能把个別的知識归併为整体的。例如"金是金屬，金可傳热"的判断，如已确定成为知識，究竟只是个別的知識；又如"銀是金屬，銀可傳热"的判断，如已确定成为知識，也只是个別的知識；他如銅、鉄、錫等也都

一一被認識了，是可傳热的，但仍都是个别的知識。我們运用归納推論，可得整体；謂"凡金屬都可傳热"，那便是整体的知識。知識固然要明确，同时也該很完整。演繹推論把隱藏的知識轉成明确的，归納推論把个别的知識轉成整体的。至於类比推論，則更能从个别事物之已知的相同条件推論未知的現象或因素或作用等。例如金是能傳热的；銀是否能傳热，不得而知；但我們拿銀与金一比，發現銀在溶爐中所起的变化，与金所起的变化相同，此外还有种种相同的条件，因知銀亦能傳热。这竟是由已知推到未知了，不僅推論已有的知識前后矛盾与否而已，当然更是形式邏輯的功用。

形式邏輯固然能把已有的知識由隱推到顯，由零推到整，或更憑已知的条件推論未知的現象或因素或作用等；但万一已有的知識根本就是錯誤的，而形式邏輯却仍依据它作出正确的推論，那不成了帮助錯誤嗎？誠然如此，形式邏輯能依錯誤的知識作正确的推論，意即把錯誤如量推論出來。在形而上学手里，形式邏輯几乎經常据錯誤的認識以为推。但这不是形式邏輯的缺点，这仍是它的功用。就知識的擴充進展說起來，正确的知識应該由隱推到顯，使我們对它本身的認識更明确；同时，錯誤的知識也应該由隱推到顯，使我們对它本身的認識更明确。正确的知識之敌人，不僅只是錯誤的知識，而且是錯誤的知識之隱藏。把錯誤的知識隱藏起來，使是非不明，那是知識擴充、進展的大敌。我們革命，要分清敌友；我們求知識，要分清眞伪，要分清何者为眞的正确的知識，何者为假的錯誤的知識。对敌人要認得清楚，才好推進革命；对錯誤的知識要認得清楚，才好謀正确的知識之進展与擴充。正确的知識是从錯誤的知識中斗爭出來的；形式邏輯能把錯誤的知識由隱推到顯，正好發揮了它的工具性，表現了它应有的功用。

上述这些功用是很有价值的，是形式邏輯所以能存在的理由。英美資產階級学者不懂得这个道理，他們伪裝進步，反对形式邏輯。英國失勒（F.C.S. Schiller）著形式邏輯一書，專門批評形式邏輯，謂形式邏輯不能指導实际生活，不能解决实际問題。美國杜威（John Dewy）著思維術及实驗邏輯論叢等，从正面說明自己的主張，謂实驗邏輯可代形式邏輯。其实形式邏輯，並不因他們的批評而失去价值；他們所謂实驗邏輯，更根本不成其为邏輯，而只是一种力謀迁就資本主义社会的生活術。我們討論形式邏輯，与他們的批評截然不同：我們要揭出它的工具性，明了它的应有功用，把它从形而上学手里解放出來，使它能为辯証法服务。辯証法給我們以正确的世界观，謂自然界的事物自身有其存在、發展、变化的法則；这些法則反映出來，成为我們的武器，指導我們能更正确的認識事物。我們对事物獲得了正确認識，形式邏輯能帮助我們作正确的推論。

正确的認識有了正确的推論，前后不矛盾了，便能很好的为人民服务，很好的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否則我們在实踐中依辯証法的指示所獲得的正确認識，藏在各人的腦子里，前后矛盾，便不能發揮教育效用。我們要在实踐中，拿形式邏輯为辯証法服务；这样服务好了，便能發揮教育效用，進而为建設工作直接或間接服务：动員大家为建設社会主义而努力。

本　刊　啓　事

二月份起，各地邮局开始收訂本刊第二季度訂戶，請讀者及时向当地邮局办理預訂或續訂手續。

动　　态

目前我國地理学界有关經济地理学基本問題的討論

在我國，經济地理学是最年輕的科学之一，特别是馬克思主义經济地理学說，只是在解放后才在我國地理学界佔据統治地位，而且到現在，資產階級地理学說的影响还沒有肅清，因此，有些經济地理学的基本問題，特别是关於經济地理学的对象問題，更具体一点說，是經济地理学的特性問題，經济地理学的确切定义問題，經济地理学与其他科学、首先是与政治經济学、自然地理学的关系問題，存在許多分歧的意見。嚴肅地展开爭論，澄清一切混乱思想和糊塗观念，是推动經济地理学進一步發展的必要条件，也是改造經济地理工作者思想的重要步驟之一。最近地理学界展开的討論是有其積極意义的。

这个討論，虽然於1955年才正式开展，但实际上所爭論的問題是存在已久的。早在1950年，在孙敬之等編"經济地理学"的第一講中，就提出地理学是包括自然地理学、經济地理学、政治地理学的一种綜合性科学，其中自然地理是地理学的基礎，經济地理学是地理学的核心，並給地理学規定了三个屬性：（1）地域性或区域性，（2）綜合性，（3）概括性。后來又改为地域性(綜合性)、概括性（全面性）、时代性（社会性）。（"地理学論文集"，新潮書店版，第6頁）

到1953年，在中國地理学会第一屆全國代表大会的討論会上，有人对於上文的論点，又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正，指出地理学的特性是"（1）研究作为社会物質生活条件的地理环境，（2）它的地方性（区域性）和（3）它的全面性"（見1953年2月11日"光明日报"）。在这同时，又有人給經济地理学規定了一个新的定义：是"研究現代各國各地区社会生產力配置的科学"（同上）。其目的是要使經济地理学与政治經济学分家，而成为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同时使經济地理学的任务更明确。其論点为：（1）經济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有共同的屬性，因而二者应該統一在一門独立的地理学中。（2）把經济地理学的对象局限在生產力配置的范圍內，而生產力是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样就給經济地理学与經济科学分家而和自然地理学合併提供了另一个論据。在会后，同意这論点的人，又提出了一些补充的理由，如：經济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的研究，都是为了改造和利用自然，为經济建設服务，二者的任务是共同的；二者都需要利用地圖，進行实地調查，工作方法也是相同的；地理学会、地理系中，都是既包括經济地理学又包括自然地理学的。因此，經济地理学应与自然地理学綜合成为一門独立的科学。

長期以來，对於上述論点，也有許多人不同意，但沒有及时展开群众性的爭論。一直到1955年，在"教学与研究"的5月号上，才發表了胡兆量的"經济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特性及其相互关系的商榷"（以下簡称胡文）一文，对以上論点系統地提出了不同的意見。胡文主要論点是：

（1）經济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二者是兩門独立的科学，分别屬於兩个不同的科学体系，一屬於社会科学，一屬於自然科学。

（2）区域性虽是經济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的共同屬性，但經济地理区域和自然地理区域是按照兩个不同的运动規律演化而成的，兩种区域有着本質上的不同，因而不能認为这兩門科学都具有区域性就可以綜合成为一个独立的地理学。

（3）为了实际工作的需要，經济地理学家可以而且必須与自然地理学家密切合作，或把这兩門科学放在同一个組織系統中，但这只是为了需要，而不能作为科学分类的依据。科学分类，应当是按照物質运动規律的本質屬性來進行的。

（4）"綜合性地理学論"者，对各門地理科学的相互关系的理解也是錯誤的。既然生產配置規律產生的基礎是特定的生產关系，而不是地理环境，那末研究自然环境的自然地理学怎么能成为研究生產配置的經济地理学的基礎？而屬於上層建筑范疇的政治地理問題，其基礎也是生產关系，顯然自然地理学也不能成为政治地理学的基礎。認为自然地

理是地理学的基礎，在本質上是和地理环境决定論、地緣政治学沒有什么区别的。另一方面，經济地理学也不能成为自然地理学的核心，因为作为自然地理学核心的，应当是自然环境运动規律。

（5）生產力的地理分佈，始終是在一定的生產关系下來進行的，脫离生產关系，單純地研究生產力配置，是無法找出正确的規律性的，因而把經济地理学的定义，局限为"研究各國各地区社会生產力配置的科学"，也是不恰当的。

在胡文發表后，"教学与研究"7月号又發表了孙敬之的"論綜合性地理学与統一地理学"（以下簡称孙文）一文，該文肯定綜合性地理学的存在，並且是一門独立的科学，列举了"禹貢""太平寰宇記"等著作为例，試圖从中國的地理学史論証綜合性地理学是古已有之的。同时分析了綜合性地理学產生的客观必要性（社会生活与生產的需要），並再一次強調区域性"給予綜合性地理学以'統一'二种不同性質的科学的可能"。該文也進一步分析了統一地理学与綜合性地理学的特点，說明二者有本質上的不同。还強調了区域性是構成綜合性地理学的基本因素，但这个論点在文中未加以具体分析。

"地理学报"1955年9月号發表了鮮肯威的"为反对地理学領域内的取消主义傾向而斗爭"（以下簡称鮮文）一文，該文作者虽然沒有明确提出綜合性地理学的問題，但实际上是完全同意"綜合性地理学論"者的主張的。鮮文第一个主要論点，是肯定在自然地理学、經济地理学之上，有一門地理学，它是"一門完整的科学体系"。其論据是：（1）引用苏联格拉西莫夫"苏联地理学及其發展現階段的任务"报告中的論点；（2）認为地理学一开始就是旣研究自然現象又研究社会現象；（3）生產上的需要，使得經济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結合成为一門完整的科学；（4）从对象來看，二者並不是彼此孤立地進行研究；（5）以心理学、数学、哲学、馬克思主义等科学为例，說明旣研究社会現象又研究自然現象的地理学是存在的。

鮮文第二个主要論点是，認为經济地理学的对象，不是研究生產配置，而是"从生產力与生產关系的相互作用方面研究生產力的分佈"。理由是：（1）生產力与生產关系虽然是社会生產不可分割的兩方面，但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二者是可以而且必需分别加以考慮的。旣然政治經济学可以是研究生產关系的科学，为什么經济地理学不可以抽掉生產关系，單純研究生產力配置？（2）生產关系虽然决定生產力的地区分佈，但不一定要把它拉進研究的对象來，湊成生產配置。如果拉進來，就会混淆了經济地理学与政治經济学的对象。

繼鮮文之后，"教学与研究"1956年1月号發表了祝卓的"經济地理学几个基本問題的商榷"一文，对孙文和鮮文的論点，系統地提出了不同的意見。該文首先在經济地理学的定义上，肯定了是"研究生產（理解为生產力与生產关系的統一）的地理分佈，各國、各地区生產發展的条件和特点"的提法，对其他几种提法，分别提出了否定的意見；着重反駁了不要生產关系的"生產力分佈論"；也反駁了"綜合性地理学論"者的各种論据；同时指出"綜合性地理学論"者实际上是和統一地理学沒有什么本質上的差别。

爭論到此，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1）經济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是兩門独立的科学，而又是有密切联系的科学，在这一点上，認識基本一致。但对这种联系的理解，还存在很大的分歧，这分歧表現在經济地理学与政治經济学、自然地理学的关系上。一种意見認为經济地理学应与經济科学分家与自然地理学結合成为"綜合性地理学"或"一門完整的独立的科学体系"。坚持这种意見的人，現在主要的依据是：（甲）地理学一开始就是旣研究自然現象又研究社会現象的科学，（乙）这兩門科学共同具有区域性，以及任务和工作方法的共同性。

与此相反的是認为这些論据，都不能成为二者結合成为綜合性地理学或一門完整的科学体系的依据，經济地理学应該是屬於經济科学，而不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虽然在实际工作中，經济地理学者与自然地理学者应該密切結合，但按馬克思主义科学分类原則來看，二者应嚴格地划清界限。"綜合性地理学論"者，旣承認在科学分类上，經济地理学是社会科学，而又主張从社会科学中分裂出來，与屬於自然科学的自然地理学結合成为一門独立的科学，这在邏輯上是自相矛盾的。

（2）經济地理学的定义問題，有几种不同的提法：第一种認为是"研究生產的地理分佈，各國、各地区生產發展的条件与特点"；第二种是"研究現代各國各地区社会生產力配置的科学"或者是"从生產力与生產关系的相互作用方面研究生產力的分佈"，第三种是"研究世界及各國各地区生產条件、生產配置和区域特点"。第一种提法，是苏联及我國絕大多数人所同意的，但对这个定义的理解和运

用，也还存在不少問題。如：經济地理学所研究的生產發展特点具体是那些方面？怎样研究生產方式、自然条件、人口这些生產發展的条件，才能克服庸俗社会学的观点和自然地理学搬家的缺点？都还是意見分歧的。

（3）和对象問題联系的任务問題，"綜合性地理学論"者極力主張經济地理学的任务是改造和利用自然，归結成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这样來給經济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合併提供論据。反对这个論点的，則認为經济地理学的特殊任务，是有計划地合理地配置生產，虽然在合理配置生產时，也必須考慮到自然环境的利用与改造問題，但並不僅是考慮这一点，同时还須考慮到劳动資源、歷史特点及其他生產發展条件的利用。

上述問題，都还有待於進一步深入的討論。

（刘再兴）

國际地理学座談会在印度阿里加回教徒大学举行

由印度阿里加回教徒大学組織的國际地理学座談会，於1月9日至17日在阿里加回教徒大学斯特萊奇大廳举行。出席这次座談会的有大批印度教师、研究工作者和來自17个國家的54位外國代表。

座談会由印度天然資源和科学研究部部長馬拉維亞致开幕詞。他談到現在正在印度進行的研究各方面的地理問題的活动，並且表示希望印度地理学家將从其他國家这門科学中取得的進展吸取充分的教益。当他談到印度和俄國的地理学家共同發起了一項研究印度的土壤的計划时，他盛讚苏联在研究經济地理学方面的發展，还讚揚了苏联地理学家在改進農業方面所獲得的光輝成就。阿里加回教徒大学副校長宰克尔·侯賽尼博士向外國的代表們表示热烈地欢迎，他說这次座談会是在國际合作的發展中的重要的里程碑。來自各國的代表們，也都表示欢迎举行这样的座談会，苏联的莫·普·格拉西莫夫教授，中國的謝邦定等，还在会上作了發言。

在举行座談会的同时，还举办了地理学展覽会。

1月11日，苏联代表团团長格拉西莫夫教授在座談会上發言說：苏联地理学家最近同苏联科学院合作進行了一系列的探險工作，以探索經过北極圈前往亞洲的新的海洋航路。他还談到了苏联地理学家在提高生產率方面所起的作用。

1月13日中國代表团团員孙敬之教授在会上作了关於"食物來源与人口增長"的报告。孙敬之在报告中概述世界粮食供应狀况和它同人口增長的关系以后，駁斥了馬尔薩斯所說的关於人口生殖速度超过了食物生產速度的說法。他說：千百万人民遭受貧困和飢饉这种社会弊病是由於劳动人民所生產出來的东西不能得到合理地分配，而是被少数人以地租、賦稅、高利貸和不等价交換等方式掠夺去了。他指出，殖民主义者在各处進行非法的掠夺和侵略，加重了殖民地人民的貧苦和災难。与此相对照，孙敬之列举了中國現在实行了"耕者有其田"以后的歷史發展事实。他說：虽然人口增加了，粮食供应还是得到了保証。他列举了新中國所採取的一些步驟，其中包括土地改革、農業合作化运动、水土保持、防治洪水和旱災、改進農業技術。孙敬之还指出中國進一步增產的廣大可能性。他說：根据中國科学家的估計，12年后，每年的谷物產量大約將达5億公噸。孙敬之說：中國增加生產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道路，就是扫除社会的障碍以后，全國人民团結一致，向大自然進軍的道路。

此外，出席座談会的印度、苏联、保加利亞、埃及、錫蘭和巴基斯坦的代表們，也都作了發言。

座談会於17日閉幕。閉幕会議由埃及的胡齐亞因教授主持。他感謝阿里加回教徒大学組織这次座談会，並且希望每年举行这样的座談会來討論共同的問題。

科学出版社出版

管子集校　上册　郭沫若　聞一多　許維遹撰

管子是研究中國古代的重要資料，但原書文字古奥，錯字錯句和难字难句很多，难以理解，須經整理，才便於閱讀。此書是把唐代以來的整理成績作一总結性的考証，为今后学術界進一步研究管子奠定了基礎。

本書篇首有郭沫若氏撰寫的叙錄一文，叙述管子板本甚詳，把刘績补注定为遂人著作，經过多次翻刻的，这是一創造性的見解。

全書逐篇以疑难字句为綱，歷代各家校釋为目。撰者郭沫若、聞一多、許維遹三氏时有案語，加以考証論断，有很多新的解釋。郭沫若氏把"幼宫圖"考証复原为"玄宫圖"，是極有意义的收穫。

全書分上、下二册，上册內容包括撰者郭沫若的叙錄、管子集校所据宋明校本、管子集校引用校釋書目提要和管子集校牧民篇第一至侈靡篇第三十五。（即出·滬）

輝縣發掘报告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編著

1950至1952年，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曾在輝縣境內進行考古發掘工作，有了許多發現和收穫。發掘工作分若干地区進行：1.在琉璃閣發掘了殷代遺址、殷代墓葬、战國墓葬、战國車馬坑和漢代墓葬；2.在固圈村發掘了战國墓葬；3.在趙固村發掘了战國墓葬；4.在褚丘村發掘了殷代遺址、战國墓葬和漢代墓葬；5.在百泉村發掘了漢代墓葬。本書將發掘出土的遺物，經整理后寫成的正式报告，为研究古代社会的歷史文化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資料。（即出·京）

中國佛教史籍概論　陈垣著　定价0.82元

本書是將六朝以來研究歷史所常参考的佛教史籍，按成書年代，分类介紹。关於每書的名目、略名、異名、撰人略歷、卷数異同，板本源流和各書的內容体制，以及与歷史有关的其他問題等，作者都运用了丰富的歷史材料，旁征博引，实事求是的加以分析。並且对四庫提要有关佛教史籍部分的錯誤，一一予以糾正。（京）

新華書店發行

考古学报（季刊）1956年第1期目錄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編輯

洛陽澗濱古文化遺址及漢墓……考古研究所洛陽發掘隊

考古学上漢代以前及漢代的东北疆域……佟柱臣

云南晋寧石寨山古遺址及墓葬……云南省博物館考古發掘工作組

西周銅器断代（三）……陈夢家

隋唐时代的造紙……王明

考古通訊（双月刊）1956年第1期要目

考古通訊編輯委員会編輯

考古調查的目标和方法……夏鼐

洛陽西郊漢代居住遺跡……郭宝鈞

热河兴隆發現的战國生產工具鑄范……鄭紹宗

石刻……馬衡先生遺著

漢代物質文化略說……王仲殊

"田野考古工作方法"教学大綱……阿烏杜辛

关於"硬陶文化"的問題……尹达

考古学报自本年起改为季刊，交北京市邮局發行。出版日期定为每季季末月下旬，全年共四期。每期定价：报紙本一元四角，道林紙本一元八角。讀者需要，請按邮局規定向当地邮局預訂，以便有計划地供应。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在3月下旬出版。

北京市邮局發行

北京市期刊登記証出期字第九五号

本刊每月三日出版
零售每册三角五分

北京市期刊登記証出期字第九五号

本刊每月三日出版
零售每册三角五分